

目 录

清朝后期的萨县衙门概况.....	白星桥	(1)
辛亥革命时期萨县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	程景华	(6)
伪萨县的民意机关——参议会及其普选.....	程景华	(10)
我所知道的大青山萨拉齐县		
抗日游击队.....	陈顺回忆、贾耀昆整理	(12)
抗日战争时期萨县的一支民众抗日自卫军.....	贾海山	(27)
解放前萨县工商经济概况.....	张静安	(31)
解放前萨拉齐县教育概况.....	胡智登	(45)
萨拉齐大东街小学校史.....	校办公室供稿	(53)
萨拉齐清真小学发展简史		
.....	刘忠陶琛 忆述程景华整理	(58)
萨县最早的女校.....	贾海山	(60)
萨县最早的中药店、中医院、西医院.....	王 富	(63)
萨县历史上的几次大瘟疫.....	王 富	(66)
土默特“户口地”的由来.....	云 广	(69)
土默特右旗道路与机动车的发展及黄河		
水运之兴衰.....	刘文信	(75)
发生在廿四顷地教堂的几件事.....	杜 瑞	(91)
萨拉齐万国道德会.....	宗法、杜金	(97)

萨拉齐源善育婴堂.....	王与贤(101)
“善人堂”的见闻.....	刘绍仁、寇永亮(108)
萨县万国道德会开办的放饭场.....	杜金(112)
昔日萨县匪患撮要.....	王永光(115)
萨县匪情点滴.....	葛子英(125)
萨拉齐的传统庙会.....	李巨才(127)
美岱召村名更改始末.....	张静安(131)
萨县的梨园谱.....	官步生(136)
李海龙传.....	史银堂(141)
著名兽医李贵.....	姜治友、陈治国(157)
晋剧名演员王月霞.....	葛子英、官步生(161)
花脸名流狮子黑.....	官步生(165)
蒙古族拳师云连升轶事.....	李维章(169)

清朝后期萨县衙门的概况

白 星 桥

清朝后期，随着列强的侵略，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赔款数目的增大，弄得民穷财竭，国库空虚。清政府为补充财政上的不足，在政治上更加腐败，公开实行卖官鬻爵。规定三品以下的官职可以捐班（花钱买官）。如萨县的赵国安、刘定邦都是捐班的四品顶戴官。这种官是有官无职，它的优惠地方是打官司不向县官跪。可坐着或站着，还能借机欺压人民。另一种是科班，凡科举上去的进士，都进入翰林学院，有依靠，能花上钱的可以买到地方官坐，他们是有职有权，又能贪脏枉法大发横财。没有依靠的，又花不上钱的大部分留在翰林学院。

一、咸丰年间萨县衙门的概况

咸丰年间萨县县衙门的地址，在城内西街今武装部院内。那时只有简单的几间土房，到同治六年（1867年）文山（满族）任职后，重修衙门。当时分三班、六房。

三班：是捕班（管逮捕，必须有点武术的人担任），快班（管民事案件），皂班（管监狱和县官坐大堂时衙役们站立两旁助威用刑等），每班设正副班长各一人，领钱的衙役各36人，不领钱的衙役多人。提审案件过堂时，可分为过大堂（在

外面，乡民都可以参加），过二堂（不准乡民参加），过花厅在县官摆花的地方过堂，这是和县官有关系的人打官司的地方，谁也不准参加，只准原告人和被告人参加，县官是用说合和解的办法去解决。

六房：是吏、礼、户、工、兵、刑。每房设掌案一人，书班几人，各办其事。到民国初年才改为民、财、建、教四局。因那时萨县比其他县份大，故所设的县令职位相当于府官，叫蒙民理事府。凡来萨县任县令的官，不仅要会蒙话懂蒙文，而且还要会汉语懂汉文。凡到任的县令大都是蒙人或满人。县令下设师爷，分红笔师爷，是管理用朱笔呈写上行公文；白笔师爷，是管理用黑笔写下行公文。红笔师爷下设监印和收发。

另外还设有东西杂营铺，地点在城内原鞋业社院内。东西杂营铺有县太爷坐的轿车一辆，四人轿子一乘，吹鼓手一班六人。每天县太爷在早、午、晚吃饭时要三吹三打，还设铜炮三座，中午各放一声。另设官赌宝摊两座，总管东西杂营铺的人，是萨县白花（赌棍）出身的王五豹子。他也会一点武术，据说也给商人出门保过镖。他总管东西杂营铺不仅不赚钱，还得自己拿钱给轿夫、车夫、吹鼓手一班六人去开支，他的钱财来源主要是靠两座官赌宝摊的收入，用这笔钱作为这些人的开支。

当县太爷出访本县的绅士时，要乘轿，王五豹子跑在轿前，手托轿杆，轿走多快，他走多快。要坐车，王五豹子只可跨在轿车辕旁。当县太爷下轿或下车后，王五豹子赶忙跑过去给县太爷抽打几下身上的尘土。据说王五豹子没有职位，但在本县很出名，家里很排场，穿得很阔气，娶得大小老婆。巴结他的人很多，这些人的企图，也不外乎打官司时走他一下后

门，或者做其他事借他一句话之力。

二、新旧通判（相当于州官）交接的情况

新通判到任，旧通判移交手续是必须给新到任的官花钱，一切讨好新任职的官，才能把移交手续顺利完成。否则，新任通判要刁难他。当新官上任时要带自己的亲信十多人，原旧县府掌案以上的人员一律写辞职书。凡给新官花上钱的人可以留用，没有花钱的人员就是你再去几次，新官也推辞，甚至没有谈上几句话，新任县官就不耐烦了，马上说一声“献茶”就把你赶走了。

新官一上任就张贴布告一张，包头、五原厅都有，这就是所谓的“安民告示”。内容是严禁赌博偷盗等。跟着本县大行（大商家）送县官三千两铺堂银子，名义上是修建衙门，实际上是送给新官自用。

新官上任不久，为牟取更多的钱财，亲自到包头抓“虎盘”（当时包头约有几十家，名义所谓是粮油大店，实际上是既无油也没有粮，专做空买空卖的生意，从中牟取暴利这就叫空中取水）。新官到包头后，借口其它原因，派人把一两家粮油店的头目抓来给予刁难，后经过协商，“虎盘”们合伙集上几千两银子送给新任县官，新任县官得到银后这才回萨拉齐厅。

三、文山在萨拉齐厅任职点滴

文山是满州镶白旗人，他初任萨拉齐厅通判是在咸丰元年，后由庆麟接任。第二次到萨拉齐厅任职是在同治五年（1866年）此时官名由通判改为同知，到同治七年由常桂接

任。同治九年是塔恩哈接任，该同知有一次在过堂时，被原告和被告都给问住了，他竟然说出：“你们原告有理，被告也有理，就是老爷无理”，由此当时人们给他送了个绰号叫哈糊涂。同治十年（1871年）是玉珊接任，没有几天就被撤职了。据说，该同知只顾贪污，不问政事，他为了贪得更多的钱财，和包头“虎盘”头头刘定邦结成好友。刘定邦仗上他的权势，把包头粮油全部垄断。结果被包头人民告到山西巡抚，刘定邦被逮捕法办。玉珊同知因受包庇刘定邦牵连被撤职。同年文山又第三次接任萨拉齐厅同知，直到光绪五年（1879年）。

文山从咸丰元年任通渭到光绪五年任同知，三次在萨厅主政十五年。在这期间，为防匪患，训练民团建筑城围。同治八年（1869年）文山同知从打城围、办团防的节余款中，兴办了教育，提出制钱六千串，呈上级批准，在城内关帝庙东创设了育才书院。并将这六千串钱发商生息，作为书院岁需经费，规定事后无论地方何项款用，概不准挪用此款。到光绪二十九年呈准育才书院改为蒙小两等合设学堂（蒙学即初级小学，小学即高级小学）。民国六年（1917年）改为高等小学校。民国十四年（1925年）又改为县立第一小学。这就是现在大东街小学的前身。

为防御水涧沟的洪水水患，同知文山又动员乡民加高了石坝，还在坝上种了树。又在水涧沟口依山凿了石门，引沟水灌田，使沟门村一带的土地变成了水地，人民为水起纠纷的事件也少了。

文山县令还把育才书院的经费提出一部分，为孤儿寡女、无后的老人，在县城东门外开辟了义坟，并安排了常年照看义坟的人，深受人民的欢迎。

每到雨季，沙尔沁沟的洪水大发，沙尔沁和东园村的农民，为了争水浇地，两村都花上钱雇了死命鬼。因此，两地的人结下了仇怨。文山任职后，在沙尔沁沟口的出水处，设置了水平仪，较公平地分了水。解决了两村因浇水起的纠纷，赢得了农民的欢喜。沙尔沁和东园村的农民为纪念文山，当文山在世时就在沙尔沁村东门里路北修盖了文山祠堂。

文山县令还解决了九任县官解决不了的难案。此案男人名叫萧懋，系本城人，大老婆娶的是板申气村的。姓名不知，当时人们都称她萧懋老婆，因男人娶了小老婆而分居，为此大老婆和萧懋常年打官司，九任县长都无法解决。文山上任后，就较妥善地解决了他俩的纠纷，得到了萧懋及其老婆的满意。在文山县官调离时，萧懋老婆手端清水一盆、拿着一面明镜，在东门外等候，文山路过时，她跪在地上，手举清水和明镜，向文山县长说：“大老爷清如水，明如镜，如同宋朝的包文正”文山县官赶忙下轿说：“自古道官清吏不清，久打官司家业损”。这是劝她以后尽可能的不要再打官司了。当时跟随的老百姓，都不让文山县官走，文山县官说：“这是上司之命，我岂敢不从”。最后文山县官脱下一双朝靴才走的。萨县百姓为纪念这位清官，把他的朝靴放在木笼内，挂在东城门洞顶上，作为留念。

因为文山县官是个清官，离任时穷的走不了。当时萨县“大行”集股送给他“移座”，其意是帮助他的路费。

（白星桥口述 赵英整理）

辛亥革命时期萨县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

程 贵 华

清光绪年间，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形成一股强大的历史潮流。

一九〇七年初，山西同盟会按照总部的指示，到各地发展秘密组织，派弓富魁、王建屏、李德懋等人，前来绥西的萨拉齐地区进行地下活动。他们的决定是：“绥远西部，清廷鞭长莫及，应该到那里招兵买马，预作准备。”随后，他们各奔萨拉齐、包头一带联络各方有志之士搞革命，其中弓富魁以行商为业，秘密进行反清活动。王建屏则投入萨县城内耶稣堂，以教书作掩护，随机宣传革命，他还去五原、隆兴长镇，联络哥老会和河套地区的爱国人士。此外，李德懋系大同人，精通拳术，住在萨县城西之鄂尔格逊镇，与该镇之塾师富日新先生结为盟友，以招徒弟，传授武术作掩护，积极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并发展了很多知识分子，为同盟会员。至一九〇八年，在萨县有马善元、马之衡父子，王子选等回族进步人士及王定圻、任秉钧、王湖、游梦田、牛青山等汉族同志，都加入了同盟会，分别在家乡宣传同盟会的革命纲领，传播民主革命思

想。特别是土默特旗的满泰（字子舒）、云亨（字嘉会）、经权（字子衡）、安祥（字子正）、武海（字源洲）等蒙古族青年加入同盟会以后，在反对清朝统治的斗争中，志同道合，齐心协力，不断扩大革命力量。在宣传反对妇女缠足，反对男子留辫子中，他们自己首先剃去辫发，以作示范。从此，在萨拉齐、土默特境内的反清运动蓬勃发展，并显示出革命的暴风雨已经形成，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了。

一九一一年九月，云亨回故乡策划起义。曾在萨拉齐当时的最高学府，人称“大学堂”的“蒙小合设学堂”内召开会议，发表演说，唤起各方志士，进行起义的准备活动。

同年十月十日，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爆发以后，山西的阎锡山响应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首义”战斗。率秦、晋、蜀北伐先锋的革命大军，由山西河曲过黄河，经伊盟夺取了包头镇，向萨拉齐县城进攻。当时萨拉齐城内仅驻有禄营兵四十名，民练团防二十名，加以人心倾向共和，无实力可言。故由地方法团、咨议局、商会等决定，选派蒙古咨议员云亨、经权二人为代表，赴包头去欢迎革命军。不料因革命军在包头驻扎六天之际，给绥远军事当局以喘息部署之机。绥远城将军坤岫，调集了谭涌发的巡防部队和满州常备队的炮兵，赶奔萨拉齐城堵防。另外还派出归化城新编土默特旗蒙古军第二营，由发义率领，埋伏在距萨拉齐东七十里之刀什尔村（今陶思浩火车站附近）抵挡。满泰见萨城内来了清朝的队伍，冒险缒城而出，连夜奔到包头给革命军报了信。

云亨、经权二人引革命军抵萨城西之吴坝村后，研究了城内防守情况，向阎锡山提供了攻城策略，革命军用大炮轰东城墙，部队直扑城下，守城之清军惊慌万状，不战而退。革命军

迅速开进城内，阎锡山的行辕设在西街德昌店内，命令同知呼延庚仍在衙署内办公。派人将监狱内之囚犯放出，收合编成敢死队。其中有一杀人重犯，系由包头解送来之张万顺（又名胖梳子），阎锡山知道他是一条富有胆略的好汉，即任命他为敢死队队长。他率领这支敢死队曾在刀什尔等战役中同清军进行了顽强的战斗。并经经权在萨县早已联络好愿参加革命军的地方武装五百多人也编入了部队，由经权任管带，阎锡山还指示部下亲信张汉杰（又名三毛），向城内各殷实商号募捐了饷银，每家捐银二千、三千两不等。同时，阎锡山招集云亨等，共同商议进兵归化城的大计，原拟利用云亨、经权在蒙古人中的关系，不战而取归绥城。云亨和经权曾受意函劝土默特旗陆军带队官福坦等待机起义，结果因土默特旗的参领和带队官，坚持维护满清统治者的顽固立场，所以起义未能实现。

此间，因云亨、经权、安祥等蒙古青年投身革命，表现得英勇坚强，故同盟会总部发表：“云亨为绥远城将军”、“经权为绥远城都统”、“安祥为归绥道道伊”。

革命军在刀什尔战役中，被土默特部队击溃，并打死敌前总指挥王家矩。阎锡山下令收兵，率部返山西途经托县时，阎锡山还与安祥等人举行了拜兰谱结盟之礼。云、经二人追随阎军而去。

革命军转晋之后，清军派土默特旗蒙古军，开进萨拉齐城以后，大肆反攻倒算，搜捕革命人士。所有参加起义之人，除有事实恐罹危险而潜行他地外，凡无事迹可行者，均各操旧业，伺机再起。唯独咨议局之文牍王鸿文因参与革命被杀于厅署西辕门外。就是蓄过短发的人也被认为革命党，也被追查。当时流行着这样的一句谚语：“人家剃秃子你还爱，怕死留下~

个油卜盖”。意思是参加革命首先要剪掉辫子，没辫子便是革命党就有被杀头的危险。

不久，南北议和告成，宣统皇帝溥仪退位。国体变更，共和成立，改为中华民国。壬子年元月，萨拉齐的建制，也随着起了变化。首先废除改县，成立萨拉齐县公署，县首长称知事，首任县知事经权。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由王建屏（号村候）接任县知事。他到任伊始，即督同马善元、王子逸等创办了“萨拉齐清真学堂”，这是当时回族人士自己创办的最早一个新式学校。这期间，还由马善元等发起创立了“萨县回民俱进会”，这是回族的最早群众团体。

当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篡夺后，全国掀起了护国运动，声讨窃国大盗之际，满泰、云亨、经权立即奋起倒袁活动。他们一面撰写倒袁檄文，一面联络包头、固阳、武川等地的地方武装，保卫团体，发动了起义。经权还亲自由北京到上海等地，向黄兴、孙中山等请示工作。

一九一三年间，满泰与萨厅五区地方团队领导人的安祥，起兵反对蒋雁行都统大种鸦片的罪恶行径的斗争。

一九一四年后，满泰等目睹地方军阀、政客的苛政与中饱私囊深感愤慨。遂提出“缓人治缓”的倡议。并联络云亨、刘会文、李雨山等人举行武装起义。这些举动，虽然都归失败，但也给予军阀的打击却不算小，而且萨县人民的斗争，从失败教训中找到了新的发展方向。那就是孙中山先生决定的三大政策以后，蒙、汉、回青年就踊跃加入了这个革命队伍，一起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重大斗争，继续为反帝爱国、救亡图存而探索真理。

伪萨县的民意机关——参议会 及其普选

程景华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中央曾颁布了省（市）县参议会组织条例，要求各省、市、县建立各级代表民意机关。按规定萨县要成立县参议会，由各乡镇选出参议员一人组成，妄图装上个假民主的门面，来巩固其法西斯统治。

一九四六年四月，由萨县县长高云山和县党部、三青团的负责人协商，筹划成立“萨拉齐县参议会”，用包办形式，指定每乡选出参议员一名，在豪绅、地主把持下，提出参议员名单有：崔子玉（南园乡）、刘昆（县教育公会）、陈昆山（县农会）、周子麟（县商会）、胡慧荣（女、医师公会）、李雨田（鄂尔格逊乡）、张伯屏（沙尔沁乡）、高秀（沟门乡）、董兰生（三丰乡）、秦生富（新城乡）、秦志富（河宾乡）、李振铎（义成乡）、贾海峰（廿四顷地乡）、许昌（毛岱乡）、刘盛五（苏卜盖乡）、张希霖（善岱乡）、祁登华（高泉营乡）、董寿（城关乡）、陈国珍（哈素乡）、岳秉孝（双龙乡）、陈国治（耳沁尧乡）等二十一人。其中地方豪绅占大部分，国民党员次之，教育界人士也各分到几个席位，报

请省政府核定批准。

经县政府、县党部主持，成立了县参议会，选出刘昆（后往台湾）为议长，陈昆山（县党部执行委员）副议长，周子麟任秘书，胡智登、周逸山等任干事。

参议会每年召开大会一次，每次会期三至五天。开会议程是：听取县政府施政报告，审议县经费的开支，并提出询问及建议县政兴革事宜等。这个参议会一直延续到一九四九年“九·一九”绥远省和平起义，萨县人民政府成立为止。

一九四七年秋，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全国实行所谓“普选”。当时萨县也成立了选举事务所，并决定县长、县党部书记长等为选举的监督人，民政科长逮卓任总干事，参议会、三青团都派人参加选举事务，还公布了萨县应产生的国大代表候选人名额为五人，监察委员、立法委员的名额各一名。参加竞选的皆国民党党员和地方官僚政客、豪门巨绅为候选人。

经党政当局酝酿并部署了所谓的民意，选举用包办选举的办法：在各乡设立选区、分别进行投票选举。其选举结果情况如下：

- 一、伪国大代表当选的是于存颢；
- 二、监察院的委员当选的为陈国英；
- 三、立法院委员祁志厚当选。

此外，本县的杜羨孔，中国青年党的成员，当时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普选”前他曾给本县的同学写信，请帮助为他活动，并依靠家庭力量为他进行竞选立法委员。杜站在青年党的立场，对这次竞选立委抱有很大希望。但是，事与愿违，因为政府当局改变了选举部署，杜未选上。后来由青年党内给杜容了国大代表一个席位，这场权力之争的丑剧才草草收场。

伪国大代表选出后，于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前往南京参加伪国民代表大会，选举蒋介石为总统，李宗仁为副总统。南京政府给予代表“戡乱建国”委员的名义，回到原地工作。

当选的监察委员、立法委员，前往南京参加监察院、立法院长的选举，并留在南京参加监察院和立法院的会议。

所有伪造民意，包办选举产生的国大代表、监察委员、立法委员以及县参议员等，都对蒋介石的反动政权起了不同程度的支持维护作用，同时也看到其腐朽的政治将要导致垮台，他们借口局势紧急，向中央政府呼吁要接济、要武器、要援助，也起了应有的作用。

我所知道的大青山萨拉齐县抗日游击队

陈顺回忆 贾耀昆整理

大青山萨拉齐县抗日游击队，是一支打不垮，拖不烂的非常顽强、非常能战斗的抗日武装。这支队伍，在党的领导下，由王经雨等同志率领，以大青山为根据地，紧紧依靠群众，克服重重困难，始终活跃在敌人的眼皮下，使日本侵略者深感头痛和恼火。

※

※

※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面对强大的侵略者，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闻风而

逃，采取不抵抗政策，所以，九月下旬，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铁蹄就踏到了绥远省。绥远省沦陷后，侵略者继续西进，每到一村，或打尖或驻夜，总是一进村就宰猪、杀羊，抓鸡子大吃一通，并砸烂农民的门窗烧火取暖。吃饱喝足，就寻找妇女，不管老少见妇女就奸淫，临走，还总要杀死一些老百姓，把农民搞得苦不可言。

当时，萨拉齐县城的国民党军队，早已逃之夭夭，鬼子由东门而进，穿城而过，一进城就在东门附近杀死三十来个居民。

过萨拉齐后侵略者进包头，包头也是空城一座，商会派人把鬼子迎了进去。鬼子在包头停留不长，就大部分返回绥远省，同时，留下少数鬼子和汉奸“维持秩序”，并建立了日伪政权。

之后，李守信的伪骑兵又随后而来，这些兵，也同鬼子一样，无恶不作，农民气愤地称他们是“二日本”。

该包沦陷后，日本侵略者为了维护铁路运输的通畅，在每个火车站，都驻有鬼子兵护路，一般驻兵二十到三十人。这些鬼子兵，夜间乱打枪炮，白天则三五成群地在车站附近村庄寻找妇女奸淫，闹得农民日夜提心吊胆，于是，车站附近村庄的妇女和铁路工作人员的家属不得不移居到较远的地方躲避。鬼子在附近找不到女人，就下令向各各村要女人。记得，苏卜盖村向新营子村雇一名妇女送到美岱召车站，没半天功夫，就被如狼似虎的鬼子兵逼得的不成人样，险些要了命。

日本侵略者为了强化对中国人民的统治，把沿铁路的村庄，起名叫爱路村，并向各村要护路人员，给他们夜间巡查护路，凡雇用护路人员的费用，全部摊派在农民身上。鬼子还在爱路

村派两名联络员，每天给驻在美岱召车站的鬼子报告村里的情况，村里的人谁要惹下联络员，他去车站在日本人面前说你几句坏话，你就活不成。

鬼子的高压政策和烧、杀、抢掠的兽行，给沿山一带农民带来的巨大的灾难和痛苦，致使一部分农民家破人亡。但这一切并没有吓倒中国人民。广大农民与鬼子的仇恨与日俱增。他们愤怒了，他们要斗争，王经雨同志，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

一九三八年春，农民面临着春耕生产的巨大困难，想方设法才算把地种了下去。而这时的王经雨同志，虽说家有十口人，水地三百多亩，骡马成群，但他面对祖国山河惨遭侵略者践踏的现状，再也无心经营自己的家业，立志要作抗日救亡工作。

起初，他离家去联络他的同学和知心朋友。三八年秋天，他为了便于联络，通过熟人的引荐到伪自卫团一个小队当了文书，开始了秘密的串联工作。就在这年的秋末冬初，由李井泉同志率领的八路军支队，从蛮汉山到达大青山，开始建设大青山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到来后及时派出工作队，工作队员化装成各行各业的人员，深入各地农村作抗日工作。王弼臣同志是当时做党的地下工作的，他初次来美岱召村时，是化装成农民作掩护的。他来到美岱召村后，以扛长工，打短工为名，秘密进行工作，经过不长时间，就和王经雨同志联合到一起开展工作。直到一九三九年夏天，抗日的宣传，动员都进行得很顺利，在美岱召、美岱桥、沙图沟村，都发展了抗日救国会组织，同时，还发展了地下党员，建立起了村党支部组织，特别在美岱召村，经过抗日宣传动员，抗日工作得到了蒙汉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有了相当的群众基础。正象毛主席讲的“我们共

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一样，抗日救国工作已经在这几个村初步打开了局面，抗日救国思想开始在群众中扎根、开花。在这种情况下，王经雨、王弼臣二同志及时对形势作了认真的分析和研究，决定要尽快组织除奸游击小组。除奸小组组长由董二圪洞同志担任。但没武器不行，于是，王经雨同志由他家拿出大烟土，通过伪自卫团的熟人，暗地买了一支匣子枪作为除奸用。这支匣子枪，就是大青山萨拉齐县抗日游击队的起家武器。

美岱召是沿山一带的大村庄，也富一些，日本特务机关和武装便衣队经常来该村活动，他们借口村中有八路军，常敲诈一些大烟土，鉴于这种情况，王经雨和王弼臣二同志，给村里救国会组织和党支部成员，作了布置，让注意监视武装便衣队来村的活动，同时，设法在大社的招待人员里安插救国会员，所以，往往特务一进村，我们的除奸人员就能马上得到情况，混到招待人员当中给跑跑腿或做些寻长用短的差事，“热情”地把便衣队招待得晕头转向，只要便衣队一露空，我们的除奸人员就下手，来一个消灭一个，来两个消灭一双，并夺到武器，武装除奸人员，就这样，弄得日本特务机关派出的人有去无回。美岱召村的名声也随之天天地大了起来。这时，王经雨、王弼臣二同志，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也作好了准备，他们通过宣传、动员，已把美岱召、美岱桥两村的保甲团掌握在自己手里，但在名义上归本村的大户指挥。因此，拉出去改编成抗日游击队的条件业已成熟。在拉出去之前，王经雨同志将家中的人口分散转移到远处居住，土地、房屋、散畜等托交他二姐照管（实际上都丢掉了）他又把家中财物拿出来为游击队购买

枪支弹药。

一切准备就绪后，王经雨同志秘密通知两村的保甲团拉了出去，改编成抗日游击队，把这支队伍拉到大青山中，在美岱沟旁的纳令沟、黄土尖、野鸡圪洞、红皮石湖建起三处简易的营房。一九三九年冬，大青山萨拉齐县抗日游击队正式成立。这支抗日武装，白天在山中休息、整训，晚间下山到村中活动。我党对萨拉齐县抗日游击队很重视，在人员、物资上及时给予配备，让老红军杨思华同志担任游击队的指导员，到一九四〇年春，游击队扩大到七十多名队员。

游击队的发展和声势的壮大，使日本鬼子感到极大的恐慌和不安，侵略者是绝不允许游击队存在的。于是，一九四〇年四月份，日本鬼子调遣较大的兵力企图围歼我游击队，他们一出兵就围攻我游击队在黄土尖、野鸡圪洞、红皮石湖三处驻地，我游击队得知情报后，决定让大部分队员转移，只留少数枪法好、有经验的队员和指挥员隐蔽在高山顶上，待机消灭敌人。外号“堵一面”，“不托空”的神枪手老武三，就是留下来的队员之一。这个老武三，为了混个穿衣吃饭抽大烟，曾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兵，练得一手好枪法，抗战开始，投靠我游击队参军。这次战斗中，当进攻我游击队的敌人一露头，就指挥老武三射击，敌人还没闹清是哪打枪，老武三就三枪放倒三个敌人。这一打，弄得敌人蒙头转向，马上爬在地上不敢动了，敌人不动了，我游击队也停止射击，后来敌人又爬起来前进，老武三又端枪连续射击，又打死了几个敌人。就这样两次射击，打得敌人不敢前进了。这时上级命令我游击队全部撤退了。结果，敌人的这次围攻扑了空，连我游击队的踪影也没有找到，只好灰溜溜地抬着几具尸体，出了美岱沟回车站坐火车

走了。

这是我游击队和鬼子兵的第一次战斗，这次首战告捷，大大鼓舞了游击队的斗志。

一九四〇年秋季，我游击队到民生渠以南一带农村活动。一次由于工作任务多，没有掌握好时间，天明前返不回大青山，于是就在毛岱村以东的一个小村子柳树潭隐蔽驻下来。结果，被汉奸报告了驻扎在二十四顷地的日本鬼子，当天下午约两点多钟，由毛岱村开来三辆满载鬼子的汽车，另外，还有几十名伪警察配合，鬼子、警察直奔柳树潭，在离村一里多处，汽车停了一会儿，后来三辆汽车分别从北、西、南三个方向，向柳树潭村包抄过来，看样子，鬼子是想逼我游击队由东门撤出，然后在村外开阔地上实现消灭我游击队的企图。我游击队的几位领导同志，对形势作了分析，觉得撤出村外游击队就暴露在敌人火力之下，对我很不利，于是果断决定，利用村周的土围子（老百姓也称之为城墙）抵抗敌人，并马上指挥全体队员准备战斗，又根据战斗力的强弱，把有经验、战斗力强的老武三、梁五小、管电云等还有其他一些队员挑选出来，上城墙阻击敌人，让一些临战经验少的队员就伏在城门两边和城门顶上，以备汽车往里闯时用手榴弹消灭敌人。几位领导则分头指挥战斗。战斗打响后，敌人的火力很猛，尤其是村南那辆车上的二十多名鬼子兵，靠立南边的城墙射击，一时间，机枪、步枪打得我游击队头也抬不起来，就在这个吃紧时刻，王经雨同志指挥有经验的队员老武三，往西移动了地方，老武三背贴墙，斜着身子从炮眼口往外看，这时，敌人只顾疯狂地射击，没有发现我队员移动地方，于是，老武三瞅准机会，一枪就打准了鬼子机枪手的脑袋，机枪顿时成了哑巴，鬼子的机枪助手爬上

去拉死人，又被老武三打得脑袋开了花。有一名鬼子指挥官，正爬起来向东移动，也被老武三打得就地爬下不动了。就这样，一直和鬼子相持了一下午，南面汽车上的鬼子再没敢动，只是无目标地放空枪，西、北两面的鬼子也一直没敢前进，直到太阳快落山，鬼子又来了两辆汽车的增援部队，向柳树淖村里发射了一些催泪弹，弄得我游击队员直流泪。天渐渐黑了，趁天黑，我游击队顺利由东门撤出回到大青山根据地。回山后，在纳令沟、黄土尖背地边休息边总结柳树淖战斗的经验。总结中，大家一致认为，这次柳树淖之战，我们三个有利条件。第一是地形对我有利；第二是游击队领导在紧急情况下决定对付敌人的方式方法好；第三是有几名好枪法的队员。所以，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既保存和锻炼了自己，又打击了敌人。

在总结这次战斗经验的同时，游击队进行了一个时期的整训。在整训过程中，王弼臣同志向全体游击队员提出了三项奋斗目标：一是要努力学好枪法，提高战斗力，多消灭鬼子兵；二是锻炼好口才，见了群众能做宣传教育工作；三是努力学习，提高文化水平，做了工作能写总结报告。他还要求每个队员都必须向这三个方面发展，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很好的游击队员。

整训期间的给养，都是由美岱召、沙图沟、美岱桥三村供给，这三村的一些群众避开敌人，偷偷地按时送上山，保证了游击队整训任务的完成。

整训快结束时，一天夜里王弼臣同志一个人带着手枪下了山，到美岱召村办事，他走到召门口时，看见有家小铺内灯还亮着，王弼臣同志很熟悉这家，于是就进到小铺，询问这几天

敌人有什么活动，小铺主人说，没有什么活动，边说边让王弼臣同志上炕坐，又说这几天有好酒，喝上几盅再走，王弼臣同志就坐下喝起酒来。正喝着，美岱召火车站的警察头子领着二十多名警察也来到召门口，看见小铺点着灯，就一齐拥了进去，一进门就问，炕上坐的是什么人？小铺主人随口回答说，是我们的亲戚，警察就没有再问什么。这时，这些家伙看到小铺内堆放了一地纸烟，就你抢我拿起来。住在小铺同院内正房的女人听到了南房小铺内的动静，就和他男人说，南房他叔叔家王弼臣正在炕上喝酒吃饭，车站的警察满满站下一地。这家男人听说后，甚也没说，下地就往南房跑。这个人社会经验很丰富，一进小铺，就客客气气地问候警察，你们刚来，辛苦了，这时他看到这些家伙正拿小铺的纸烟，也就挤过去，顺手抱了些纸烟，并对警察说，快到我家去吧，小买卖受不了，他边说边在前边走，警察们也随后跟着到了正房那家，这时，正房的男人把烟往炕上一放，让警察抽，这些警察又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抢起来，趁这个时间，南房小铺主人把王弼臣同志送出去，脱离了危险，王弼臣同志连夜到了黄土尖营地。那时，象这种群众掩护革命同志的事是很多的。

一九四一年春末，上级对大青山萨拉齐县抗日游击队进行了改编，先改编成了八路军绥西二支队二连，后又改成八路军绥西骑兵三团二连，彭光华同志任指导员。这时绥远省地区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组织机构也发生大变动，撤销原来的动员会，建立民主政府。县区两级政权的建立，对巩固抗日游击根据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对抗日战争具有重大的意义。当时，任命王经雨同志任萨拉齐县县长，任命王弼臣同志为县民政科长。两级政府工作的方针是：保存自己的实力，坚持抗日游击

根据地，对敌人进行长期的、坚决的斗争。

两级政府的工作人员共有十几名，开展工作的办法是有分有合，主要工作是到各地农村活动，在群众中作宣传动员工作，给群众讲解抗日的意义，并告诉群众，虽然日本帝国主义现在强大，而我们八路军弱小，但只要中国人民都起来，弱小的八路军就能战胜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同时，还动员、组织群众送粮食、做军鞋支援抗日军政人员，所以这一时期，由于群众秘密地送粮食、送东西、送情报，我政府工作是顺利的。

四一年六月份，王经雨、王弼臣二同志带领政府工作人员去各村征收田赋、大烟土税，一天中午，在沙图沟召集了村里几个代理办事人，让他们交纳烟土税，这些人答应第二天交来，并约定好时间、地点派专人送。可这件事，被本村的一个坏人知道了，当晚就到美岱召车站报告了警察署，同时，这家伙还连夜邀请了农村中一个当过土匪头子的人，共同商量好要下王经雨、王弼臣二同志的手枪或者见面打死。这两个家伙第二天从车站出发时还夸下海口说：下王经雨、王弼臣的手枪如蒸笼里取馒头，手到拿来。这两家伙暗带手枪，冒充沙图沟的人给我政府交纳烟土税，提前来到约定地点。可是，王经雨同志，特别是王弼臣同志，遇事考虑很周到，对待敌人很有策略，第二天将近中午，他们另选派了两名精明强干、眼疾手快的队员到约定地点等候送烟土税的人，临走，王弼臣同志再三嘱咐这两名队员说，中午在村里休息的群众很多，要注意防止特务混水摸鱼，破坏我们的征税工作，还说，你们到了那里，要好好监视来人，看是不是沙图沟村的人，要小心，思想上要作好准备，防止发生意外情况，到时，我们的人也隐蔽到附近观察。快到中午，果然有两个人手提大烟土来到约定地点，我

两名队员看到来人早作好了准备。可这两个家伙一看不是王经雨和王弼臣来接收，就感到事情不好，有些胆怯，扭头就走，我队员当即喊，站住！不要动！但这两个家伙头也不回，丢下大烟土就跑，边跑边掏枪，我队员开枪打死了一个家伙，这时，王经雨、王弼臣和其他同志都隐蔽在附近，有人还要开枪打另一个家伙，王弼臣同志考虑到这样会给沙图沟村招乱子，就没让开枪。就这样，我们收拾了敌人扔下的大烟土和手枪，立刻离开了沙图沟村。

第二天早晨，日本鬼子运来三汽车兵，把沙图沟村里临时搭起的一些遮风避雨的茅庵都放火烧掉了。鬼子的这一手，并没有影响我们的征税工作，往后沙图沟村都能如数完成烟土税任务。

同年秋天，一方面由于我政府工作人员少，另一方面，游击队改编成正规军后，不甚来萨拉齐一带活动，所以，特务、汉奸在农民中造谣说，八路军完啦，王经雨、王弼臣只有十来八个人，几天也就完蛋了。但是，大多数群众心中有数，不相信这些鬼话，还是靠近我们。

敌人一计不行又施一计。汉奸、特务利用个别坏人秘密侦察王经雨、王弼臣二同志的行动，如晚间下山从什么路线走，黎明回山又从什么路线走，侦察到以后，想暗中占据有利地形，企图袭击我政府领导人和其他工作人员。但我们的基本群众，提前向我政府工作人员报告了这些情况，同时，地下党员也报告了敌人的行动。所以，王经雨、王弼臣等同志下山活动时，一般不走大道，常常踏荒而行，路线又灵活多变，弄得敌人摸不着我政府人员的踪影，致使敌人非常恼火。敌人为了割断我政府工作人员和群众的联系，又实行了第二次惨无人道的

并村和大清乡，还采取查户口、重新发放“良民证”等办法，加强控制，生怕混进我方做地下工作的人员。

由于敌人封锁控制很严，因此，一九四一年秋冬，我政府遇到很大困难，工作进展不顺利，于是，就搬到了白头石沟一前沟（村名），着手研究和安排冬季生活和工作。当时，决定征收些田赋税和粮食过冬。我政府根据那时“靖安军”对庙尔沟、大土城附近控制不严的情况，就派到后边一个工作队，动员农民送些粮食，这些地方的农民偷偷往来送粮食，但就怕碰上李海龙和鄂友三的人，因为这两股匪军与我政府工作人员如水火一般合不来，所以，一旦碰上这帮家伙，就非处死你不可，真是阎王叫活，这些家伙也不让你活。

当时，农民虽然能送些粮食，但有的地方农民也是相当困难，象一前沟沟里，有不多几户农民，辛辛苦苦劳动了一年，秋天刚刚把粮食收割倒，就在敌人的秋季扫荡中，全部被放火烧掉了，所以，我政府工作人员，还得帮助这里的农民渡过难关。于是，就召集这十来八户人家开了一次会，王经雨、王弼臣二同志给农民出主意、想办法，动员他们自己动手，就地寻找生活门路。正好这年秋天雨大，山沟里的灰菜、沙蓬长得特别好，群众男女老少齐出动，到山沟里割野菜、打草籽，结果，这两样草籽收打了不少，直到第二年夏还有灰菜籽吃，这才算度过了难关。

四一年春节，腊月三十下午，政府工作人员的一些青年人情绪不高，有的想家，有的感到吃的不顺口。但王经雨、王弼臣二同志却情绪好、很乐观，总是有说有笑，他们看到个别同志情绪低落，就给讲故事、说笑话，其他同志也说笑话，这一来，大家都高兴了，非常欢乐。太阳落山时，王经雨、王弼臣

同志觉得光说笑话也不行，还得吃些东西才能解决肚子饿的问题，可莜面不多一点，只有一些山药蛋，于是，二人边说边笑边动手烧山药，王经雨同志还逗笑说：“大年三十吃烧山药，灰心入炕，我看狗明年能肥我怎？”没等山药全烧熟，就你吃他也啃，把些烧山药吃光了，又喝了一锅莜面粥，大家才都休息了，可是，王经雨、王弼臣二同志，为了让同志们休息好，又防备敌人趁过年之际袭击，始终没睡，而是研究正月初二去何处活动等问题。他们二人分析周围的情况，北面庸尔沟、大土城住有李守信的骑兵，东面万家沟住着王有功、刘隆正、二得子的土匪队伍，西面是鄂友三、李海宾，同时，自前脑包往后一带村庄中我们没有群众基础，所以，认为要活动，只能从南走，但下山活动困难也不小，可是我们毕竟有群众基础，特别是基本群众靠近我们，因此，尽管敌人控制严，只要提高警惕，是能够开展工作的。

四二年春，我政府工作人员由孤雁梁往西下山到沙圪沟村一带活动，这时，山根底已无人家，只碰到一个放羊的羊倌，就让他给群众捎了话，说我们的人来啦，没吃的，给往上送些。那时形势很紧，敌人控制也严，群众得知我政府人员来了后，假装拾柴、拾粪，给往上送吃的，这个送些，那个送些，就解决了困难。夏天到了，山沟里的野菜长出来了，就不单吃粮食了，而是把野菜和粮食混合着吃。荨麻出土早，一开始就吃它，以后便有了苳苳，野韭菜，两叶葱等，这些野菜要是有些油还都是好吃的。有时，一旦粮食接不上，就靠这些野菜充饥度日。就这样，我政府工作人员活动在沿山地区开展工作，同敌人坚持斗争。

敌人发现我政府工作人员又在沿山一带活动，千方百计

想消灭我人员。他们先是采取往里派人的办法，名义上是进山参加我游击队，实际上派进去的人，一方面混上几天，然后背枪跑掉，以瓦解我士气，另一方面，也是敌人的主要目的，就是让混进去的人伺机打死我政府领导人，企图一下子把我们搞垮。当时，王经雨、王弼臣二同志对敌人的这一花招心中有数，考虑得很多，警惕性也很高，觉得在这样困难条件下有人跑来参军是大有文章的。

第一个人来参军时，从多方面考验他，教育他，同时，把老解放区的胜利告诉他，让他知道八路军的强大，并让他下去多动员些人来参军，结果，这个跑来参军的人勉强走了。可是，这个人三天来一回，五天来一回，磨着要参军，一连来了四次，我们的政府领导对这个人很怀疑，一直没有要。后来过了几天，又来参军，这次把他留下了。两天头上，夜里我们出发到沟口隐蔽下来观察敌情，这个新收下的人看见我一个队员放下枪，他认为是个机会，拿起枪就跑，我方一个老队员当机立断，端枪就打，一枪送他上了西天。敌人的阴谋破产了。

敌人看到往里派人被识破了，于是，又来软的。敌人利用王经雨的娘舅家出面劝降，他们对王经雨说，你受这样的苦，还不如想其他办法，找别的出路。王经雨同志则对他们说，送些粮食，再商量办法。结果，送了好多次，我们的人借此机会也能吃两天，就这样，磨了两个月，还演了一出假投降的戏，最后一天，敌人亲接收我们的人“投诚”鬼子没出面，让几个汉奸伪乡长和警察出面，我们趁此捉住几个人，一个是美岱乡的伪乡长刘温，一个是东老丈乡的伪乡长刘兵，还有王经雨的两个亲戚，一个是乔茂，一个是巴三女。两个警察没看好被跑掉了。

敌人一看上了当，第二天就调动大批兵力开始搜山，那天正下雨，从山腰到山顶群山云密布，我们看见敌人后，就往山顶撤，走到云彩里敌人下气看不见。连续一个月，敌人搞了几次搜山，始终找不到我们的下落。这时我们驻在沙图沟的八峰、九峰顶上，白天监视敌人的行动，夜里才设法弄些吃的，这期间，我政府全体工作人员的处境很困难，尤其是脚上穿的鞋特别费，遇上下雨，鞋更烂得快，所以，有的同志用麻绳绑，有的干脆没鞋，但仍然坚持斗争。当时，我政府人员有王经雨、王弼臣、雷电云、赵顺、郝云、刘克文、张杰芬、长威子、芦子伟、李俊青、董玉海、董二来宝、长才子、马建国等十几人。这些同志一有机会，就到一前碗沟、大南沟等地活动。九月份，在大南沟还用大烟向一个叫大洋坛的人买了一头牛杀的吃了。

天气渐渐冷了，在山里十月份就得穿皮袄，但到哪里去弄呢？后来，长才子到庙尔沟底赶了地主的一些羊杀了，把羊皮晒干做皮袄，有的同志用麻绳捆着顶鞋穿。雷电云同志把羊皮割成四方片子，用绳子捆在身上穿。就这样，坚持了一冬天。

四二年冬，王经雨同志调回山西偏关县参加学习、整风，留下王弼臣同志领导这个抗日游击根据地，这时候，日本人不常到山里来，主要是与鄂友三磨擦，一个叫存良子的同志被鄂友三的匪徒捉住，敌人把黄色炸药给塞到嘴里，安上火管点着炸死了，十分残忍。

四三年春，我们与鄂友三闹开了。在乌良石太打了一仗，我们先占了岗哨，后进了村，那家伙们还憨虎虎地睡的呢，这次我们俘虏了一些电台人员和修械队的人，但没弄住电台。

三月份，考虑到我政府人员少，老磨擦下去对我不利，就

决定放弃这个地区去水磨沟、井尔沟一带。一前晌的老百姓知道后，再三挽留，王弼臣同志给群众做了很多解释工作，说走也是暂时的，但群众还是恋恋不舍。临走，有的群众送我政府人员老远才回去，有些就跟我们参军来了。

去水磨沟不多时，领导同志就回山西整风去了。张志芬同志也调到归绥四区，去不长时间就牺牲了。后来，井尔沟也被土匪围几占了，咱们的人转移到归绥（现呼和浩特）东北的哈拉沁沟，只留下一些能存在住的地下党员坚持斗争。

一九四四年后半年，山西派来九团，四五年七月河北来了二十七团，战斗力都很强，把国民党自卫军的人可多处罚了，这时，坚持在大青山的我政府人员也下了山，开展工作。

党从山西派来一批干部接收了毕克齐，当时，大部分人打归绥去了，小部分留在毕克齐，并宣布，原来是游击战，现在变成阵地战，没有上级的命令，就不能撤离阵地。

抗日战争时期萨县的一 支民众抗日自卫军

贾海山

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平、津失守，河北、张家口先后沦陷，祖国半壁河山被日寇侵占，绥远地区的局势日趋紧张，值此国难当头，萨县的一批爱国知识分子，互相联系，发动县保卫团和各区的民团组织起“萨县民众抗日自卫军”，由陈之的（号称塞外文豪）任旅长。一九三七年九月萨县沦陷，陈之的跟东北挺进军副司令黎明接头，把这支抗日民众武装改编为“东北挺进军骑兵第二旅”。改编后，陈之的要去后套（今巴盟）傅作义那里，遂推举刘盛五担任了该旅旅长，副旅长卢明谦（字益三），是马占山派来的，刘承邦任参谋长，李继美（绥远省运动健将）任副官主任，李明任军需主任，秦贵庭任秘书。该旅下辖两个团，张飞生任三团团长，这团共四个连。第一连连长武占胜，二连连长杨耀山，（人称杨白皮），三连连长葛玉峰，四连连长郭占胜。四团团长贾海峰，这个团所属四个连，第一连连长周占胜，第二连连长杨玉川，三连连长姚连山，四连连长陈德富。第二旅除两个团外，还辖三个特务连，直接由旅部指挥，三个特务连连长是张建

业、高怀忠、柳愣子；还辖一个通讯排，排长刘满仓（永泰），总共有一千二百多人。

萨县沦陷后，骑二旅奉命撤到黄河南岸。当时该旅的任务是守卫河防，西起张义成窑子、海留素，东至托县附近。第四团驻在厂汉不拉和海留树村一带，防守十二顷地渡口和高龙渡口，以黄河为界，与日寇对峙。

一九三九年冬，骑二旅奉命深入敌占区，袭扰敌人。旅部命令三、四两个团攻打托县，由刘承邦参谋长带三个连，一个通讯排，袭击归绥。攻打托县和著名的尔林岱战斗就发生在这年冬天。

一、托县战役。三团张飞生和四团贾海峰率领所属部队，经过一夜行军，到托县城附近，拂晓战斗打响，由于敌人驻托县的战斗部队不多，又不了解攻城部队的情况，再加上敌军睡梦初醒，我军枪法又准，激战约两小时，托县城门被打开了。接近中午，敌人又调来大马队（骑兵）和几十辆汽车增援，因我军装备武器不及敌人，奉命由南门撤退，日寇乘势进城，我军采取化整为零进行了隐蔽，但只躲过了敌人的汽车，没能躲过敌人的马队。幸亏我军的回马枪法准，命准率高，敌人不敢继续进击。所以我军伤亡不太严重，两天后部队亦先后归队。

二、尔林岱战斗。一九三九年冬，骑二旅的任务袭扰归绥市。刘旅长和参谋长刘承邦带了三个特务连一个通讯排过黄河深入敌占区，留副旅长卢明谦和少数战士继续守卫黄河。沿途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到了察素齐。刘参谋长组织战士爆破了桥梁和一小段铁路，割断了电话线，向车站虚张声势放了一阵枪，就撤走了。当行到铁湖村，天已黑了，于是就在这个村过

夜。老乡们传说：“南军过来打日本鬼子了。”群众大力支持，人吃的粮，马喂的草料如数凑齐。第二天算清了人吃马喂的钱，如数交给了村公所，就出发了。兵行至长哈赖村附近，听村民们说常子义部队正和日本鬼子战斗，旅部派高怀忠连援救。他们迂回到敌人背后，出其不意地向日寇袭击，高连长身先士卒，向敌人展开猛烈进攻。日寇腹背受击阵势慌乱。高连长发现坟堆后敌人机枪手，正向常子义部猛烈扫射，于是从背后猛扑上去，打死了机枪手，卡死弹药手，亲手夺下一挺歪脖机枪。敌人背后受到重创，无心恋战只好撤退。我军既打击了敌人，又援救了友军，随即向大部队去向赶去。

尔林岱是离归绥（今呼和浩特市）五、六十华里的一个小城堡。村周围是大树林，旅部所属各连先后到达尔林岱后，战士们也困乏了，于是就在这里驻扎过夜。第二天拂晓城上站岗的士兵听到远处的汽车声，派人去报告，此时旅部来了一个老乡传密说：“这里的自卫队长当你们一进村他就骑马跑了。”听了老乡和战士的报告，判断无疑昨晚走了的人是个汉奸，给敌人报信去了，现在敌人兵临城下情况紧张，刘参谋长即布置各连准备战斗。

日军的大批汽车、骑兵把尔林岱团团包围，特别是在城堡南面布置了强大兵力，企图堵截我军退路，妄图一举全歼于此。日寇先用大炮轰击。敌人不知城堡究竟有多大，大部分炮弹越城而过，炸毁了他们自己的汽车。对面的敌人还以为是我方的炮弹，由于林密和硝烟的弥漫，敌人的望远镜也看不清，虽有此错觉，就这样炮轰了一个多小时。当敌人相互联系弄清楚后，已有二、三十辆汽车被击毁了。后来敌人把乘马隐蔽了，徒步向城堡攻来，轻重机枪向我军猛打。我军一枪不发，当日寇

攻到城堡临近时，我军机枪、步枪向敌人猛烈射击，敌人应声而倒，死尸横七竖八躺在城堡周围。敌人之所以死伤这样残重，皆因我军大多数战士是久经战斗的老兵（抗战前参加过剿土匪的战斗），他们的枪法准（晚上还比赛打香火头呢）。仅特务三连连长柳愣子，双手拿着盒子枪（手枪）就撂倒许多日本鬼子。当时发现大树后日寇的一个指挥官在指挥攻城时，一枪就报销了。他请求旅部批准让他一人出城夺敌人的武器，后来被劝阻说服。中午，日寇派来两架战斗机增援助威，因看不清目标，胡乱投了几颗炸弹，并用机枪扫射了一阵飞走了。战斗持续了一整天，刘参谋长身负重伤，我军也有不少伤亡，又且弹药也不多了，入夜枪声渐渐稀疏，于是我军动员了战士和部分老乡在北城墙挖了个大洞，用高粱秆、麻秆垫平城壕把马拉过去开始突围，经过约一小时的激战，终于突围了。在突围时我军略有伤亡。在这次战斗中打得最出色的中尉副官候秉臣牺牲了，连队的伤亡更不必说。我军撤出后，从托县的河口过河返回驻地，这次战斗日寇伤亡残重，几十辆汽车被炸毁，一百多日寇被击毙。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日寇的威风。尔林岱的战斗是萨县民众抗日的光辉一页，我们不能忘怀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萨县的优秀儿女们。

一九四〇年冬，日寇不甘心失败，为了报复，调动了汽车、大马队从高龙渡口过河向第四团防地进攻。我军从河畔撤到新召（新召离河畔约十多里，座落在南沙梁上），贾海峰指挥战士凭借沙梁阻击敌人，敌人的炮弹大量倾泻，贾海峰附近有几处炮弹爆炸，把他震得昏过去，沙土埋了半个身子，是经常跟他的一只白狗跑来拨开沙土，用舌头舔他的脸使他慢慢苏醒过来。当他苏醒后继续指挥战斗，由于敌人的汽车不能深

入，马队又不敢冲进沙里，战斗进行了多半天，敌人就自行撤退了。事后战士们议论说：“咱们的团长是个念书人，可是打起仗来还挺勇敢。”

一九四一年骑二旅调到伊盟准格尔旗纳林、暖水、德胜西一带驻防。黄河南岸的防地由五路军司令郭长青部接管。

一九四二年，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马占山整编了第二旅为第三团，由马占山的特务营营长徐国华任团长。刘盛五调到骑五师当副师长去了；贾海峰去东胜县任县长，这支部队从此离的离，散的散。如第四团董占海原是排长（郭长青的表兄），到五路军当了团长，从此把一个旅改编了一个团。这也说明几次对日作战中，这支抗日武装伤亡之残重！萨县的许多优秀儿女，在八年的抗战中光荣牺牲。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马占山部奉命向东挺进，而萨县民众抗日自卫军的战士回到家乡的人数却很少了。

解放前萨县工商经济概况

张静安

萨拉齐是清乾隆初（约1741年）在口外设置的五厅之一，民国元年（1912年）改厅为县。萨拉齐县，是1958年土默特旗与萨拉齐县合并前的建制称谓。1969年1月1日分制后改称土默特右旗。

清末民国初的萨拉齐，是绥西大邑，是塞外的名县城，在交通闭塞时是东来西往各种物资的集散和交会地。更以她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水利资源充足，宜农宜牧宜林的自然环境和盛产农副土特产品以及牲畜、皮毛、药材、丰饶的矿产资源等优势，为工商各业的发展、成长、壮大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但蹉跎的岁月流逝，又使得工商各业时兴时衰。清前中期当地工商各业景况如何，已难稽考。现就清末至全国解放初期的工商经济兴衰状况概述如下。

一、清朝末至民国初

清顺康之时，已松弛边疆禁令，继而实施“移民戍边”政策。山西、陕西汉族能工巧匠便携眷属，偕亲友相继移居口外各地谋生。或租垦务农，或做工、经商，以其一技之长，各操其业。到乾隆初，这里已经是人烟辐辏，各业皆备，百业兴旺的大邑。及至清末民国初，地处边陲的萨拉齐，社会尚且安定，物价亦较平稳，经济繁荣，市面活泛。就工商贸易而言，以粮、货、钱、当、四行最为繁盛。计：粮行有新盛店等七家（大户）；货行有和合店等五家（大户）；钱庄银号有公和德等二十二家；当铺有源泉汇等四家。此外，鄂尔格逊、沙尔沁、苏波罗盖、毛岱、善岱和独立坝六镇还各有一家当铺。其余商业有山货、杂货、皮毛、医药、饮食、糕点、油酒米面（六陈行）等；当时没有较大规模的工业，仅有铁木、铸铁、造纸、黑白皮坊、糖粉、毡毯织造、毛口袋织造、成衣等手工业作坊；服务性行业有少量的货棧、牲畜店、客店、留人小店、车马店等。所有行业中，前四个主要行业都握有雄厚的资本和可观的从业及雇佣人员，他们操纵着整个县境的经济命

脉和市场物价动向。其余各业虽都具各自特点，但一般资金较少，人员不多，获利较微，但是在人民日常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工商各业的经营情况

粮行有充足的货源，除当地加工消费部分外，亦销于包头、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丰镇等地，其余则在就地各粮店间抬压价，弄行情，互相买卖，有实买实卖，也有空买空卖。民国十二年（1923年）京包铁路通车后，不仅粮行，给各行业都带来新的生机。粮食可以远销山西、河北、山东、京津等地，售价优于当地，获利尤多。

皮毛、药材历来远销京津等地。

货行经营范围，都是群众日常所必需的商品，如各种布匹、绸缎、生、水烟类、糖、茶等大路货，故业务一直兴盛。

钱行操纵着当地的经济命脉，他们既营汇兑，更作银（两）钱（制钱）兑换，是各行业发生交易和民间购售交换的经济支柱。

当铺，盘剥虽手段惨毒，但对一些急于办事、告借无门者以物贱抵，起一定缓急的社会作用。

其他商业，服务业共为各自谋求生计和获利而勤于经营。

手工业产品多以地产地销为主，少量产品亦外销，如木制车辆、毛毡、皮衣、毛口袋、纸张、铸铁产品等，唯地毯（当时叫裁绒毯）当地销量不大，主销于包头、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以及京津等地。

那时的经营方式，货行、山货行等行业派人外出选购商品运回销售，而粮行只懂得就地经营和接待外客销售，各大粮、

货、店栈，都自己设有房间，专供来客长短期宿食。通火车后，粮行亦派人远出推销。发生交易时，既有现款现货，也有期款期货，更有赊、欠和买空卖空等方式。同行业之间，亦常有大户压小户，甚至把小户挤垮的，故那时有“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之谚。各行业间常有一举暴发的，有一溃倒闭的。

交通运输状况

当时的运载和代步工具，主要是骡、马、牛、驴和骆驼及各型旧式车辆。达官显贵、豪绅大贾远行，乘坐人舁轿子、乘坐骡马驮轿或较为讲究的红拖呢二骡、三骡轿车等；中等阶层的雇坐一般轿车、大车、乘骑马、驴、骡而行，生活贫困者步行跋涉。

货运，主要是车辆。分骡马挽拉较轻巧灵活的花木轮车和较涩滞实垛木轮及牛拉二柄车。每辆车的载重量都超不过千斤。运程、车达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集宁、丰镇、大同、张家口、太原等地，也偶达京津。运去者多为皮毛、药材、农副土特产品。运回者多为各种绸缎、布匹、生、水烟、糖、茶、铁锅和各类日杂、调味、果品、海鲜等物。西去包头、五原、临河乃至甘宁等地。运去者如前，运回者多皮毛、药材等。也有雇用骡、马、驴、骆驼驮运物资的。

当时没有运输公司之类的正规营运机构，萨拉齐县城内却有许多“揽头”。他们向各行户承揽营运业务，再找养车户包雇车辆，从中收取费用。萨县城周各村有不少专搞营运的养车户，多者百余辆，少者十几辆。如美岱召的四满囤养车120多辆，板申气村的杨拐存养车100多辆，陶思浩的铁门更、张金

全各养车100来辆，西老藏营的张二胎养车10来辆。这些养车户既可承接“揽头”的雇用，也可自己直接揽脚。

用今天标准看，它笨重而落后，且耗费时日，运量不高，但在社会、交通、科学尚未发达的当时，却对沟通东西地域与本县的各种物资交流，满足各族各界生产生活所需，发展地区经济活跃与繁荣，有着历史性贡献。

金融状况

清代至民国初，当地市场流通的货币，以银子、制钱两种并用。大宗交易以银子为主，寻零或小生意则用制钱找兑。银子与制钱兑换，有当地的兑换比价。大份额银子，以其铸造型状，多叫“元宝”每份重五十两，小份的五两，还有碎散银块。使用时用戥子衡其重量。还辅以铜元（俗称“铜子儿”）。

明万历年间，外国银元开始流入中国。清道光年间，台湾仿铸，时称“银饼”。光绪十四、五年广东铸“龙洋”。宣统二年（1910年）颁布《币制条例》，规定银元为本位币，翌年开始铸造，后因发生辛亥革命停铸，民国元年（1912年）铸孙中山半身侧面像的开国纪念币，1914年起铸袁世凯头像银元。1931年国民政府废两改元，颁布了《银本位铸造条例》，开铸有帆船图案的“船洋”。1935年国民党实行法币政策，禁止银元流通。

在当时，国家没有在萨县城设立货币金融机构。山西等地一些私人资本视萨县有利可图，先后来萨县开设钱庄银号共二十余家。计：集义和、德玉和、复义厚、义源厚、德生永、德义昌、德和昌、公和德、永盛和、永和庆、宝泉泰、永兴玉、德生泰、福泰恒、福和长、福和庆、复合泰、广义和、义兴恒

德瑞生、裕通银号等。他们的资本，多者一、二万吊（制钱每千文为一吊，下同），少者二、三千吊。他们专营制钱与银两兑换业务、开具“钱帖子”在市场上和工商各业间转帐和流通。也可随时持帖向原出钱庄银号兑取银两或制钱。殷实的商号亦可出具自己的“钱帖子”。民国初年开业的天泰店也出过自己的“钱帖子”（原天泰店的记帐大先生即主管会计，最后一任该店经理杜光礼说）。

民国四年（1915年）阴十一月二十六日，大土匪卢占魁率众攻陷萨拉齐县城，经四天无情的洗劫，各钱庄、银号随之倒闭。四家当铺（分东西南北当，东为复兴泰，西为泰恒玉、南为德和成，北为源泉汇。年限最久者为源泉汇，开业于清道光年间、最近者为复兴泰，开业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也为之歇业。货行的大东店管帐先生银梅等三人不予开钱柜被当场击毙。其他工商各业无一家不被惨劫。

被劫后，萨拉齐市面金融动乱，人心惶惶不安。为安定社会，解脱困境，经县商务会开会决定，成立当地的金融所，发行以铜元为本位的流通券。面额为十枚、二十枚、三十枚、四十枚等数种。这一措施，使紧张趋势得以缓和。其时，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发行的一元、五元面额的纸币亦流入本县、但不完全通用。

民国十二年（1923年）京包铁路通车后，各省大银行的钞票随各火车站处流入，也流入本县使用。

民国十五年（1926年）突遭兵变，市面再次混乱。为此县商务会鉴于环境之不安定，再次开会议决，收回流通券，就地销毁。这时，已有绥远省平市官钱局发行的平市票流通，面额为十元、五元、一元及辅币一角、二角、五角和铜元票，面额为

十枚、二十枚、三十枚、四十枚。这时仍以银两为本位。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4月6日国民政府宣布，即日起废两改元，废除了银两制，以银元为本位。

同年，绥远省平市官钱局来萨拉齐大东街新盛店院内设立分局，办理银行一切业务。成为萨县城内最初唯一的金融机关。平市票有兑现与不兑现之分。不兑现者，票面一元，月折现洋四角。角票亦同。铜元票尚可一律使用。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1月4日）国民政府通令全国，以中国、交通、中央三大银行发行的纸币为法币，废止使用银圆。银圆遂成为禁品。日寇侵华后，这些钞票（法币）亦停止使用。

1937年10月（民国二十六年）伪蒙疆政府成立，发行了蒙疆银行纸币，停止了日寇侵入初曾使用的满洲中央银行、朝鲜银行和察南银行纸币。面额为百圆、拾圆、五圆、壹圆四种；钢质渡铎辅币为伍角、壹角、伍分三种；铜质零币一分、五厘二种。1940年又发行了角票，面额为伍角，壹角，伍分三种；这种纸币使用至日寇投降。它给千家工商各业，万户老百姓带来无限灾难。萨拉齐城内万盛和稍美清茶馆回族经理马温发财心重，借日寇宣布投降之机，罄号所积油、糖、面、日夜赶制干货，售价高往日多倍，所得蒙疆币很多。国民党政府接收了萨县城，宣布不予兑换，万盛和随之倒闭。大北街农民杜大年过日子很节俭，存得蒙疆币两铁合，日寇投降后成为废纸，气的老汉抱着废币痛哭流涕，几乎失去生命。

1938年8月8日，蒙古联盟实业银行厚和分行派孔宪权来县城大东街新盛店院内租设行址，设立实业银行萨拉齐县分行，营业至日寇投降。

1947年秋，由萨县地方武装头目刘盛五纠集财绅、商务会等头面人物在和合店院内筹组县银号，以集股方式筹集资本，共设150股，每股法币50万元。刘盛五自任董事长，天泰店财主马连普任经理，贾肇明任副经理。后因多种原因，于1948年中国解放军第一次解放萨拉齐前结束。

综观清朝末至民国初萨拉齐县工商经济是兴盛的，但经卢占魁一场洗劫，使全县经济顿衰濒临绝境。

二、民国五年至二十六年（1916—1937年）

萨拉齐被土匪抢劫之后工商各业在艰难中挣扎。劫后尚能维持下来的较大行店有粮行，新盛店、德昌店等，货行、大东店和合店等，残剩的钱店公和德等。其余中小行店也在困难中寻求新的生机。经过几年的艰苦经营，才逐渐使全县经济复苏。

民国十二年（1923年）京包铁路通车前后，全县经济再现繁荣，仅粮店又添四家。

民国十五年（1926年）发生了国内军阀混战，也直接波及到萨拉齐县。阎（锡山）、冯（玉祥）、直系大批军队先后过往县境和驻扎。大量军需粮草、物资、差役迳向粮行等商界、农业逼要。当时虽亦付款，但经层层克扣，及到商农之人已寥寥无几。特别是冯军发行的西北银行票，给全县工商等各界带来极惨重的经济损失。当时即有五家粮店歇业。其他行业倒闭者也为数不少。全县经济再次处于低潮。

兵灾过去，又来匪患。1927年，阎锡山收服了土匪徐文标，昔日的土匪，竟公然驻防萨拉齐县城。当时匪即兵，兵实匪。城乡百姓不得安宁。1928年换来一团正规的晋军驻防，土匪才

无法进城扰乱了。但乡村还是土匪的天下，惨无人道的抢掠、烧杀、吊打每天有之，致使广大农民无法安心生产，富裕人家即被抢掠一空，有钱人纷纷逃入县城居住。尽管如此，三五成群的小股土匪还是设法进城“请财神”。以这种“绑架”方式作为人质，向被害家属提出苛刻的索要条件，勒索财物，并以人质生命相威胁。在如此动乱的情况下全县各族各界人民，惶惶不可终日。据此，阎锡山（当时绥远属，山西省管辖）于是乎特派剿匪司令赵承绶来绥远坐镇。以坚决而强硬的征剿手段，在不到两年内，全省土匪基本被剿除。社会局势日趋安定。萨县的工商业界逐渐好转。

1931年，傅作义将军任绥远省主席，由于措施果断，禁种鸦片、社会秩序稳定、铁路公路交通运输畅通，电讯等设备日益完善，商品来源无阻，物价基本稳定，萨境内小股土匪亦被肃清，工商各业又走上了兴旺发达之路。

1937年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七七”芦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占据了北京、天津，华北各省相继沦陷，于是中国人民奋起抗战，拉开了中日战争的序幕。由于蒋介石采取了不抵抗政策，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进犯绥远，敌人的铁蹄于1937年10月16日（民国二十六年九月十三日）踏进了萨拉齐。从此，萨县人民过上了暗无天日，任人宰割蹂躏的亡国奴生活。

三、日寇侵占萨县至解放（1937—1949年）

日寇侵萨后，秉承其主子的意旨，对我国人民进行残酷的统治和血腥镇压。1937年冬建立了它的政权——萨拉齐县公署。强制推行其积极反共，镇压人民，封闭市场统制物资，贪梦地

攫取中国宝贵资源的罪恶行径。

为了显示他的镇压革命和抗日军民的威力，在县城大东街小学和回民三道巷等处常驻有日军多名，经常出入大青山一带，对付大青山游击队的革命活动，实施其“三光政策”。水洞沟门西湾果园附近阿门板申村、板申气村北沟口的后湾等村，就是在日寇烧、杀、抢光的村庄，永远从萨拉齐县地名图上湮没了。

县城里，驻有权力极大的日本宪兵队，手段残酷毒辣的日本特务机关及监视人民言行的警察署。在县属的五个区，都设有警察署进行严格控制。这样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县。

日本侵略者是太上皇，日本人和狗可以为所欲为，凡有日寇之处，中国人无论男女老幼必须恭恭敬敬地向其行90度的鞠躬礼。否则，非打即骂，甚至监禁杀害。日寇的特务走狗可以任意抓捕无辜的中国人，惨遭杀戮。便衣警察到处敲诈勒索，把工商各业者作为主要对象。更为毒辣的手段残害中国人民，让农民广种大烟（鸦片）。

对所有工商各业强行组合制进行物资统制。如把粮行强制到一起叫“粮业组合”；把卖肉的强制到一起叫“肉业组合”；把特别兴盛经营毒品（鸦片）的纠合到一起叫“土业组合”等等。对工商各业货物进销严格控制，对民用棉布实行配合制，对粮食、西药控制尤为严格。在这样的处境下，各种糖业，要么倒闭，要么坐以待毙。据《萨拉齐县志》记载：成纪七三二年（1937年）全县共有26个工商行业，269户。（其中）粮业6户，货业24户，制粉业37户，生熟铁业26户，……阿片（鸦片）贩卖业45户。到成纪七三四年（1939年）只增加干货业2户，成衣业2户、中西药、屠行各1户，倒闭了23户。

棉布、百货、日用杂品等主要商品，长期由日寇的三大洋行所垄断。全县城工商业户都处于奄奄一息中。

1945年，许多市民缺衣少食。每天到指定地点排队买配给粮，每次排队只限购高粱面5市斤。食盐，火柴几乎买不到，许多农市民炊饭用火，不得不用原始社会的火石火镰来引燃。城乡人民骨瘦如柴，面无血色，在饥饿线上挣扎。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向中国人民宣布无条件投降了！让日寇蹂躏了八年的中国人谁不为之欢欣鼓舞呢？善良的人民认为，天下从此太平了，再也不受人欺侮了！可人们没有想到，前边赶走豺狼，后面进来猛虎。国民党的军政要员及其统治机构的人员来了。他们为非作歹，甚至超过日寇！

1946年国民党蒋介石发动了打内战，抓兵逼粮，苛捐杂税，横征暴敛滥发钞票，物价飞涨，土匪遍地，军警特宪人员横行无忌，人民生活又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工商业者在物价飘摇中挣扎。

1948年11月7日晚，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萨拉齐县城。当晚，他们没有惊动老百姓。在零下20多度的严寒气候下，露宿街头的屋檐下。翌日早晨老乡开了门，才发现是军纪严明的人民军队。这天上午，部队派人到老百姓家协商占用多余的空房，秋毫无犯。战士们住入民房后，首先为房东担水扫院，并帮助干活。他们自带粮食，自做自吃，决不给老百姓添麻烦。即便需用老百姓的食物等，都要照价付款。失手打破家俱要照价赔偿。所有这一切给饱经日寇和国民党军警使用野蛮手段不打即骂、任意欺凌的老百姓和工商业者，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因此，萨县人民对解放军的军风纪，到处称赞，称我军是世界上最好的军队。对国民党诬蔑共产党的种种欺骗宣传不

攻自破。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伟大、正确，^{任群}群众中的影响极大。

萨县各族各界人民群众精神振奋起来了，工商各业积极经营，其他各界都从其业。整个县城充满了生气，欣欣向荣。不少青年敬佩解放军，积极报名参加了军。

由于战略需要，我军于同年12月上旬撤离县境。撤出前，用银圆如数兑换了流通于市场的边区纸币。仅此一事，博得全县人民一致的赞誉，有口皆碑。

短暂的四十多天，全县人民对中国人民解放军产生了无比的崇敬，相反对国民党反动汉奸更加仇恨。中国人民解放军虽然撤走了，但革命的种子，撒在了萨县人民中间，它必然要发芽、开花、结果。

我军撤走后，国民党的党政军人员，又回来了作威作福，白色恐怖再次笼罩了全县。全县各族各界人民再次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四、解放初的工商业

在全国解放浪潮的推动下，绥远省于1949年9月19日通电宣布和平起义。从此，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再也不受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压迫了。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工人、农民翻身做了主人。根据《共同纲领》确立了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建国方针，团结、教育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为恢复我国国民经济共同作出应有的贡献。因而，对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利用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积极的一面，限制其不利于国计民生消极的一面，改造其成为国家资本主义，逐步过渡

到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根据《共同纲领》是号召工商业者，接受党的领导，逐步向社会主义道路发展，逐步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据税务、工商两局统计，1950年有工商业388户、1275人，资金1,640,630,000元，摊贩216户、307人，资金48,980,000元其中米面加工业即有44户（其中10户带油坊，2户带缸坊）。

建国初期，尽管国家有许多困难，在三年恢复时期，为了发挥社会的各种力量共渡难关，经过深入各工商业户的周密调查，对资金周转尚有困难的工商业，及时向他们发放了低息贷款，帮助其恢复生产和搞活业务。经党和政府的积极扶植，各工商业户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出现了新的生机。许多工商业者感激党和政府的扶植和支持。为繁荣和发展全县工商各业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打下良好的基础。

当时的国营企业尚未在县设点经营，供销合作社是以贸易工作队刚来不久，业务和商品规模都不大。在此情况下，一些不法的工商业者认为有机可趁，妄图与共产党争市场，想独霸市场，非法套购和抢购当时紧缺物资，如棉布、棉花、土布、粮食等，企图囤积居奇、垄断市场，牟取暴利。国合企业立即予以回击，迅速调入大批物资公开抛售，既可卖给农市民，亦可批发给工商户。一举击败了不法工商户的美梦，取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

国营在纱布、百货、粮食油脂等公司相继来县设点，开展购销业务，确立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

人民政府和税务工作人员中，既有东来的新生力量，也有就地参加工作的旧人员。他们的思想意识各不相同，有的保持廉洁公正，有的行为不规。个别工商业者为了私利进行偷漏国税，

用行贿拉拢等手段，使一些意志薄弱干部下水。基于此，为了严明党纪国法，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决定，从1951年底开始，在国家工作人员中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1952年初，又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1952年夏两个运动取得了伟大胜利。人民政府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对违法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处理规定了：“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的基本原则。在认真查证核对，弄清真伪轻重的原则下，分别作出处理。对“守法户”和“基本守法户”，进行爱国守法教育，让其遵纪守法，照章纳税，合法经营；对“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强令他们限期如数补交其所偷漏的税款和罚款。通过这两个运动，挽救和教育了一批犯错误的干部，并引以为鉴；处理和惩办了一批违法犯罪分子，以戒其后。

1953年11月，国家颁布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粮食油料统一由国家经营，彻底取代了全县的粮行（如天泰店、五和堂等）、六陈行（米面加工业）。从业人员，有的国营粮食系统接收过来，成为国营粮食系统的职工，有的使其另谋它业。

棉布等行业通过经销、代销“私改”方式，逐步过渡到国营企业。造纸、精粉商业德生泰和利民粉厂率先于1954年公私合营。其余工商业首经工商业联合会经过几年的培养和教育，逐步提高了思想觉悟。在1958年的大好形势下开展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全县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都在敲锣打鼓炮响连天的欢庆声中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从此，过去一家一

户的私营工商业，都被纳入国营经济轨道，在国营经济直接领导下，向社会主义广阔道路上奋勇前进。

解放前萨拉齐县教育概况

胡智登

清王朝时期

萨拉齐县位于阴山之阳，黄河之阴，东起归绥（即今呼市郊区）和托克托县西界，西起磴口县（今巴盟）以东，拥有土默川和河套两平原，更加西有黄河、五加河、珊瑚河等河流，东有黑河，北部沿山一带又有万家沟、黑牛沟、美岱沟、水涧沟、五当沟等沟水灌溉。这两个平原，土质肥沃，水源充足，真可谓“沃野千里”之大县矣。

自然条件既如此优越，在文化教育事业方面亦应有一较理想的发展。但由于清王朝实施愚民政策和当时各级官吏的敲诈勒索，以及当地商人（专门用金钱疏通蒙古王府官员诱买蒙民自己所应有的大片马场草地），于是他们变成了大地主后，便对劳动人民进行惨酷剥削。而劳动人民虽经官府允许可打草种地，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开垦土地，但真正落在自己手中的土地，实在微乎其微。为此，劳动人民仍得靠出卖劳力为生，为剥削者受苦卖命。人民大众的生活，处于贫困状态，其

次，加之地处塞外，交通不便，意欲勾通内地塞外文化，确有困难，尤以河套平原为甚，因其土地辽阔，人口稀少，居住分散，形成三家村、两家寨之局。相距三到五十里者居多，兴办教育事业，谈何容易。因而本县文化教育事业，处于极度落后状态，文盲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八以上。

“私塾”的形成

“私塾”，早在本县放垦以后不久，由于以下两种原因，而逐渐形成：

一、地主老财为了维护其既得权益，持续向劳动人民进行剥削，便想方设法延师设馆，令其子弟念书识字，以加强其剥削能力。

二、劳动人民为了防止地主老财们用“黑笔点人”一即记帐时，以多记少，或以少记多的鬼伎俩来欺骗他们。他们也想叫孩子们读几天书，识几个字，于是在比较大的村庄里由粗通文字或外地来的稍有文化者，自行设馆授课，成立了“私塾”。

“私塾”的教材为《百家姓》、《三字经》、《四言杂字》、《七言杂字》、《千字文》以至“四书”、“五经”。其内容除“四书”、“五经”外，皆系识字课。如《百家姓》，从“赵钱孙李”起，罗列了一百多个姓，《三字经》的内容较为多样，内有指导教育儿童的方法，家族系统说明，历史、历代自学成材的名人和动植物简介等。《四言杂字》中有：“风云雷雨、雾露雪霜”、“获冬半夏，当归川芎”等句。《七言杂字》中有：“锹柄斧头镰刀齿，耙把扫帚大锹扬”等句。使学者初步懂得各种事物的变化，名称和工具的读法及写法。《千

字文》即将一千个单字，编成顺口句子，让学者做到“三会”（即会认、会背、会写）。

“私塾”的学期分为两种，一曰“长书”，前半年从农历二月上旬开学，六月中旬放假；后半年，从七月中旬开学，腊月上旬放假。一谓“春冬书”。“春冬书”的学习期是：前半年从农历二月上旬开始到三月末放假；后半年，从十月开始到腊月上旬下学。前者，学期长、纳费多、多系富家子弟。后者，学期短、纳费少、多系贫苦人家子弟。他们除了纳不起较高学费外，主要原因，是由于他们都已成为家庭中必不可少的辅助劳动力。所以他们只能在农历二、三、十一、十二等四个月内参加学习。有的只能读一、两个月“春冬书”就辍学了，他们仍是文盲。好的只能写自己的名字，记个豆腐帐或能看懂一点人工帐，这就是当时的文化教育现状。

“私塾”的延续期很长，直到民国十五、六年（一九二六——一九二七）间，仍有“私塾”存在。

清末民初之际，“私塾”的教材逐渐加深，有的“私塾”除讲解“四书”、“五经”外，还加授《左传》、《礼记》、《古文释义》和《国策》等书。因此学生质量便有所提高，为当时的社会，培养了一些启蒙师资。“私塾”在数量上虽有所增加，但大部分村庄的儿童还是没有读书的地方。就是有“私塾”的地方，每所“私塾”的学生人数，也不过十几至二十人左右。其中，最有名气而又受到群众拥护和学生爱戴的“私塾”先生（老师），要算萨拉齐县城里的潘恒（清末秀才）书房、胡德升先生书房、大营村赵英（清末秀才）书房、北漳村武志学（清末秀才）书房、善岱镇樊汝济先生书房、保同河村的老根先生（蒙族）书房，鄂尔托套私塾书房、富日新、富佩

端、后来官俊里。还有象沙尔沁村由张端、张贤等“私塾”也都享有盛誉。尽管如此，仍远远不能满足本县求知青年人的愿望，意欲深造，尚需跋山涉水，远离家乡去外地就学。

官办学校

官办学校，开始于清同治八年（一八六九），由邑同知文山暨绅商李联香等筹建，定名为“育才书院”。院址在县城内关帝庙东，设备简陋，设教师二人，文山自任总监。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书院迁移到城内大东街，改名为“蒙小两等合设学堂”，群众称之为“大学堂”。管理学堂事务所为监督，由同知兼任，并聘请地方绅士赵振九、王玉如为副办。王淦文为正教员，赵运昆、曾继孔为副教员。教材只讲授“五经”、“四书”、《礼记》、《左传》、《国策》、《史记》等。学生人数仅为三、二十人，及至清光绪三十四年，清王朝日益腐败衰落，与外敌交锋，每战必败。当时，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进言清帝，变法图强，广设学校，培育人才，以御外侮。萨拉齐县随着全国兴办学校之风，即将原有的“育才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堂务由张贵任堂长，聘请贾祥、潘恒、刘河、周树檀等人为教师。并改变了教学内容，除讲授文史外，增授算术、自然、体操等科。学生人数大大增加，堂内分甲、乙、丙三班授课。此刻该校呈现出一派兴旺发达，蒸蒸日上之势，为后来省、县造就了不少人材。如：留学美国的郝志厚（定远）、上“北京大学”的白映星（镜潭）、陈志仁（之的）、上北京师范大学的张国宝（仁甫）、张登鳌（占魁）、上“北京医学院”的刘铎（振声）、李秉芳（子馨）、上“北

京中国大学”的程国英（俊卿），去山西上大学的有：刘昆（玉山）、马定国（可一）、周善举（效文）、张云汉（寿山）、杜晋臣、胡嗣业（季宗）、杜子质、任和卿、赵绥亭。到其他地方学习的有刘聚章（会文）、李玉林、安祥（子祺）等。都是在该校毕业的学生，就是后来留学美国的侯璠（子焕）、留学英国的尹如川，也都由该校培育出来。

一九一一年，孙中山领导革命在武昌起义，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国后，萨拉齐县的教育事业，又进了一大步。将原“高等学堂”改称“两级高等学校”。相继由刘聚章（会文）赵子让（水亭）、温藻（佩文）任校长，内设高级班两班，初级班一班。课本改用“共和课本”。高级班的学科有国文（文言）、历史、地理、算术、另有体育、唱歌、图画、手工等。初级班有国文、算术、常识、体育、唱歌、图画、手工，学生人数，较前有所增加。

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县设“劝学所”，专办教育事务，并在包头镇设立“马王庙小学”一所，同时，在沙尔沁、鄂尔格逊、沟门、苏卜盖、善岱等村镇也都设立了学校。县城内，回民建立了“私立清真小学”，由县知事王建屏督同回民俱进会马善元、王子选等向当地回民集资建校。耶稣堂设立了“育婴小学”和“三妙女校”，天主堂也在有天主教堂的村庄内，设立了“天主堂”小学。

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政府撤销“劝学所”，改设教育局。将鼓乐、戏剧和娱乐一类的钱等项，拨归教育局征收，作为教育经费，每年向包商包收。经费有着，在外地求学的大、中学生也都完成学业陆续归来。于是，教育局便着手进行整建学校工作，从此该县教育事业遂有所改善。

一、改制：将原辛“两级高等学堂”改名为“萨拉齐县立第一小学校”，学制定为“四二制”（初级四年，高级二年），校内设高级四班、初级四班（初级为复式教学）。

二、新建：一九二五年，萨县由驻军（国民革命军）旅长孙良臣的支助建成图书馆一座，系二层楼房，交付教育局使用。当时教育局长是白映星（镜潭）。接管后，便将二楼划为图书阅览室，底楼为讲演所。备有长条靠椅数十条，可坐一百多人。每周有专人作专题演讲一次，萨县的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由此开始。在此之前新建“萨拉齐县立女子小学校”一所，在城内东、南、西、北四镇，各设初级小学一所，教育局附设初级小学（模范学校）一所，每所初级小学内，各设初级四班，教员一人，皆系复式教学。此时，萨县到外地投考学校者，几乎无一人落第，所以，上大、中学校的人数倍增，且学习成绩优良。如李仲琛、程国材、张淡孟、张国玺、张国霖、陈国奇、丁文藻、亢仁、高秀、高荣、李子英、周善祥、刘承邦、李雨田、张登鳌、董湖、贾海峰等，皆为优秀学生（人数甚多，不能一一枚举），至此，萨县教育事业可谓极盛时期，故人称萨县为文化县。

三、扩建：一九二二年，“萨拉齐县立第一小学”扩建学生宿舍三栋，修建校门等三处共计十三间。一九二四年春增设高级班一个（春季始业）。一九三八年，“一校”增建教室两间，并增设分校一处（简称“二院”）。此时“一校”的班级，扩充为高级四班（五、六年级各两班），初级四班，因教室仍不敷用，一、二年级仍为复式教学。

四、增设：一九三五年，当时国民党中央政府拨款，命令在全省各村建立义务小学，萨拉齐县除在每一行政村各设义务

小学一所外，并在县城内东、南、西、北四镇，各设义务小学一所，课程有语文、算术，课本是义务小学专用课本，专收贫苦人家子弟就学。课本和纸、墨、笔、砚等用具，均由学校发给，除城内四所学校的教员是由省教育厅直接委派外，设在各行政村的教员，则由乡政指导员兼任，由于该员等责任心差，因此，设在乡村的义务学校，则徒有虚名，却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

一九三七年秋，增建“萨拉齐县立第二小学校”一所，内设一至六年级各一班。同时，鄂尔格逊、沙尔沁、东、西老藏营、沟门、苏卜盖等村的学校，都扩充为初级小学，各设有一至四年级四个班。

日伪时期

一九三七年冬，日寇侵占绥远后萨拉齐县相继沦陷，教育事业遭受到严重破坏。二校校址（棋杆巷）被日寇法院占用。一校、清真学校、“女校”等校址均被日军强行占用。学校只得停办，乡村的学校也都不例外。

一九三八年，日伪政权，重新在西北城墙脚下，建筑了几间教室，作为萨拉齐县立第一小学校址，委派校长、教员，责令开学上课。将原“一校分校”，拨归“女校”使用，“女校”也算开了学。城内只有这两所学校复课，又因大多数家长宁可让孩子们失学，也不愿让孩子们接受奴化教育，所以学生人数顿减。后来，“大同道德会”办起一所“私立启智女校”，招收年令较大的家庭妇女入学，专讲《论语》、《孝经》，宣扬“三从四德”，另外传授“烹调”、“缝纫”等技术。它的

目标是专门培养封建时代式的贤妻良母。“纯一善社”开办了一所“私立纯一小学”，学生人数只十余名。日伪政权建立的大乡公所所在地的小学，也都陆续开学，但学生人数却寥寥无几。

日寇投降后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投降后，九月份，一校和二校（女校与二校合并）城内东、南、西、北四镇小学、清真小学都开学复课。经过日寇八年统治后的萨拉齐县各校，虽已复课，但其容量，远不能收容更多而又要求上学更迫切的青少年入学，许多儿童仍被拒于校门之外。

一九四六年春，增建崞县巷小学一所，各乡村小学也都陆续复课。城内开学的还有：“天主堂小学”、万国道德会私立“启智女校”（设一至六年级各一班，开始招收青少年）、一贯道“崇德小学”等三所私立小学。

一九四六年五、六月间国民党萨县“参议会”议长刘昆（玉山）、副议长陈璧（昆山）、参议员贾海峰、刘盛五、李瑞霖（雨田）等人组建“兴建委员会”，专向在日伪时期，以贩卖大烟而大发横财者，强行捐款，将收得捐款，用于萨县培训师资上。于是一九四七年春，成立“萨拉齐县简易师范学校”，招收正班生一百名，分甲、乙两班。另招补习班学生四十名，学习期原定一年，后因学生程度参差不齐，又延长半年，于一九四八年夏结业，分配工作。

“简师”结束后，萨县“参议会”议长刘昆主持，利用“简师”原有的一些简陋设备和教师，改为“萨拉齐县立中

学”，招收男女生一百名，分为甲、乙两班。于一九四八年农历九月九日正式开学上课，这就是萨拉齐县在解放前的第一座最高学府（即现在的萨拉齐第一中学）。

萨拉齐大东街小学校史

土默特右旗萨拉齐第一小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据《萨拉齐县志》载：“清同治八年（1869年）县同知文山暨绅商李联香等”创“育才书院”。“校址在城内关帝庙东。”创院之始，设备简陋，有教室3个，宿舍数间，小操场1块。首届招生80余名，所授科目有四书、五经、文学等。修学期限为四年，所收学生均为乡镇富豪子弟。戊戌变法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书院迁移到城内大东街，改名“蒙小两等合设学堂”，群众称之为“大学堂”。管理学堂事务者名为监督，由同知兼任，并聘地方绅士赵振九、王玉如二人为副办，秉承监督办理学堂一切事务，聘王汝文为正教员，赵运鼎、曾继孔为副教员。学生分为蒙学、小学（初级小学和高级小学）两级。蒙学设置课程有国文、算术、修身、写字、体操等；小学设置课程有国文、算术、修身、历史、地理、自然、唱歌、图画、格致、体操等。入学学生大都是有识有养人家的子弟。光绪三十年（1904年），学生达150名。为了方便学生住校学习，修建斋堂四排（共18间），另设库房和师生厨房。光绪三

十四年（1908年）取消副办名义，聘张贤任堂长。宣统二年（1910年），改聘杜巨元任堂长，贾湘任正教员。

民国成立（1911年）以后，相继由刘聚章、赵子让、祝藻至任堂长；民国6年（1917年），学校极盛，“盖因经费充足，职教员办事认真。奉令将‘蒙小两等合设学堂’改为‘萨拉齐县高等小学校’”（简称一高）。委派吕九卿、马定国、郭万福、刘昆先后任校长。设三个高级班，两个初级班，学生约150余名。其间，全体师生在“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革命浪潮的推动下，思想觉悟大大提高，教师队伍整齐，学生学业成绩较好，升学率较高。1924年国共合作后，中国革命运动出现了新局面，翌年萨县也建立了地下党、团组织，新思想和新文化在校内迅速传播。自然课教师程国材（程明达）经常秘密向学生讲授“五四”运动后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在程国材老师的启发和教育下，学生刘深源、侯绍先、胡智登、武其高、成建文、徐则林、徐传绶、梁生懋、武功、高万宝等参加了由他领导下的进步组织。杨曙晓同志，曾于一个深夜从外地来校给进步学生介绍过国内外形势，讲述过孙中山先生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此时，学校领导和教师思想要求进步，教育和教学成绩突出。由于当时学校倾向进步，有些学生后来走上了革命道路。如刘深源同学，后来在抗日战争中为祖国为民族而光荣牺牲。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不久，萨拉齐县的国民党反动分子组织了纠察队，共产党、共青团的活动受到镇压。民国十八年（1929年），校名改为“萨拉齐县立第一小学校”，先后派张登鳌、董占魁、董湖任校长。民国21年（1932年），由刘

士琦接任校长，不久，县教育局又委派赵文炳任校长。当时萨拉齐县的知识分子都集中在教育界和国民党的地方组织内部，彼此争权夺利，派系斗争激烈。是时因校长调动频繁，激起全校师生义愤，便发生了驱逐赵文炳、殴打胡继宗（县教育局长）的事件。反动的教育当局委派郭万福（景斋）代理校长，并以“行为不轨”为由，勒令学校开除了学生秦志昌、张同金等，另有十几名学生受到了记大过的处分。民国23年（1934年）至民国26年（1937年）期间，先后由张登海，张登江、王培仁任校长，设高级班4个（五、六年级各两个）、初级复式班两个（一、二年级一个班，三、四年级一个班），在校学生达230余名，

“七·七事变不久，萨县沦陷，学校被日本侵略军强占，一切设备破坏无遗，学校停办。1938年间，日军为了推行奴化教育，在大北街旗杆巷设校，改校名为“萨拉齐县大东街小学”。1942年，在西营盘大操场修建新校舍后，学校随即迁址，当时教师有8名，6个年级、6个班学生173人，课程以日语为主，另设语文、算术、修身等。日本侵略者在学校大肆宣扬亲日思想，推行法西斯奴化教育。学校这时改为“萨拉齐县立模范小学。”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接管了萨拉齐，派李沛任校长，暂在旗杆巷复课，对原来大东街校舍拨款修缮，工程告竣迁回，校名恢复为“萨拉齐县大东街小学校”。翌年，游世基接任校长。1948年冬，萨县第二次解放后，学校教师参加了由萨县县委书记高鸿光、县长章叶频主持的在萨拉齐中学（现萨一中）举办的“时事学习会”。学习了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论持久战》等著作，听了高鸿光同志“关于日

前形势和任务”，“关于知识分子工作”的报告以及章叶频、韩燕如同志的讲话。会后，任王德为本校校长。王德原是萨县观音庙街小学校长。1937年曾去延安抗大学习。他任校长后，率先领导教师复了课。解放军转移后，国民党县政府重返县城，大肆搜捕爱国人士。白色恐怖笼罩全县，王德校长惨遭杀害，其它不少教师受到追查和审讯，并撤销了游世基的校长职务。

1949年“九·一九”绥远和平解放后，萨拉齐获得了新生。1950年3月，人民政府正式接管了学校，改名为“萨拉齐县第一小学校”。全体师生积极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参加了减租反霸，剿匪肃特、抗美援朝、组织识字班等重大斗争和活动。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教育，县长董毅民亲自视察学校，并拨款对学校进行了维修和扩建。这时，学校教学班有10个，教职工16名、学生675人。教学用具及体育器械也增加了不少。1951年，张德顺接任校长后，学校除了继续扩建外，教学方面废除了国民党反动教育制度，实行了教导合一的原则，学校受到了人民和政府的好评。9月份，张德顺参加了全自治区第一次工农教育会议。1952年，学校再度扩建，到1953年，教学班增到15个，教师增到25名，在校学生达767人。1957年以后，学校全面学习和贯彻毛主席为我党提出的教育方针，德、智、体一齐抓，注重了全面发展，学校教育教学质量有了明显提高。1963年到1965年，学校根据《小学教育工作条例》（即小教四十条），把学校工作的重心放在“面向全体，全面发展，注重‘双基’”上，各项工作不断前进，质量持续上升。同时，积极响应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好人好事不断涌现，师生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1968年

4月22日，学校举行了隆重的60周年校庆活动。

1966年“文革”开始后，一些教职工被批斗，教学设备被破坏，学校工作处于瘫痪状态，严重影响了教育教学质量。

1978年，学校被定为旗重点小学。截止1979年，校办工厂和农场总收入达4万元。利用这些收入，学校购置了桌椅、乐器、体育器械、绘画用品等，还兴建了教室、办公室、厂房、锅炉房，打了机电井，安装了电器设备等，为教育和教学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时，教学班发展到18个，教师43名，学生1026人。学校积极开展电化教学，并参加了内蒙、包头市的汇报演出。1981年和1983年，学校被评为旗科技活动先进单位。1982年9月，该校校长由杜志中担任。这年，学校增盖办公室两个，增设幼儿班两个，招收幼儿150余名。1983年，在旗教研室组织的五年级毕业统一考试中，该校语文和数学总成绩名列镇内各小学第一名。

1984年4月22日，学校举行了隆重的81周年校庆活动，前来参加校庆活动的新老教师和校友200多人。

1985年，该校在学习和贯彻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面向”和《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基础上，对学校管理作了初步改革，调动了广大师生的积极性，教学、体育、文艺等工作成绩显著，居镇内各小学之首。同年8月29日，经旗人民政府批准，将一校（大东街小学）、三校（解放街小学）合并。合并后的学校仍沿用一校即大东街小学名称。现在，有教学班32个，在校学生1447人，有公办教师30人、集体工教师7人，社办教师5人，临时代课教师11人。

该校共毕业学生6387人，遍布全国各地，现已有些学生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

“萨拉齐大东街小学”从清同治八年（1869年）建书院至现在已有116年的悠久历史，其间，为祖国培养出许许多多的人才，也培养出一大批革命志士。随着历史的前进，她必将为培养建设社会主义四化人才做出更大的贡献。

萨拉齐清真小学发展简史

程景华

萨拉齐清真小学，建校于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四月。最初由县知事王建屏督同回民俱进会的马善元、王子选等（同盟会员），向当地回族群众集资一千元，在城内大南街三道巷路南，购院一所（有正厅房子七间，东西厅房子各五间，东西配房各三间，南房带门共七间）。另有广场一块，创设“私立清真小学堂”。萨拉齐的回民从此才有了自己的学校，经费由桥、屠附加捐作支付，另由清真寺回民的月钱收入内拨出一部分款，简单地购置了部分桌椅等设备，聘请王培元为堂长（即校长），招收回、汉民族学生三十多名，设一、二年级，复式教学一班。课程有：国文、算学等。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改聘富日新任堂长，增设为三个年级两个班，有学生七十多名。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年），改为“萨拉齐县清真高级小学校”。富日新辞职新聘请董介安任校长。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改聘毛则三任校长，并增聘两名教员，增

设高级小学一个班，至此全校共为三个班，学生总数达九十余名。民国十七年委任马凌云任校长。民国十九年（一九三〇年）由郝云峰任校长，有学生九十三名，共分五个班，高级一班，初级四班，教职员五人，当时的待遇是校长每月二十元、教员十三元、事务员五元、每月经费共八十八元、因桥、屠捐款办理不善，有拖欠经费现象。据悉：萨县教育局指令接管，并调整学校经费。

一九三三年，学校改为县立清真小学校，由李瑞霖（雨田）任校长。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李瑞霖调离学校。由刘忠（回族）任校长。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不久，萨县沦陷，学校被日本军营的伙房占用而停办。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复校后，由陶琛（回族）任校长，教职员五人，学校设五个班级，共有学生九十九名，所授课程以日语为主，教育措施和管理手段，完全推行法西斯式奴化教育。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学校由县教育科接收。复校后，改校名为“县立第三小学”仍由陶琛任校长。

一九四九年，“九·一九”绥远省和平起义后，萨县也随着获得解放。少数民族的教育事业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一九五〇年，县人民政府接管了学校，贯彻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本着“既承认历史，又照顾现实”的原则。将第三小学校改为“萨拉齐民族小学”。委董英任校长，遵照党的教育方针和民族政策学校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一九五八年萨县、土城特旗合并后，为加强民族小学的领导工作，人民政府提拔回族教师马国章任校长。旗政府曾多次拨款维修校舍，扩建体育场，增加教学设备，同时又抽调有教学

经验的教师来民族小学工作，积极扶植，回民学校的教学成绩显著，据不完全统计解放后在回民小学担任过领导同志的有刘证、傅科、成志忠、侯文冠、李英等，截至一九八六年底，“萨拉齐民族小学”共有教职员三十三人，其中回族教师四人、蒙族教师一人，全校有教学班十七个，学生总数为六百七十名，其中回族学生九十八人，蒙族学生五名。现任校长白秀山，教导副主任张秀斌、郭向刚。

萨县最早的女校

贾海山

萨拉齐是个文化发展比较早的县城。然人们只知萨县女子小学（校址在礼拜寺巷），很少知道“三妙女校”为萨县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的贡献。特别是三、四十岁的人根本就不晓得“三妙女校”培养出一批批分布在祖国各地为人民忠心耿耿服务的老年女知识分子，这是很遗憾的。为了人们对“三妙女校”有所了解，不要忘掉它，我把了解的情况作一介绍。

“三妙女校”是萨拉齐耶稣堂办的一所女子学校。它是在一九一〇年正式成立的。在此之前，耶稣堂聘请了一位姓周的忻州人教学。那时男女一起学，一九〇九年才男女分开的。男的叫“育英学校”，女的就是“三妙女校”。当时的学生大部是婴孩，但也有非耶稣教的信徒。学校一切经费，学生的学习

用具都由教会负担，不收学费，教徒和非教徒一视同仁。在当时封建社会，妇女在家学做针线营生，念书者实属罕见。这所学校的学制是初小四年，高小三年，儿童七岁入学。学校的教师有的是聘请的，有的是由毕业后优等生中录用的，她们既是该校的学生，也是教师。校长叫达里白（女，瑞典人），那时的教师有经革成（蒙族）的姑姑、曹守坚、曹守德等。这个学校一直办到解放。先后培养出数以千计的学生，为萨拉齐培养出不少人才。

绥远女子师范第一班学生共三十名，其中就有萨的二十名女生。当时的绥远包括有：兴和、集宁、丰镇、陶林、凉城、托县、萨县、包头、固阳、五原、临河等县。萨县的女生就占这么多县份中的三分之二，而这些女生都是“三妙女校”的学生。如：刘文光（刘秉义的姐姐）、刘毓英、刘毓德、任懿美、葛桂芳、王玉连（回）、李生芝、辛志洁（张存道的母亲）、辛玉洁、孙竹青、金素洁、鄂恩普、爱振华、鄂永福、鄂济民、周美德等。而这些女知识分子，现在都在七、八十岁以上，现将她们之中的一些人的概况作一简介。

孙竹青、金素洁北京女师大毕业，孙竹青曾于一九三四年——一九三六年时期在陕西榆林中学任过教，解放后在西安教育局工作，金素洁在陕西教育厅工作，周美德和周文锦结婚后在河南省郑州开夫妇医院；鄂济民山东齐鲁大学医科毕业，是上海有名的小儿科大夫；鄂恩普在上海伯特利中学毕业，后又考入华北神学院，以后到美国留学，在芝加哥大学神学系毕业，后在贵州孤儿院当过院长，解放前五〇年在萨县办起了学艺所培养缝纫等技术，六〇年到六二年在萨中教外语，一九六三年和留法教授张乃光结婚，在西安中学教英语；王玉连在

归绥当过教员是归绥妇联负责人，曾任过国民党国大候补代表；还有任懿美在包头开设过“厚生保健所”。任懿美在一九二九年又升入由晋省平定医院办的护士学校。毕业后于一九三二年至一九四五年在萨拉齐教会办的诊疗所做医疗工作，为萨拉齐病患者医病助产，给教内、教外患者治愈许多奇特的病；孙竹青、金紫洁、绥振华、多淑英、刘文光都是出色的教育家。

“三妙女校”初办起时，学校因材施教，学完小学课程成绩好者可继续升学；成绩差者可到织地毯和绣花厂学艺，这样既发挥了各自专长又培养了各种人才。

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二年抗日战争时期，萨县沦陷了，在日寇铁蹄下教育事业被摧残。“三妙女校”在教会的庇护和瑞典传教士安得顺的关注下继续开办着，使最后的一批孤儿正在成长的女青年和四个男青年不致辍学成立了初中班。由鄂行九担任语文课，从呼市郊区聘请到一位在北京某大学肄业的李作枢教数理化，还有本校培养出来的湖南长沙圣经学院毕业的鄂载帝教生物等副课，由安牧师担任英语课，当时的语文课以学古文为主。为了应付日伪教育部门的检查还聘请了育英小学校长刘秉义教初浅的日语；经过三年多的时间培养出二十多个初中毕业生。后又深造医学专科、高中、大学的有：贺媛玲、杨清清、贺维荣、白懿钦、张真光、郝光耀、林雅清、吴就光、关利民等。由北京医学院毕业的有吴就光，现任北京东城儿科医院院长；由山东医学院毕业的关利民现任包头二冶职工医院主治医师。

一九四五年传教士安牧师二次由瑞典来萨拉齐耶稣堂，培养了最后收容下的二十多个女婴孩美大、美恩等。先在“三妙

女校”上幼儿园、初小，解放后又升入高小初中，有安玉爱、马志珍、田维荣、刘淑华等，她们后来升入我们国家办的高中、卫校、医学院，毕业后在呼、包、临河等地医务界工作，其中刘淑华由内医毕业留在内蒙附院担任皮肤科大夫。八一年曾在萨拉齐传过道的奚师娘等四人来中国访问时，曾来萨拉齐包头访问了美恩、美大。

达里白校长离任后，又有鄂毕格牧师任校长，他于民国四年患霍乱病逝世了。后来又来了个美国牧师施比善，他曾说“萨拉齐教会办的教育在西方就听到了”。是的，萨县耶稣堂办的“三妙女校”在发展萨县文教事业上曾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萨县最早的中药店、 中医院、西医院

王 宥

萨县最早的中药店叫仁德堂，建立于清光绪末年（约1900年间），是由萨县姓宋的一家为经理独自经营创办的。地址设在萨镇东街路北（其子宋祥，现已八十多岁）。后来因故将该药店分设为仁寿堂（四和园北面）和中和堂（东街路南），该药店地址被后来开设的义长久绸缎庄所占用（该药店的规模

及经营范围，坐堂先生等均已追忆不起）。

继仁德堂建立不久，先后又于清末民初建立了两个中药店，一个叫元泰和，地址在薛镇南官井北（即现在的医药公司门市部），是河南省范旺天（经理）创办的，坐堂先生是个瘸子。人们称作坐洋车的张先生。另一个叫永和正，是由山西省代县人刘洪基（经理）创办的，坐堂先生叫杜先生。该药店带徒不少。后来沟门区的吴德顺、觉三尧乡卫生院的连佩老先生均由此药店出师看病的，该药店地址是现在的水果总店门市部。

中 医 院

萨拉齐县从解放前到一九五二年，没有中医院，只有一些小型的药店及诊所，具有一定技术水平的中医分散在各个中药店“坐堂”看病。从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四年，党和政府通过各种形式对广大医务工作者进行了宣传动员，使他们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并且在对整个社会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也向当时个体开业的中西医提出了建立联合诊所的号召；在县主管部门的具体组织下，广大中西医和其它有一技之长的医务人员，纷纷走上合作的道路。到一九五四年底，全县的个体医务工作者基本上参加了联合诊所。

萨县最早的中医院在联合诊所的基础上成立于一九五五年。由萨镇内四个联合诊所（即民康诊所、中医诊所、中西医诊所、和平诊所）合并为“萨拉齐镇中医院”，地址设在原民康诊所（即现在的萨镇卫生院）。为进一步贯彻中医政策而得名。名曰中医院，实际也有西医。该院共有医务人员廿七人，

院长是乔文，副院长有王与劳、张建基、张道忠等人。该院就是现在的萨拉齐镇卫生院的前身。当时实行的是“地段责任制”，即分派医务人员每天深入街道，进行巡回医疗、预防接种，督促检查卫生等工作，方便了群众的就医和防疫，受到了群众的赞扬。

西 医 院

解放前，萨拉齐镇没有正式规模的西医院。最早的西医院叫萨县平民医院，系公立医院。始于一九三二年（即民国廿一年），地址设在西当铺（即大西街路南原耕申院内一间西房里），全院共计两人，第一个创办医院的负责人叫李秉方（系大岱村人，据说是北京医科大学毕业）。此人除用西医西药诊治常见病、多发病外，兼任院长职务。另一名叫刘全（亦系大岱村人），专搞司药、打针拉脓疱、换药、财务帐目等内部事宜。如《萨拉齐县志》记载：“民国二十一年夏秋之间霍乱症盛行。西医名曰虎力拉，传染亦烈，患者腹内疼痛，吐泻不止，顷刻之间即可毙命。若趁早扎针，尚可治愈。当时中西医既惯扎针者，昼夜不暇为人针治。县立平民医院敦请多人分派城乡，一面施术治疗，一面注射预防，历时不久，即告平息。”此段历史记载就是记述了当时县立医院扑灭烈性传染病的实际组织情况。不久，由第二任院长刘铎（善济乡宝同河村人北京医科大学毕业）接管，刘全同样负责上述事宜。名曰医院，实际没有病床，只有两人应付门诊。这个医院到一九三五年底，因资金缺少、警察、特务敲诈勒索，看病不给钱，刘铎去归绥平民医院就职后而倒闭。

萨县历史上的几次大瘟疫

王 富

萨县，历史上曾流行过三次大瘟疫，死亡惨重，其状目不忍睹，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里分别记述如下：

一九一七年（即民国六年），萨县第一次大瘟疫是鼠疫。鼠疫（俗称传头子病）为一烈性传染病（甲类），其发病之迅速，传播面积之广，病死率之高，对人民生命危害性之大，远远超过其他传染病。这次流行鼠疫的疫源来自河套地区的安北县，这年九月中旬鼠疫由河套安北县的爬子补隆开始，十月就传到了邻近各村，十一月传到临河，十二月传到五原，晏江、西山嘴。与此同时，九月下旬传到了包头，十月上旬传到了萨县，沿铁路线传到了归绥、卓资、集宁又波及托县、和林、凉城等十余县，经过两个月的时间，鼠疫这一直接危害人民生命安全的病魔由西向东，传遍了绥远省的大部县区，据不完全统计，波及疫村就有一百五十九个，死亡人口为二万三千四百七十五人。

在萨县，这次鼠疫大流行，始于十月上旬，最初发生于萨县西部的小巴拉盖村（接近包头），约经五个月时间疫病波及到南至黄河畔，北至大青山的全县各地，直到翌年二月才停息。共计传播全县七个区，六十四个疫村，死亡人口约一万五千人。

后经流行病学调查分析，判明确系肺型鼠疫。

具体的传染源是这样的：一九一七年，一个从包头去蒙古做买卖的人，自爬子补隆经南营子到包头吕祖庙病死后，传染至鼓房当地又死了数人，于是病源扩大到全包头；而萨县在九月下旬，由一姓李的从后套经包头先传入小巴拉盖；十月初一车信仍由后套安北先后传入吴坝和萨拉齐镇，先在“讨吃店”流行，遂即传播各地。

当时的惨景是用笔墨难以形容的，在此列举几个实例：西老丈营村的郝耀罗在鼠疫流行期间，自知得该病活不了，就躺在祖父墓等死，因天气寒冷，又回家而死。在染病前他曾想外逃，但又自信为人正直不得此症，到死亡时曾说悔之晚矣。美岱召有个丈夫营子，全村共死亡一百人，致使该村无人居住，人烟绝迹。沙圪沟村里有一院住着两户人家，一户死亡十人，用火烧掉了；另一户户体五具，无人处理，直至第二年春天才被外逃返回的子女收殓了。有的人不敢接近染疫者，染疫者死了，家里其他人也不敢接近，而雇讨吃子（乞丐）掩埋。当时雇一个讨吃子装殓带拾埋竟花二十五元现大洋。结果，不久讨吃子也死了。由此可见，鼠疫对人民生命安全的危害性是何等之大！

一九二八年，（即民国十七年），萨县第二次鼠疫，这次流行属于局限性的，于九月上旬开始至十一月停息，先后发生九个疫村，共死亡一百余人。

这次鼠疫流行，萨县“县志”里有这样一段记载：“民国十七年三月一日夜，狂风怒嚎，飞砂走石，翌早，西城门洞，鼠尸堆积，门为之塞。沿城墙根掘洞一如之。人皆诧异。后经西医检验，因时隔多日，鼠尸腐败，亦未明究竟，据乡老经验主

要有荒灾，果然是年大旱，岁饥饉，谨案：“当时有人检查鼠尸，见得左胸部有一小孔稍现血迹，足征是疫”。从这段记载的字里行间充分看到鼠蚤是特别多的。

此次首先发生鼠疫的疫村是萨县的东园和毛岱的新营子，两地疫村的第一例病人都是在家发病，未出远门，也未接触过亲友，可是传播了附近的村庄和人群，其症状都是肺鼠疫和鼠疫败血症，其死亡一百余人。

东园村第一个鼠疫死者系张莲女，年十五岁，未婚（系张才孙女），原在家发病。八月十四日随母去鄂尔格逊（其姐家），经三天死亡。五、六天后其姐（嫁该村营家）死亡。九月下旬其父死亡。接着有张才、张富两家及有关人家死亡五十二人，症状均系头痛、发冷、发热、吐血、胸痛、于一至三天内死亡。

一九二八年农历四月初一，毛岱新营子发病的第一例病人叫柳四顷者，他在家突然发病，因头痛，于三天后吐血死亡。后因感染全家死亡二十三人；而后又传播全村共死亡三十二人，埋葬了十九人，十三人抛于野外被狗吃了。从此疫病向外传开：柳七十二传至萨县城内，经医生郭三毛传至三道河，由营存福传至马厂，经偷物者传至六合庄。

总之，两次鼠疫流行，时隔十一年，波及疫村七十三个，共死亡人口两万三千五百七十五人。

萨县，一九三二年第三次大流行的疫病是霍乱。霍乱，西医名曰腹力拉，亦为烈性传染病之一。仅次于鼠疫，属肠道传染病之范畴。病死率相当高，特别是儿童死亡率更高，其危害程度之严重，几乎达到毁灭性质，如《萨拉齐县志》记载：萨县一九三二年（即民国二十一年）霍乱流行之情况，二十一年夏

秋之间霍乱症盛行，西医名曰虎力拉，传染亦烈，患者腹内疼痛，吐泻不止，顷刻之间即可毙命。若趁早扎针，尚能治愈。当时中西医生既惯扎针者，昼夜不暇为人针治。县立平民医院敦请多人分派城乡，一面施术治疗，一面注射预防。历时不久，即告平息。流行后期有患者吃西瓜治愈者也不少。据统计死亡人数约数千余人（笔者考证死亡人数系萨县镇内的数字）。另据调查，在萨县耳沁尧村也流行过霍乱，死亡二十三人，占全村人口的30.9%。陶恩浩等村死亡七百七十五人，大城西、小巴拉盖、五盛公等村也死亡了数百人。

土默特“户口地”的由来

云 广

土默特“户口地”，在内蒙古地区来说，是一个较为独特的历史产物。它的发生和发展，有一定的历史背景。

清王朝征服蒙古地方后，按照他们“怀柔羁縻共不判”，划定界限，分而治之。所谓“内属”者，就是曾经抗击过清王朝进军的部落被征服以后，由清廷直接加以统治，奴役和驱使，土默特部就属于这一类。

光绪三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清廷内阁协理大学士，尚书鹿传霖和度支部左侍郎绍英在一个奏摺中曾追忆说：“土默特部在圣祖仁皇帝征服后，留一公游而不予札萨克事，别以都统治

之”。旧“土默特旗志”也有记载：“土默特众自被中朝收录救援，始有今日，故尺地一民不私为我有”。

基于上述原因，土默特除了负担“台站”（1），“卡伦”（2）的钱粮，兵需等供应外，更主要献出大批兵丁为他们卖命，正如鹿传霖所讲：“实则可以济其饷，强则可以济其师”。兵丁多少，说法不一。光绪年间的规定是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实际上光绪年间的户口，地亩册上，凡六十以下，十八以上的男子，都作为“披甲”。在一份资料中记载说：“土默特左右二旗”要有五千个兵丁，三百六十个“牛录”（3）和二百个“前锋校”（4）。

据另一资料统计：从顺治三年到咸丰十年，土默特官兵迭次被驱参战多在一千以上到二千名左右，迭次死亡官兵达一千二百八十多名。

康、雍两朝以后，清王朝为了缓和内地因封建剥削所造成的汉族人民的抗暴情绪；一反过去“禁退”祖训，在内蒙古地区大量开垦牧场。据资料看，乾隆八年发给户口地之前，土默特被鲸吞的土地有大粮地，五斤奏放粮地，山后八旗牧场地，八旗马场地，庄头地，十家庄头地，鳏寡孤独地，右卫厢兰旗牧场，穷苦蒙古租银地，公主府地等九百七十多万亩；加上香火地等足够千万亩以上。按土默特当时的范围是长四百零三里、宽三百七十里，折合亩数大约为五千六百多万亩，除山、河、林、湖及城镇、村庄占地外，所剩土地还有几何？难怪清末盛务大臣痛各说：“在札萨克四十九旗中，若土默特之首创大义以助天朝无或眈域者，盖可风焉。”一向称为“群牧牛羊量论谷，洛静庐帐列如崖”的土默川，一变而为“无畜难以孳收”的困境了！还“风”什么！

本来，土默特官兵因为是“率土归降”。所以，清廷的“恩德”一向是“官无俸，兵无餉，有错罚言”的。现在“农牧争讼不息，差兵难备鞍马”，在这种情况下，清王朝为了“控驭藩服”，才不得不在“乾隆八年，奉旨赏给土默特二旗人口户口地亩”（见鹿传霖奏摺，这个年代据一些资料的记载是：顺治七年，曾发过牧地，档案文献亦有这种记载；卷查乾隆二年案卷，实有五拉特祖父水分，后将“户口地”十顷租给民人浇灌等语）。

由于上述情况，“赏给户口地”口头上好像是仁政，实质是为“移民实边”，“借地养民”创造条件。是人为地搞急趋直转的农牧演变。对不习惯农业的蒙古族牧民，这是一场特赐的灾难性的开始。尽管清廷也不断倡导“招民耕种，收租自养”。实际是清廷釜底抽薪后对蒙古牧民的一种虚伪的抚恤。

土默特二旗的“蒙古族户口地”数目，据《蒙垦续供》的记载看“每兵五顷”，据现有资料和《内蒙古发展概述》167页上说：土默特每兵一名，给地五顷。“兵亦不自耕，仍招垦收租”。但亦有自耕自给者。

据嘉庆六年正月十九日的文案载：一名伍兰么者，分给三个儿子“户口地”共四百一十九亩，又据民国十九年色令板蒙古荣根福与蒙古何何因“户口地”打官司，官府查道光年间“户口地”之地册后，作了如下记载：道尔吉扎布、三撒贡二人，系何何之先祖。共领“户口地”一十九顷有余，据此可以看出，“户口地”多寡确实不同，为何如此，尚需进一步调查研究。这里首先值的分析的是：发放“户口地”不到五年，即到乾隆十一年就有出租土地者，从数字来看，出租比例逐年上升，出租土地者，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蒙族。租（买）者只有

一二户蒙族。现把有关资料记载的864块地契约，分别择录如下：

乾隆朝共37张，平均每年0.6张，其中蒙族出租者36户。

嘉庆朝共44张，平均每年1.7张，其中蒙族出租者42户。

道光朝共73张，平均每年2张多，其中蒙族出租者70户。

咸丰朝共24张，平均每年2.1张，出租者全是蒙族。

同治朝共49张，平均每年3.8张，其中蒙族出租者47户。

光绪朝共194张，平均每年5.7张多，其中蒙族出租者173户。

宣统朝共18张，平均每年6张，出租者全是蒙族。

民国（包括1937年前与1945年以后两个阶段）年代共235张，平均每年7.8张，其中蒙族出租者173户。

日伪统治时期共74张，平均每年10张弱，其中蒙族出租者61户。尽管不是契约的全部，但也可以窥见土地更变关系之一斑。

归化土默特蒙古“户口地”，原蒙皇恩赏给该蒙古等，以作永久当差养贍之资，不准民人私买蒙古地，例有明文。所以“户口地”出租均作活约。但在嘉庆年间也有永租契约。清王朝的禁令已经成了一纸空文。

随着清王朝封建统治的日益衰败，和财政日绌，随之而来的是赋敛的加强和无孔不入的搜刮。在这种情况下，归化土默特随着移民日炽，生齿日繁，“禁垦养牧”的政策早已弃置不顾。上默特蒙赏的“户口地”也逐渐丧失殆尽了。一些蒙古人逐渐学会些农业技术，想赎地自耕，但由于土默特上层统治人物昏愆，往往得不到官府支持，因而，原来是吃肉的民族，后来变成吃粮的民族，最后变成了吃官司了。这是一个何等迅速

变化的悲剧！何等快速演变的过程啊！

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后，清王朝为了赔款、赔教，曾经制订了许多筹款办法，主要一条是“整顿地丁。”

光绪三十年总税务司赫德曾条一摺说：“中国每年关税、盐课、地丁等项统计不过八十兆两。而还款赔教去其大半，是非另筹款不可。近日论筹款者亦不少划策之人，鄙意则总以整顿地丁一事较为有把握也”。奴才上摺，主子采纳，所以不到一年时间，清廷便派一品尚书銜钦差大臣贻谷，坐镇绥远，统协宣、大军政，专办垦务事宜。其时，土默特荒地本已无几，贻谷却任用一些“苛暴险泼，仇蒙诬判”之徒，别出心裁地提出了“整理土默特土地方案”，先后制定了二十一条、二十二条等具体规程，开始搜刮。这些规程的主要目的，就是取消蒙族原有土地所有权，对出典地的回赎权予以某种程度的限制。以确定民人的管业权，保障开垦的进展。

贻谷的这些规程，虽因土默特蒙汉群众积极反对而受阻，贻谷本人也因“二误四罪”而被革，但这许多条条款款却都留给了他的继承者。民国以后，历任军阀委派的都统，督办等，都打出了“沿照前清旧制”的杀手锏，继续不断整理验契。其花样之多，加捐之繁，手段之劣，更是较前有过之而无不及。民国五年，奉系都统蔡承勋，更规定了验契发照九条规程，其中规定如：“逾期未税之契，诉讼时无凭证效力”。蒙古群众还没有弄清那一套刻令夕改，花样繁多的大照、小照、龙头照，白片心、兰片儿，黑片儿等等名堂，就糊里糊涂地丢失了大量土地，连过去永租地的几文地盘儿钱（5）也因为验契，领照而被夺去了。

有关归化土默特“户口地”的由来，暂追述到此。由于水

平低，分析运用资料能力差，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恳切希望批评指正。

注释：

(1) 清初称为给，后将短途改用递役，长途改设台站，专使传递公文、物资之役。清编《土默特旗志》记载，台站有三，一是乌里雅苏台，二是库伦，三是科布多。这三处现今均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

(2) 专为盘查盗匪而设，设置年代尚无确据。清编《土默特旗志》所载卡伦十一处与“绥远城”所载有异。依后者为格滚、哈拉沁、鄂奇特、乌里雅苏台、和林格尔、阿塔库、特门库殊、嘎鲁第、苏勒哲、乌达、查汉鄂博。每处设官一员兵五名，其经费均在土默特息银项下支出。

(3) 牛录为满语的音译，约相当于蒙古各旗的佐领，蒙语叫章盖，即今乡一级领导。

(4) 前锋校，为披甲之上的低级军官。

(5) 地盘儿钱，契约中记作“地谱钱”或“地盘钱”。凡蒙族出典户口地，不论永租、租赁，都收少量地盘钱。缘何有此，未见正式记载。

土默特右旗道路与机动车的 发展及黄河水运之兴衰

刘文信

土默特右旗北依大青山，南临黄河，自然条件优越，自古就是交通要道。

从战国、秦汉起至清末，两千多年来，历代王朝修城建郡，移民戍边，以及北方各民族的战争中行军运粮、外事往来，集市贸易，文化交流等众多的历史事件都在这里留下了重要史实。

现在土右旗人口巨增，经济繁荣，又地处呼、包二市之间，从各方面来讲，堪称内蒙西部的重要地区之一。因此交通发达。所写交通史，涉及范围广，又因资料不全，仅就道路，机动车及黄河水运作简述。由于笔者水平有限，错误难免，请知情者予以指正。

大道及公路

土右旗在铁路与公路未通时，行人旅商都有通行大道。清代及民国时期，以萨拉齐为枢纽，有几条通往旗外的大道：

1. 萨武（武川）大道。自萨拉齐北行，经水洞沟门、红沙坝、前老窝铺、二道坝、东二坝、永合太、只道沟、巴总尧子、白菜沟、官地后脑包，再向北入武川县境，共长120华里。

2. 萨东（东胜）大道。自萨拉齐南行，经李旺营子，渡过黄河，偏西南行至平房营子，经官牛营、马堡境、柳塔、羊白岱、鼓塔、马厂尧子入东胜县境，共长200华里。由东胜县南行，走向府谷、榆林及陕西各地。

3. 萨固（固阳）大道。自萨拉齐西北行，经公积板、种地尧子、石河子、石拐子、三叉口、白眼根、万生号、下渠子入固阳县境，共长160华里。此路山梁嵯峨，沟涧交错，仅通行人、马、驼（见《萨拉齐县志》卷六）。

4. 萨托（托县）大道。由萨拉齐东南行，经杜守将营子、毛岱、双龙镇，朔州营东南行即达托县县城，共长140华里，道路平坦。由托县南行，可达河曲，也可经和林，进杀虎口至忻州、太原等地，是晋人来绥远的大道之一。

5. 绥萨、包大道。由西绥（呼市）西行，经台阁牧、毕克齐、察素齐入萨拉齐县境。再经多尔济、忽拉格气、下达赖、陶思浩、美岱桥、西老藏营而达萨拉齐县城，全长230华里，道路平坦。由萨拉齐西北行，经鹁鸪气、板申气、公积板、沙尔沁、磴口而达包头县城（现包头东河区），共90华里。道路平坦。

由萨拉齐至归绥东行，又至陶林（察右中旗）、丰镇、山西、河北及京津各地。

由萨拉齐至包头西行，经后套地区可至宁夏、甘肃、青海、新疆各地。（1）

我旗境内的汽车公路，始于民国八、九年间（1919~1920年）。由当时的军队将绥、萨、包大道进行了简易整修，供汽车通行。通行的汽车，主要是归绥巨商大盛魁经营的商车。汽车由绥经萨至包头，并在萨拉齐北门外龙王庙，设有售票营业所。1923年，京包铁路通车后，汽车营业所停止营业。（2）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阎锡山部王靖国七十四师四二九团修筑自包头至萨拉齐90华里的公路，可通行汽车。（3）

1937年10月，萨拉齐沦陷于日寇，侵华日军板垣师团为镇压抗日军民和掠夺中国经济资源，修筑从北京经归绥至包头的公路，其中绥包段（“兴蒙”公路），自1937年9月12日进行测量，1940年5月1日开工，至1941年3月31日竣工，全段工期306天。当时路基宽12米，路面宽6米，路基高约1米。全线均为拳石路面，沿线桥涵构造均大部分为石台木面桥，有部分混凝土涵管和简易过水路面。萨拉齐县境内的圪力更、美岱沟、纳太村南下湿地及水洞沟都是这种简易过水路面。另在原萨拉齐县境内沙尔沁村东五当沟河槽上修建一座跨径5米的7孔钢筋混凝土漫水桥。此桥直用至1978年，在第二次重修呼包公路时拆毁，在此桥北侧新建了一座较大的现代化桥梁。

“兴蒙”公路自陶思浩东入萨拉齐县境，至磴口附近出境，全长72公里。修筑此段公路，日伪向县内五个区索派民工达千七百余人，共用工日371656个。这些劳工在伪军警和日本监工的严厉管制监督下劳动，备受欺凌打骂。劳工因此怠工，施工进度缓慢。

日本侵略者，为使用机动部队从“兴蒙”干路驶向各地进行扫荡和进一步进行经济掠夺，又修筑了网络式支线——“警

备”道。据《萨拉齐县志》记载，有县城至厚和界的萨厚路、县城至海岱的萨包略、县城至托县五中的萨托路、县城至火车站的萨站路、县城至沟门村的萨沟路、县城至甘四顷地的萨富路、县城至后脑包武川界的萨武路、县城至善岱的萨善路、县城至毛岱的萨毛路、县城原系西营子的萨郊路、苏卜盖至毛岱的苏毛路、县城至土台气的萨包路、鄂尔格逊至甘四顷地的鄂富路、甘四顷地至双龙的鄂厚路、炭厂子至东十大股准旗界的炭高路、陶思浩至善岱的萨善路、善岱至双龙的善双路、苏卜盖至陶思浩的苏隆路、陶思浩至毛岱的隆毛路等19条“警备”道，全长1115华里。

抗日战争胜利后至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忙于内战，未进行公路建设。

解放初期，时感拮据，百业待兴，仅对旗内主要公路作了些修建。至1953年始，设置养路道班。在萨县境内仅在威俊设有十余人的养路道班，负责对陶刀亥至火车站公路的养护。

1965前呼包公路路况不佳，不能常年行驶汽车。初春，水涧沟、马留沟、美岱沟的冰水流逝，接连沟外下湿地路面；夏秋之际，山洪不时暴发；隆冬季节，公路低凹处积水成冰，致使汽车通行困难。笔者于1965年，驾解放牌货车，由察素齐去包头市，竟行驶24小时，足见汽车通行之困难。

1968年，国家拨款，将呼包公路路基加高，铺设沥青路面，修建了不少永久性混凝土桥涵。土右旗境内修建了美岱沟外东西大桥及协力气、沙兵营、纳太、威俊等处中小型桥涵。使呼包公路较能正常通车。1978年，国家又拨巨款，按国家二级公路标准进行第二次大修，将呼包公路加高拓宽，在溢洪量最大的水涧沟南建起了15孔，长195米、宽10米的大桥，从而呼包公

路土右旗路段可长年正常通车了。呼包公路上右旗路段在协力气村东呼市80公里处入境，至板申气村西111公里处出境，全长31公里。这条公路对土右旗经济贸易和工业发展都起到了巨大作用。

现土右旗境内，平原公路纵横交错，汽车可通至各乡镇所在地。各乡镇有通至各村大道，可行汽车。平原公路有：起自沟门至托县长57公里的萨托公路、起自萨拉齐至五台营子长69公里的萨五公路、起自美岱召镇河子村至将军尧子长25公里的河将公路、起自萨拉齐至明沙淖长12公里的萨明公路、起自萨拉齐至秦家营子长25公里的萨秦公路、起自萨拉齐至大城西长15公里的萨西公路等六条沙石公路。共有养路道班19个，养路工人162名。

土右旗大青山区，道路险峻。1962年，内蒙劳改局新生煤矿，修通自沟门后湾至磴厂的简易盘山公路，路线蜿蜒盘绕，有的路段位于深谷峭壁之间，仅可供汽车、畜力车通行。1970至1972年间，大搞备战，乌兰察布盟成立修路指挥部，将此路局部拓宽，将上下山的两段路改道加宽，放小坡度，改缓弯度。1974年，新生煤矿在此路最高处——三道坝开凿一条隧道，使这条路况有了明显改善。

1970年至1972年间，为适应战备需要，在大青山内修了不少可通汽车的道路，计有：

- 1.由红沙坝起，经中卜圪素村至小坤兑，再北越韩庆坝，可至耳沁尧乡政府。
- 2.由红沙坝西行，沿水涧沟西坡经前老窝铺村西行，进二道沟越坝至康卜，再北行经白狐子沟可至石拐区。
- 3.由小坤兑沿沟东行，越东二坝，经香桂铺村至前脑包，

再北行，经公山湾、巴总尧子、鸡登湾可到固阳县下湿壕。

4.由公山湾乡六道坝东行，越山至野马图，由前脑包村东行，经大塔也可至野马图。由野马图东南行，经一前脑，可至土左旗陶思浩。由一前脑北行可到武川县的哈拉合少。

5.由耳沁尧村西行，经德胜沟门村北行至石人塔，再两行越厂汉大坝，经白菜沟，可至石拐区。

山区除后湾至老窝铺公路外，尚有阿刀亥沟路和马留沟路，分述于下：

1.阿刀亥沟路。1960年，国家拨款60万元，修筑了从萨拉齐镇火车站至阿刀亥煤矿14公里的道路。由呼包公路西段威俊村西北行进山7公里至阿刀亥煤矿。此路由于顺沟而上，雨季易被沟水冲垮。一旦出现道路被沟水冲毁，阿矿便组织干部、工人和家属及时抢修，以保证外运生产及生活用品的运输供应。由矿部北行越洋大坝，可进入马留沟的麻地塔村。顺沟北行可至石拐区。此路的修通，大大缩短了自萨拉齐、阿刀亥煤矿至石拐矿务局的路程，但洋大坝坡陡弯急，只能通行吉普车与半载的中型卡车。

2.马留沟路。由呼包公路马留村西进山，顺沟北行5.2公里至宽甸子村，再西北行经同胜茂、麻地塔、康卜、白狐子沟可至石拐区；由同胜茂西行经悦来尧煤矿可至杨圪楞煤矿。此沟内有各类煤矿二十余座，运煤车辆常年络绎不绝，在旺季，各种运煤车辆达千车次。但在雨季，道路亦时被冲毁，由各矿联合组织抢修，保证通车。

近十年来，土右旗的公路不断修筑延长，路况亦逐年改善，对土右旗工农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繁荣起了重要作用。

注:

- (1) 《萨拉齐县志》卷六及《包头公路交通史料汇编》第二辑《绥远概况》
- (2) 《萨拉齐县志》卷六及《包头公路交通史料汇编》第二辑《公路》
- (3) 《包头公路交通史料汇编第一辑》《包头的一般经济情况》
- (4) 《萨拉齐县志》及《包头公路交通史料汇编》第三辑《试谈兴蒙公路的修筑》
- (5) 《萨拉齐县志》卷六“托斯和”实为陶思浩。

汽 车 的 发 展

自1885年德国人本兹与载勒姆发明汽车,至今已逾百年,世界各国汽车拥有量猛增,现在全世界年产汽车达二千万辆以上。

我国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英国人从上海港给慈禧太后进口了二辆汽车,这是中国第一次拥有的汽车。1956年7月15日,我吉林省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产出了第一辆解放牌4吨卡车,开始了中国生产汽车的历史。1985年,我国汽车年产量达75万辆。

在土右旗境内行驶的第一辆汽车,是民国八九年(1919~1920年)间,归绥巨商大盛魁的商车。

“七·七”事变前,冯玉祥、阎锡山驻绥部队的汽车在萨拉齐县境内驶行。日本侵华后,修建了通向各乡、村的“警备道”,日寇军用汽车经常气势嚣张地在各道路上行驶,但也经常地遭到我抗日军民的伏击。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日酋企图用汽车将绥包驻军撤至京津,不时遭到抗日军民截击,缴获汽

车的轮胎，被农民改造为大胶车下脚使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进行内战时期，常有军用汽车驰骋于“兴蒙”公路。

解放初，萨拉齐县没有汽车。1958年，包头汽车运输公司在萨拉齐镇东门里至玉隍庙内（现水泵厂南院）驻有一个车队。另有呼和浩特及乌盟运输部门的汽车不时驻萨，从事阿刀亥和马留沟各煤矿的运输。

土默特旗最早（1958年）购进的汽车有：阿刀亥煤矿解放牌4吨卡车一辆；旗委美制“维力斯”吉普车1台；大黑河拖拉机站苏制“吉斯150”4吨卡车1辆。

自六十年代初至1965年，土默特旗部分单位陆续进了一些客货汽车。至1965春止，全旗（包括驻旗单位）汽车拥有量如下表：

土 默 特 旗 汽 车 登 记 表

1965年春

单位名称	汽车型号	数量(台)	司机姓名
土旗旗委、人委	美制维利斯吉普	1	王新华
土旗旗委、人委	苏制嘎斯69吉普	1	尹初吉
土旗水利局	苏制吉斯150卡车	1	贾占元
土旗水利局	解放牌卡车	1	张庆
土旗水利局	跃进牌卡车	1	关松山
土旗拖拉机站	解放牌卡车	1	刘文信
土旗东沟煤矿	解放牌卡车	1	李开河
土旗察素齐化肥厂	解放牌卡车	1	刘凤
土旗察素齐化肥厂	解放牌卡车	1	柴林
北什轴公社	解放牌卡车	1	姚玉
善岱公社	解放牌卡车	1	丁守业
西沟门新生石灰厂	解放牌卡车	1	大王、二王
	阿刀亥煤矿	1	郭全志
萨拉齐地区	阿刀亥煤矿	1	张二高生
	137处	1	董文富
	137处	1	李国强
	新生煤矿	1	包文和
合计		17	

1967年，乌盟在萨拉齐建立农田水利指挥部，调进了一台罗马尼亚产“M461”型吉普车；同年在萨拉齐建立抗旱队，调进解放牌卡车一台。

1969年，土默特旗分为左右两旗时，分给土右旗解放牌车两台，分别由水利局和农机厂使用。原农田水利指挥部的罗马尼亚产吉普车移交土右旗革委会使用。上述三台汽车是土右旗建制时最早拥有的汽车。

当时水利局司机张庆，革委会司机吴永楨，农机厂司机刘文信。由这三个单位陆续培养出土右旗建制后最早的一批汽车司机，他们是：杨志仁、胡贵忠、张建山、于祥富、陈富、张怀亮、刘成海、贾永林、贾常华、瞿富等人。

土右旗建制后，至1984年旗政府、水利局、物资局、矿业组、黄河二处、新生煤矿、106地质队、阿刀亥煤矿、137处、内蒙干校等单位先后购进不少汽车。特别是1984年以来，经济改革，促进了交通运输业的迅猛发展。国营、集体、个体多层次养车，机动车数量增至历史最高水平。据1985年底统计，全旗拥有大货车440台（其中个体所有147台），大客车8台（其中个体所有3台），小客车57台，特种车20台；轮式拖拉机417台；小四轮拖拉机1034台；手扶拖拉机32台。随着机动车的增加，司机人数也逐年增多，至1985年底有汽车司机1157人。其中开车25年以上的有张三黑、郭全志（已故）武学忠（病故）、张庆、吴永楨、董文义、卢银贵、刘文信等人。

各运输专业户自发组织了联合汽车运输公司，开始出现了新型的联合经济实体。汽车运输为四化建设起了积极作用。旗公路运输管理站提供历年货运量如下表：

1983年~1986年6月左右康货运、周转量统计表

年 度	机 动 车		非 机 动 车		总 计	
	计 量 单 位	社 会 车 辆	专 业 车 辆	社 会 车 辆		专 业 车 辆
二 九 八 三	吨	447,282	62,816	184,307	168,385	313,290
二 九 八 四	吨公里	35,710,557	2,050,111	489,473	595,329	13,845,170
二 九 八 五	吨	547,970	89,120	512,660	115,995	1,265,754
二 九 八 六	吨公里	16,128,714	4,291,388	2,617,910	356,019	23,394,026
二 九 八 七	吨	570,077	65,429	33,376	52,753	721,635
二 九 八 八	吨公里	19,442,137	3,874,691	116,990	167,597	23,601,415
二 九 八 九	吨	498,691	51,590	13,836	25,369	589,486
二 九 九 〇	吨公里	16,434,259	3,087,240	51,566	90,733	19,663,795

汽车运输在商品流通和工农业生产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给人民生活带来极大方便。但环境污染和车祸也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一定的损失和灾难。我旗历年汽车事故如下表：

土右旗历年交通事故统计表

年度	事故起数	死亡人数	受伤人数	损失金额 (元)	备注
1977	60	6	34	26,200	
1978	68	4	43	26,000	
1979	50	9	46	53,800	
1980	61	12	38	31,000	
1981	31	7	21	30,800	
1982	33	8	24	48,300	
1983	46	11	47	103,013	
1984	66	11	45	163,200	
1985	70	12	34	43490	

随着汽车数量剧增，交通事故亦相应地增加，而成为公认的一大公害。我国对交通管理采取了设立专管机构、培训管理人员、健全管理制度、颁布交通法规、加强对驾驶员的管理培训等行之有效的各种措施。

土右旗根据上级有关规定，设立了交通管理机构：

1. 交通监理所。1970年前，由交通局负责在萨拉齐地区设立交通管理小组，有工作人员三名。管理交通运输及收征养路费等业务。监理业务由呼市监理所承办。1969年呼市交由乌盟汽车监理所承办。1972年土右旗划归包头市，土右旗监理组

归属包头市，工作人员两名，1982年增至四人。1985年，组建“包头市交通监理处土右旗监理所”，负责人王风歧，工作人员增至14人。监理所职权为：（一）对土右旗境内公路交通管理；（二）对通行公路的各种机动车收征养路费；（三）对机动车驾驶员进行考核、年审与安全教育及培训，对通行公路的机动车进行例行检查与年度检验等工作。1986年4月将（一）、（三）项工作移交交通中队。

2.交通中队。1977年前，在土右旗公安局领导下，有一民警负责交通管理工作。1977年，经有关部门批准，土右旗建立交通中队，属包头市交通大队与土右旗公安局双重领导。有工作人员4名，现增至8名，吴永祯任中队长。交通中队的职权为：管理交通秩序；交通事故处理；对违章、肇事人员的教育与处罚；对驾驶员进行考核与安全教育；对一切车辆及行人的例行检查。

3.公路运输管理站。1971年前，与监理站、公路段合并办公，1972年，分出另设机构，属土右旗交通局领导，1982年，业务、人事划归包头市交通局管理。现有工作人员30名，奇挨虎任站长、王开惠任党支部书记。管理站的职权为：管理土右旗公路客、货运输，组货源、车辆、增加运输能力；征收运输管理费；核定运输价格等。

4.车辆管理办公室，成立于1975年。其职权为：核实各单位机动车的合理编制，控制购买与使用；核定油料供应；协调车辆的合理使用，以节约能源。杨志仁任办公室主任，隶属土右旗经委领导。

注：见《萨拉齐县志》卷六，《包头公路交通史料》第二辑《公路》。

黄 河 水 运

黄河是中国第二大河。发源于青海巴彦喀拉山北麓，经四川、甘肃、宁夏、内蒙、陕西、山西，在山东莱州湾流入渤海。干流长5500公里。

土右旗地处黄河上游的最下段（托县河口为黄河上中游的分界处）黄河冲积平原——土默川上，是黄河流域精华地区之一。

黄河自西从关地入土右旗境，到八里湾出境，段长82.4公里。这段黄河水高宽阔，水流平稳，适于行舟，年无冻期七个月左右。

黄河水运，最早可追溯到距今2600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时有“秦粟输晋，泛舟之役”的史实。公元前647年，晋国发生饥荒，秦国通过渭水、汾水将粮食运到晋国援荒。汉、晋、隋唐时期，黄河已成为调运粮食的重要航线。汉武帝时，黄河槽运粮食，年达600万担。明万历年间，黄河盐运繁盛，据万历三十一年（1604年）统计，经黄河运销的河东盐达二亿八千八百万斤。（1）

黄河的前后套，远在秦汉时期，就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由于匈奴族世居沙漠，生活艰苦而窥视中原繁华，伺机入侵。故有赵将李牧、秦将蒙恬、汉将卫青、霍去病等先后在河套一带渡过黄河与匈奴大战于阴山南北的战役。十一世纪，辽攻西夏，曾在包头一带“相地造战舰，因成楼船，上置兵、下立马。”元代，利用水上交通，邮传联络，曾在中兴（今宁夏境内）至东胜（今托县）长达1200华里的水路上设有水驿（2）。清圣祖康熙于1713年亲征新疆噶尔丹，曾从“宁夏横地坐

船计二十一日，至胡滩河朔”（今托县）。（3）上述史实足以证明黄河在历代征战中地位的重要。

在土右旗这段黄河的水运繁荣时期，是自清康熙年间开始，至1923年京包铁路通车前的二百年间。

黄河水运，在开发西北，促进商品贸易方面亦具有重要地位。清王朝推行移民政策，屯垦西北。山西灾民大批迁来河套、宁夏一带，为黄河水运提供了大批劳动力。乾隆五十一年（1787年），内蒙西部的吉兰泰盐池开禁，每年用船500只，装盐1400万斤，由宁夏平罗起程，运至山西临县碛口。此后，青海、宁夏及内蒙西部等地所产的皮毛、中药材、盐碱、粮食、瓜果等土产品，由甘肃的兰州、五方寺，宁夏的中卫、宁安堡、横城堡、石咀山等主要码头用多种木船（高帮船、七站船、五站船）、筏子、皮筏子、木排等多种水运工具，运到河口、包头等地。除皮筏卖掉外，其它木船又将布匹、砖茶、煤油等日用杂货装运而回（4）。

鸦片战争后，殖民主义列强，纷纷遣来一批批外商，廉价攫取我国西北的皮毛，药材等土产资源，从黄河水运至包，再由包头陆运至天津口岸出国。因此，可称黄河水运极盛时期。据有关资料记载，当时河口镇，河中桅杆林立，岸上商贾云集，车水马龙，熙攘繁荣。河口码头，在清代是黄河上游的大码头，河口镇也因此成为黄河岸边的一个繁华小镇。清道光十年（1830年），河口码头被水淹没，西来船筏有一部分改停包头南海子（5）。民国十五年前，包头是萨拉齐县管辖的一个镇，南海子码头归土默特旗管理，清末民初也曾繁荣一时。据1922年有关部门调查，仅青、甘、宁等地水运到包的货物总量达五千万斤。1923年，京包铁路修通，在我旗境内这段黄河中

行船逐渐减少，河路运输遂趋萧条。

民国七年，从银川至河口第一次有机动船航行。当时有商人陈润生、向涤修发起组织甘盐轮船公司，官商合股，购置飞龙船一艘，船长6丈，宽1.4丈，载重2万斤。由宁夏横城堡下水，至托县河口，曾航行两次。后因机船吃水较深，行船时有搁浅，加以资金少，支大于收而停办（6）。

黄河上的渡口已有二千多年历史。在土右旗境内有官渡二处。据土默特旗档案记载：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清世祖巡防鄂尔多斯时，曾谕示在土旗境内设立官渡二处，传递公文折报，巡缉盗贼奸宄，稽查犯禁货物。一处设在下水的胡滩河坝（托县境内），一处设在上水的毛岱，称为毛岱官渡。旗署派官兵驻守，备皮筏两只，收取渡费维持开销。同治十三年（1874年），黄河改道南移，毛岱官渡遂亦停废。

现土右旗境内黄河岸边有航运局批准发给执照的渡口七处，即：八里湾（土托交界处）、庆龙店、赛乌素、三道壕、团结渠、王海和营子、尹蛇营子。

团结渠扬水站有机制拖船一艘，能载大型汽车渡河。

注释：

①见《包头公路交通史料汇编》第三卷《黄河水运及包头商埠的发展》

②见《元史》一、115页

③同注①

④同注①

⑤见《托克托县志》

⑥同注①

发生在廿四顷地教堂的几件事

社 瑞

二十四顷地天主教堂，位于萨拉齐南部二十公里处。这个教堂建立较早，在过去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过一些事件。现就几件事叙述如下：

一、廿四顷地天主教堂建里围堡

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是绥包地区土匪活动最猖獗的时期。成千上万的股匪到处流窜，杀人放火，奸淫抢掠无所不用其极，村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真是民不聊生。在此情况下廿四顷地天主教堂为了保障全堂神职人员、修道院、婴孩院之安全，不得不积积做防御工作。除村周围早已建成大围堡外，在紧靠教堂周围又修建一层“里围堡”，地方人称之为“里罗城”或“里寨子”。特别是因达拉特旗小淖教堂遭受一次土匪的突然袭击，给廿四顷地教堂敲响了防卫的警钟，不得不做防卫工作，以期达到未雨绸缪的安排。

小淖村位于达拉旗境内，是天主教堂所在地，在包头市东南，相距仅廿公里之远，因黄河一水之隔，交通不便，真所谓是“一水之隔似千里”。

小淖村当时是达拉特旗境内较为富庶的村庄，零星小股土匪不敢骚扰，而大股土匪则对该村垂涎已久，他们知道教堂内拥有不少洋枪快炮和新式武器，这是土匪所惧怕的武器，又是梦寐以求的目标。

一九二五年春，匪首苏雨生、赵友禄、刘喇嘛等扩充实力，壮大声势，纠集三千余人，趁黄河解冻之际，包头援军不便迅速到达之时，盘踞于小淖村附近，伺机袭击教堂。三月十七日午夜，由于民团防范不严，匪徒趁机攻击小淖村外围堡，民团一发觉之后，已与匪形成短兵相接。因敌众我寡，民团边战边退，直退到教堂里围堡内。这时村中大多数教徒听到枪声仓惶跑到里围堡，婴孩院的婴孩与贞女一百二十余人，也急忙进入堂院。民团退入里围堡之后，立即登上钟楼，民团虽然少，但占有利地形，居高临下与匪徒展开激烈战斗。直至十八日太阳将落时，突然听到炮声隆隆，方知是包头援军（冯玉祥的国民军）赶来这时里外夹攻，土匪溃逃，村中财物、牲畜损失不少，但里围堡固若金汤。此次战斗，民团死六人，伤廿余人，击毙土匪六十余人，伤二百多人。

廿四顷地教堂神甫陶德模（比利时人）以此为鉴戒，遂于当年四月中旬即动工兴建里围堡，至六月底全部竣工。围堡为长方形，东西长约30米，南北宽约150米，墙高6米。里围堡将大经堂、神甫院、修道院、婴孩院、伙房院、牲畜棚圈粮食仓库等，都圈入里围堡，而男养老院和男女学校因距离较远未能圈入里围堡。原来主教神甫“小坟园”，在修道院西墙脚下，这次向西墙展出十余米，所以小坟园也圈入里围堡。

围墙四周建起炮楼六座，即在围堡四角各一座，北围墙正中一座，南围墙正中一座。南炮楼正建在堂院大门之上，将堂院

装饰的雄伟壮观，城门与炮楼均系砖石结构。在北墙偏西部位留有一个小便门，便于守卫人员出入，南墙偏东南同样也留一门，便于婴孩院和女教友出入。

这项工程建成后，教堂内外所有人员均都感到：在此战乱之年，有此堡垒安全有了保障，再不受土匪的蹂躏。

现将主教神甫小坟园约略简介如下：主教神甫小坟园，占用土地不足半亩，在教堂西菜园的东隅，紧靠修道院西墙，其中安葬着历年逝世的主教神甫十余位，还有修道生三名。在主教神甫每一墓前都立有一座精致的小石碑，碑上刻有拉丁文与中文的墓志铭，“晋译”或来华年、月、日和出生、逝世年、月、日等。在文革十年动乱中，墓碑砸烂，坟墓摊平，现已成为通行大道。

二、王英炮轰天主教堂

自甘四顷地建成了“里围堡”，村民度了几年平安生活。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国内军阀混战正烈，绥远省会被张作霖东北军（奉军）占领，是年冬季，张作霖命令王英杂牌军由包出发，开往山西省河曲，企图袭击阎锡山的老巢。王英带领一千五百余人途经甘四顷地城下，要进驻该村。当时教堂陶德谟、傅本堂、狄文华等神甫共同研究，一致认为王英所部为乌合之众，如果让其进村，物质损失在所难免，对村庄的道德风化之损失是不可估计的。所以决定将城门紧闭，拒不接纳。王英目睹此情勃然大怒，并说：“甘四顷地并非外国人的租借地，是我们中国人的土地，外国人有何权不允许中国军队进去？外国人又有何了不起？不允许我进城，我就以武力对待。”在此紧要关头，幸有土默特旗的克英雄之一满泰在旁，

力加劝阻，从中调停，陶德模与狄文华等也略有让步，只允许王英本人与其少数部属进城。王英因部队不能进村，自己也无颜进去，遂气愤已被并扬言道：“让我进去！我偏不进去，但我会让炮弹进去！”于是，将部队撤回高商人尧村。（高商人尧村与甘四顷地相距二公里），并指挥炮兵连续发射迫击炮四发，但四弹均未命中，一弹落在养老院房后距钟楼15—20米左右，未造成伤亡事故，一弹落于养老院西隔壁老教徒于六房的后墙上，炸开一个大窟窿，炸伤其孙女与孙男，但伤势轻微，无大损害。另有两弹落于距钟楼较远的空地上，当时正是下午三点左右，村里人突然听到连续爆炸声，甚为惊惶，民团携带武器登上炮楼，修道院几名较大的学生也登炮楼，配合民团做戒备工作，以防王英部队的袭击。可是王英在一时的愤怒下向教堂发射完炮弹，随着炮弹的爆炸声已将其胸中怒气泄尽，而甘四顷地教堂被轰击也只是烟消云散了，人们安然度过一夜。次日清晨，王英大队人马从甘四顷地南门外大道上直奔党三尧准格尔旗境内开去。

王英当了奸奸，早已作鬼，逾矣万年。然曾被炮轰的天主教堂洋楼仍安然无恙，在甘四顷地一带流传着妇孺皆知这一段史话。

三、孤儿何元珠的惨死

何元珠为萨拉齐县水洞沟门村人，生于一九一〇年左右，幼年父母双亡，无人抚养，后经他的亲戚把他送在甘四顷地天主教堂孤老院，直到成年。教堂给他配一婴孩某女为妻，自此成家立业。何元珠还在教堂内服侍神甫，端饭、扫院做些勤杂活。几年后，教堂发现何元珠有偷盗行为，遂开除出堂，使其

另谋生活出路。

一九三〇年二、三月间，何元珠在夜间将本村武毛孩两匹马偷走，欲往包头出卖，行至沙尔沁村被该处民团识破，将人和马全部扣留，当即送交小巴拉盖天主教堂，教堂民团又将何元珠和所偷之马送回甘四顷地，由甘四顷地民团管押。当时正值军阀混战之际，政府行政机构处于瘫痪状态，甘四顷地民团团团长陈福小与当时教会会长焦大、石桂珍、李满雄等，共议此事如何处理？如送萨拉齐县政府处理，此系属于盗窃案，至多拘留数月，即行释放。恐怕释放后要变本加厉继续作恶或流为土匪贻害地方，后果不堪设想。因此，迟不如早，早不如快，最好将何元珠处死，免无后患。但民团团团长与村中会长们，均无处死之权，谁也不敢承担这桩人命案，遂请示教堂神甫陶德模。陶德模听到教徒偷马非常愤怒，于是坚决主张将何元珠立即处死。为了避免将杀人罪行传出，安排在夜间将其活埋，走漏不了风声，自以为是绝妙好计。但何元珠从小来到教堂，也即已接受洗礼，成为教徒，按教义还须顾忌身后灵魂大事，以免坠落在永苦地狱。在执行活埋之前，先要何元珠领受告解神工圣事。一般在地方上听告解开神工是由宗世铭神甫办理，但陶德模不让宗世铭听告解神工，原因是何元珠以前侍候过宗世铭神甫，因何元珠趁清扫住房之机曾偷盗过宗世铭的怀表与长袍，还有其它什物，恐其有所回遣，不敢坦白告罪，故不让宗世铭听其告解，特令徐正鹄（修道院长神甫）听其告解办神工。何元珠领受临终神工之后，由民团在夜间绑赴城外西北部树林中将何元珠秘密活埋了事。

据说，当何元珠被推下土坑之后，遂大声哭泣、嚎叫，请求饶命，并拚命向上爬登。因为这是外国神甫命令，执行埋他

的人又有谁能逃他活命，其有用铁锹乱砍，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人们总是不愿狼戾狼劈，所以何元珠砍倒爬起，爬起砍倒。如此反复多次，直至何元珠不能起立，才算埋掉。此情此景甚为残忍，其死之惨，不可名状。

何元珠惨遭活埋之后，不久水涧沟门村他的本家人听到这一悲惨消息之后，立即到萨拉齐县政府告状。随后县府派专人到廿四顷地调查，并追究其主谋者，于是由教友会会长石桂珠、焦大等到县政府出面赴案，经多次审理，最后判决由人命肇事者应出两千元（银元）作为对何元珠之死的赔偿，对其家属的抚恤，免于刑事处分。石桂珠、焦大等会长，意欲将此款摊派给廿四顷地教友们分担。先请示本堂神甫陶德模，而陶德模神甫内心清楚，知道自己是此案的主魁祸首，决不能将此罚款强加于教友头上，如由群众分担恐引起群众公愤，于己不利。于是他又装出一付慈善面孔，并减轻教友负担，此项赔款完全由教会负担。死主从教堂提取两千银元，将此人命案件不了了之。

何元珠死后，其妻改嫁到缸房营村。据当时廿四顷地教会内部人员传说：“陶德模于活埋何元珠的次日，即意识到活埋何元珠是他有生以来最大特大的罪果，为表示其内心悔过之意，就开时守大斋一个星期（斋戒禁食一个星期）。在当时就有人指责他的做法是极大的罪果，即使再加千万个斋戒绝食，也难弥补其罪过万分之一的。

经过萨拉齐县政府处理了这桩人命案件之后，死主不做追究，政府认为此案已结无事了。

解放后一九五二年春，人民政府为了给人民做主，为惨死的何元珠伸冤，将主谋凶杀何元珠的主犯陶德模逮捕归案，进

行审理。决定监押一年，使其认罪伏法。一九五三年春将陶德模驱逐出境，为惨死的何元珠伸了冤，大长了中国教徒的志气。

萨拉齐万国道德会

宗 法 社 金

万国道德会，成立于一九一二年前后。总会设在北京，总分会在上海市，各省、市、县、乡村均设分会。

创始人是山东历城县江希张先生，黑龙江省杜延年先生，热河省朝阳县王风仪先生。江希张、王风仪可称理论建设，杜延年是总会理事长，是实际领导者。

会内组织：总会及各级分会，皆分别选举理事会，以管理领导会内各项事务。监事会以监察会内工作人员财务等。又设董事会，董事的条件：在会内有过贡献；理监事退职后又经推选者；地方上有声望的人。

万国道德会，信仰宣传儒家大同学说，工作项目较多。办女子学校和其它学校和学术会，安老院、怀少院，理疗病（一种气功疗法，性（心）理学讲习班，伦理学讲习班及各种社会福利事业临时救济组织等。

万国道德会由一九一二年开始成立，至一九五二年终止，约活动四十年左右。在五〇年国务院经过调查结论，“为旧文

化团体，无其它背景”。在五〇年至五二年左右，北京总会及各地分会学校的教职员工和财产等，先后均移交政府接办。如萨拉齐启智女校即是如此。

万国道德会的宗旨和理想

宗旨：原文“万国道德会以改建社会，缔造大同，促世界进化，谋人群幸福，实行利民生，自民智、敦民德之计划为宗旨”。创建人江希张先生，在一九一二年间，大约五、六岁左右，引证诸子百家，儒、回、道、佛及国内外古今名人理论，注解成《四书白话解》及《四书新编》，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地多处大量翻印，几年时间风行全国各地，因此声誉很高，人人都称为“江神童”（相似近年来的特异功能）。江的著作还有《道德经白话解》、《息战论》等多种。他常说“世界治乱在人心，人心邪正视学说”。他信仰孔孟，认为孔子大学上“平天下（世界大同）在先治其国，治国必先齐家，齐家必先修身（个人品质），修身必先正心（存心端正、品质良好），正心必先诚意（意念真实不虚饰），诚意必先致知（真理的真知），致知在格物（研究事物真理，去除虚妄之念）”。他认为这种个人和国家的顺序要求讲的很好。人集而成家，家集而成国，国集而成天下。所以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之本在心，心之本在意念，意念之本必须格物致知。由格物至修身是内圣，他认为圣贤的思想品质最高，要求人人必须成为圣贤。由齐家至平天下是外王，就是先有圣贤的思想品质，然后才能治家，治国平天下。大学上“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就是说本身思想品质行为错了，

而去治國平天下是不行的（而末治者否矣）。他講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包括了多種思想哲學、文化宗教理論。他認為這種理論雖然古老多年，但有新的先進意義，不但中國適宜，外國也適宜。

對孔子的禮運大同篇：“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聚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他認為大同世界這樣學說是全人類最好的境界，是全世界人類的理想方向，只有大同，才能世界和平，人類進步！

江希張幼年有一首詩，表達他的志願詩曰：“基回道佛同開化，魯爾鄒風滿地球”（基、回、道、佛是宗教，魯指孔子、鄒指孟子）。江希張的志向，要將孔孟的儒家學說推廣發展到全世界各國，所以名稱叫萬國道德會。

萬國道德會有個王風儀先生，是個老農民，世居熱河朝陽縣，識字不多，非常關心世道人心、國家大事、社會風氣。平時對他所知道的，所接觸的人和事，不論好壞，他常深入思考、研究分析。因此，遇到不少人的思想品質他很不理想、很看不慣，越想越想不通，又無能為力。因此不願再活到世上，竟七日七夜不吃不喝，餓死後又活過來（有一本書《篤行錄》記載），以後下決心要改變這種現象。他研究國家社會是由多數人集合而成的，人是基礎的。他認為世界的治亂興衰，社會的風氣好壞，都決定在人。他分析研究過很多人，得出一個規律：人的一生成就和品質好壞，由少而壯，由壯而老，大多

数人决定于儿童时期，受到母亲的影响最大。幼小心灵先入为主，如模型造物不易改变。因此人的一生，母亲影响很重要，母亲又有母亲……，母亲的幼苗是姑娘。因此他说“姑娘是世界的源头，社会的根本。”要想世界好、社会好，先得从源头上做起。再说贤妻良母，是家庭社会转移的关键，关系重大。因此姑娘要自幼读书明理识大义，懂得人义礼智的为人之道和其责任影响之重要。王凤仪自己还编出《姑娘道》、《妇女道》等一套理论行为规范，并大力宣传他这种理论，得到不少人赞称。所以道德会由总会以至各级分会大都要先办女子学校和妇女识字班等。

在上述理论思想宣传下，萨拉齐很多人也一心模仿，要在本地开展这项办学工作。先是由杜立堂、杜良臣、赵斌等人发起，由北京总会及绥远省分会与地方政府分别于一九三八年批准备案，成立了萨拉齐万国道德会分会，田端符为名誉会长，杜立堂担任理事长，理事有杜良臣、陈模、高怀秀；赵斌、董怀仁、高怀秀为监事。一年多之后，杜良臣接任理事长，杜立堂变为理事。抗日战争胜利后，徐子文接任了田端符的名誉会长。会员有一百多人。

万国道德会萨拉齐分会成立后，众人捐助部分资金，北京总会派来讲师和从北京总会请来刘继芸等三名女教师，开办论理学习班、妇女识字班，促进了家庭和睦，深受群众欢迎。所以，一年左右时间里学生由四十人逐渐增到一百多人，第二年成立了女子学校。

萨拉齐源善育婴堂

王与贤

解放前萨拉齐的源善育婴堂，在地方上很有名声。因为育婴工作的开展，真是妇孺称道，人人皆知，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笔者走访了数家，尤其一位姓辛老人，详细地介绍了该堂的前后情况，纪述如下：

育婴堂的基本概况

源善育婴堂在清朝时代光绪年间，由土合气村王天成开始倡导，在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进行筹备，民国六年正式成立。开始创建的人有萨拉齐城内大南街辛加福、王守才、许如等贵。规模很小，人数不多，从萨拉齐城内南门里一家商号叫恒益泉，赁住一间小房进行工作。以后有清水河县人孙世廉（当时在王海和营子居住）及萨拉齐人王贵禄、胡崇山等人，加入该堂协助工作。这几个人对育婴工作非常出力，在原来的基础上，他们又集中了些钱，买到大南街路东院子一所，又增盖了新土房，经营了十数年，由小到大，逐渐发展。除萨拉齐的育婴堂壮大外，又发展了十三处育婴堂，这十三处是设在：

沙尔沁、鄂尔格逊、土合气、板申气、木头湖、马留村、美岱召、三眼井、公布村、大喇嘛窑（准旗），固阳县城，包头市东河区等地。每个育婴堂常住的人数三至五人，或十几人不等，主要以堂内业务多少而定。每个育婴堂都有一个专业接送婴孩的人，其余的人也都随时帮助。这十几处育婴堂，经济上都各自经营，工作上都紧密联系。如收送婴儿、介绍奶妈等，一切都互相关照。育婴业务多少，都不一致。

萨拉齐育婴堂多年来的主要负责人孙世廉活了八十六岁，在一九六四年去世。负责人还有辛尚德活了八十七岁。王贵禄、呼彦文都活了八十四岁，皆在一九七〇年前后去世。另外可记起的美岱召育婴堂由李伦、董和成，公布村育婴堂由王玉珠、王玉基负责。抱婴孩的人在萨拉齐有武三、贾国旺、董立成；在板申气的有杨计修；包头市有陈元、张月明；马留村有刘银娃；鄂尔格逊有陈叶、郝升、王如青等。这些抱婴孩的人，多年来，往来于群众中，非常辛苦，在群众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组织管理：育婴堂在业务管理方面，由育婴堂的群众选举组织理事会，以管理经营各项事务。理事有孙世廉、辛尚德、呼彦文等人。每到年终时，将一年来的业务收支等情况，都公布于众。

经费来源：源善育婴堂的人，大多是农民，都能劳动种地，所以他们始终重视种地生产。在堂内劳动的人，基本上是义养的，他们只要点简单的吃穿。积累下的财物，大都花到育婴事业上。土地的来源有买到的和有人施舍的，共五顷多。例如孙世廉本人就施舍给育婴堂土地一百五十亩，大喇嘛窑白三先后施舍土地一百多亩。这样施舍土地的人比较多。育婴堂种

地是自备农具，也有牛马及简单的大木车（俗称二饼车）两三辆。每年种地收入粮食一百多石。也有人施舍些粮食、金钱。如呼彦文一次给过谷子二十多石，合六千余斤。但这种收入是有限的，不是收入的主要来源。

育婴情况：在旧社会有一个不好的习俗，流行甚广，就是生下孩子有的不愿抚养。其原因较多：如婴孩的父亲有病，或者生母不幸死亡，因而无法抚养；有的贫苦人家生的孩子多了，抚育不起；有的不喜欢女小孩；有的较富裕的人家，也不愿意多要女小孩。因为当时社会上节制生育的方法不多，形成无限制的生育，生下后有的丢在水中淹死，有的干脆扔到野地，让飞禽走兽吃掉，形成了一种很残忍的习俗。

育婴堂的人信因果报应，以育婴为行好积德之事。如孙世廉常对人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后世果，今生作者是”。所以他们很起劲的做育婴工作。多年来，他们出了不少力气，也想出了行之有效的方法。在那个时期，各个育婴堂救活的婴儿数不胜数。在育婴堂长期负责抱送婴儿的人，为了挽救婴儿性命，不畏疲劳，不嫌肮脏腥臭，污秽不清，非常耐心。多少年如一日，工作态度十分可嘉，有时在严寒酷暑，刮风下雨也到处奔跑，找弃婴，找奶妈等，这是连续紧迫的事。找弃婴如果晚了，婴儿性命就可能保不住，有婴儿没奶吃也不行；已经弃出野外困饿多时如果吃奶晚了，又可能死去。因此，找婴儿是一种抢救性的紧张工作。这样救活的人很多很多。例如有个叫辛秀连的，现在五十岁左右，在沟门庙湾居住；萨拉齐大南街还有个妇女现已六十多岁，叫柳小珍，有孩子三人；还有宋引儿四十多岁，现在包头市昆区某校当教师。她们都是在这种状况下挽救过来的。抱婴

孩的人，平时还得做好调查工作，不管大街小巷，都要挨门逐户设法打听，哪家有孩子多少，哪家要生小孩及不愿意抚养，哪家妇女有奶，能不能奶小孩等情况，事先都要询问清楚，做到心中有数。如遇到不愿要小孩的人，待生下后就主动上门抱回育婴堂，或从野地拣回来的小孩都能及时的送给奶妈喂奶及给衣穿。

临时抚育：从外边抱回婴孩或从野地拣来的婴孩，是急需喂奶的，但奶妈是比较缺的。如果平素掌握的奶妈不够用时，就赶紧到乡村里去找，这是很辛勤的一件事。另一种是贫苦人家，生下孩子抚养不起，但生母有奶，这样育婴堂就给生母奶钱，雇生母奶吃，按月付钱，每月大概四至五元左右。奶的时间一二月或一二年不等，待有机会，再转移到别处，以免仓促找不到长期奶妈，把婴孩饿坏。用这种方式雇奶妈的不少，也解决了救急问题。但有一个曲折，一般生母是不愿给奶的，怕奶亲了难以给人，所以，必须转一个弯儿，即先将婴儿抱出去三两个小时，再抱回来，哄说是别人家的小孩雇奶（因为初生后，她不认识是自己的小孩）就给奶了。

还有一种急救哺育婴儿的办法。有时小孩收集的太多了，实在没办法，一个奶妈就得临时抚育二至三个或三至四个，一个人的奶如不够吃就买牛奶或熬米汤喂养；有时还找有奶的人给喂一、二顿，或一二日，逐渐再找奶妈。用这样的办法经过三至五日，半月廿日或更长时间的抚养，直待找到奶妈送出去后，才算结束。这种同时收养几个小孩的奶妈人数也不少，如过去大南街有个李老婆，很热心做这种工作；柴火市街有个张荣女现在六十岁左右，她曾做过很多年这样的工作。

时间长了，育婴堂收抱小孩的名声也大了，也出名了。有

生下小孩不要的人，就自己将小孩送到育婴堂，或告知育婴堂派人去抱。这样一来，社会上用水淹死和扔往野地的小孩，就大为减少了。解放后于一九五五年，县统战部开会时，对于做抱送小孩工作的人，有过多次的口头表扬。

婴儿出路与奶媳成风

对于这种弃婴既然要及时的收回来，还得想办法按时送出去，做到随收随送才不致大量集中，负担太重。再一点，送出去后使其成人长大，做到“幼有所长”，是育婴堂最终目的。从总的婴儿性别来看，女婴占绝大部分，落脚到乡下的较多。

1、解放前有缺儿少女的人，也愿意收养子女，他们常常到育婴堂去抱小孩。育婴堂对婴儿是负责到底的，还定下一条规则制度：对于来要小孩的人，必须有保证人，立保证契约，避免对婴儿虐待和贩卖或发生其它问题；对于要小孩的人，还根据其经济情况，育婴堂酌情收少量的衣奶费，遇贫困者不交也行。育婴堂所抚养的婴儿大部分是经过这种途径送出去的。

2、有的奶妈妈的时间长了，对小孩有了感情，当地所谓“奶亲”了，不舍得给人。虽然自己子女多，家境困难，宁愿吞糠咽菜，忍受生活的困难，也就当自己的小孩抚育了，和自己的子女一样看待。如在萨拉齐中学烧过锅炉的白小峰，就是一个例子。

3、有的奶妈妈亲了，怕小孩到不熟识的地方受虐待，奶妈就给自己的三亲六故介绍送去，做了儿女。

4、有些人家娶不起媳妇或为了娶媳妇省钱，奶闺女长大

了，就做了儿媳妇。因此周围的人或亲戚朋友看榜样，也去育婴堂抱回女孩想法抚养，长大了也做了儿媳妇。这样既是奶闺女，又是儿媳妇，成了双重关系，婆奶女儿媳于一堂，家庭和睦，吵闹稀少，光景也过的不错，很少有婆媳不和之事。群众奶媳妇省了钱，救了命，有多种利益，在萨拉齐城乡奶媳如曾经成了风气，盛行多年。这样的家庭到现在还不少。如公布村有个“二奔声”，现在儿孙满堂就是这样的家庭。

5、有的婴儿因为有病，或者身体不健全没有人要，送不出去，始终留在育婴堂内生活，也有好心的人接回去养育。如大南街有个武三，先前在育奶堂抱送过婴孩，就收养了一个有腿病的闺女，关系还很好，如同亲生女儿，以后找了人家，现已六十多岁，在萨拉齐镇太平街居住。

其 它

抱回来的小孩，如果生了病育婴堂备有小儿常用药物，如惊风散、脐风散、泻痢片、感冒药等，能得到及时的医治。还有特邀的义务医生，及问病吃药等办法。

萨拉齐源善育婴堂建有账簿，登记婴儿出生年月日，生身父母收养婴儿的父母等，野地拣回来的无法登记其父母，只登记年月等。从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开始，到解放后的一九五八年止，共收过婴儿伍千四百余名。（这个数字孙世廉去内蒙民政厅开会时报告过。）不包括其它地方十几所育婴堂数字。

孤儿院和养老院

萨拉齐育婴堂还成立过孤儿院、养老院。解放后婴儿都长大了，能自立生活。如美岱召乡有一个李兵小，原系育婴堂的孤儿。养老院最后有二个老人名叫董立成、乔富（在德茂永巷居住，现在的青山剧院南口），在一九七三年才死去，都活了七十多岁。

救 荒

源善育婴堂在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旱灾严重时候，曾拿出谷子一百五十石，通过当时的政府在萨拉齐县和清水河县做过灾荒救济补助。

立 学 校

当时地方上学校很少，失学儿童很多。源善育婴堂先后办过两次学校。每次约七年到九年，学生人数百余名，老师四名。记起一名叫王化甫，是三道河的一位出名秀才，学问、品德、教学都很好。所以群众争抢入学，校舍有限，十分拥挤，但当时在社会上博得好评。

修 浑 源 桥

山西浑源县有一条河叫浑河，水面稍宽，是南北通往的一条要路。往来的行人车马很多，当地的人尤其农民，因涉水过

河，受寒受湿，造成腰腿疼痛，胃病、腹痛的很多。该县有一位老秀才叫王祥，他和孙世廉有较深的交情。孙世廉曾两次到浑源，亲自淌过几次水，也听到当地农民告诉这条河水给人造成疾病情形，孙世廉当时就产生了修桥的打算。在一九三五年（民国廿四年）孙去绥远呈请省主席傅作义，要求在浑源修桥，经省府派人调查后，批准修建（当时山西与绥远据说还是一家，如山西太原有萨拉齐的省议员等）。孙世廉领了王恒亲自到浑源督工修桥四个多月，花了现洋五百元左右，修成了一座大木桥，人人称赞。完工后，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奖给孙世廉一个木匾，上书“热心公益”四个大字，下边注明修桥经过。这个匾一直在育婴堂挂着。于一九五八年该堂解散后不知尖落何处。

总的说来，育婴堂在旧社会救了不少婴幼儿的性命，也是当时社会上不可缺少的一种福利事业。

“善人堂”的见闻

刘绍仁 寇永亮

萨拉齐的育婴堂，原名为忠信育婴堂，成立于清光绪廿三年。为何要冠以“育婴”二字？无非是为了培育婴儿之意。由于过去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溺婴、弃婴的屡见不鲜。他们本着清佛教的教义，认为上天有好生之德，对遗弃的初生婴儿进行

抚养，所以名之为“忠信育婴堂”，而在当地人习惯上称“善人堂”。

他们是信奉清佛教，是独生主义者，男女一般不婚配。在称谓上：男的尊称某先生，女的称某姑娘。饮食方面要戒除肉食等。另外服饰方面，总是带有古老形式，一律穿浅兰色土布衣服，真所谓是：慈眉善目、道貌岸然，也就是人们称之为“善人堂”的原由。

忠信育婴堂其始由山西太原传入萨拉齐。其先开设在萨拉齐城北水涧沟门村西湾，后有王化南者给施土地十八亩，于是在沟门西湾营建了育婴堂。不久又在萨拉齐城内东北园子紧靠城墙购置土地四十余亩，在此土地上正式建成忠信育婴堂。其院为东西跨院，内有佛堂、宿舍，并有中药房，还有粮食加工的碾磨房；东院除库房外，一般为女姑子居住，指出家修道的姑娘，是终身不配偶的。由老姑子掌握管理。房后有园地，栽种不少树木。

育婴堂除萨拉齐城设立外，在水涧沟门、北只图、板申气、美岱召等地都有堂口，并拥有一部分堂地。尤其在白银厂汉村堂地比较多，大约四五顷有余，因那里信奉清佛教的人比较多。堂地的收入作为一部分经费之用。

因育婴堂历史深远，在人心目中他们是道貌岸然，习惯称他们为老善人。叫这一名称在萨拉齐较为普遍，所以称“善人堂”尽人皆知，面对“忠信育婴堂”这个名称知道的人很少。

育婴堂很重视育婴。有的人子女众多，家庭贫困，无法抚养，在孕期即告诉给育婴堂的人，待生下后抱走，由堂雇乳母抚养。万一雇不到奶妈，就请生母暂奶，奶母雇不到，生母也不给奶，即由堂内姑娘以牛奶等喂养，遇有子女短缺者，就去

堂抱回当作螟蛉子抚养。抱时任其选择，满足欲望。堂内接收下的婴儿，进行登记，以备婴儿长大认识亲人，以期达到破镜重圆的目的。

育婴堂除做养育婴儿工作外，并独创一格地拣拾“字纸”（废弃有字迹的纸）。拣拾“字纸”是其专门业务。按其教义《洞冥记》中有这样的说法：“字”是圣人仓颉所造，如把圣人造的字任意践踏会触怒上天，死后在阴曹会受各种刑罚，如此等等。他们针对有些人不敬惜字纸之故，提出了“敬惜字纸，功德无量”的行善旨意。因此，他们非常重视拣拾字纸，并责成专人拣拾。经常碰见身穿布袍走街串巷，慈眉善目的老者背负布袋，上书有“敬惜字纸，功德无量”的字样，手持长铁镊不声不响地活动在街巷里拣拾“字纸”，常年如此，年复一年。

为敬惜字纸，堂内建有焚烧炉，专门处理字纸之用。先通过洗涤，达到净化、晒干、然后焚烧，把灰烬装入袋中，倒入黄河，付之东流，体现了敬惜之意。其心之虔，可见其一斑。

在育婴堂的道徒经受戒后，按其教规，在饮食方面以吃素为主，对葱、韭、蒜都不吃。他们认为凡是肉食物全是经过杀牲伤害过生命的事，正如朱伯庐《治家格言》中说：“毋贪口腹而恣杀牲禽”。更重要的是爱惜生命，所以他们又把“放生”做为行善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他们的一项重要事业。

育婴堂周围有茂密的林木，每到春季，郁郁葱葱，蔚然成荫，果花开放芳草遍地，还有汨汨的渠水川流不息，在这个幽静的地方，也正是鸟儿歌舞的乐园。每到春天，有十余种候鸟来临，真是到处莺歌燕舞，更觉沁人心脾。在这样的环境中，玩童游于，带上罗网、夹子、喷筒等工具，进行捕捉鸟儿，以此

为乐。但是，有的将所捉的鸟出卖。有的人掌握了“老善人”的“教义”惜生，故意将逮到的鸟进行残害。“善人堂”老先生为救鸟的生命，不惜花钱买鸟放生，以示其爱惜生命。又似一种爱鸟行为。同样他们在黄河畔上也搞“放生”。逢到春季黄河解冻，不少人在撒网捕捞，为此，开河的金色鲤鱼，育婴堂派专人在黄河渡口一带买上鱼再放入河中，每年单花这项放生钱就有四、五千银元之多。

忠信育婴堂按其教义还翻印好多种劝善书籍，其中有《玉历钞传》，此书完全论述“六道转轮。”即人生都有死，死后阴曹地府按生前所为给以“善赏恶罚”，善者还能投胎转世，恶则不然，意味着因果报应。此外还有《太上感应篇》、《阴陟文》、《觉世真经》三篇合称为“三圣经”。《感应篇》托名为太上老君所著，其开宗明义即曰“祸福无门，惟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司过之神，认为人的一切所做所为，都有神在监视，并及时给以报应。此书满清乾隆皇帝曾颁有圣谕，要一般臣民学习《感应篇》。

《阴陟文》为“关圣帝君”所著。关圣重“义”，故在文章开始即曰：帝君曰人生在世，贵尽忠、孝、节、义等事。《觉世真经》为张桓侯大帝所述。总之这些书不外劝善而已。

另外还撰有戒大烟歌，其歌曰：“近年来鸦片烟流毒甚广，原生在异邦地海国外洋，四五月开罢花露出头像，割一刀泪汪汪痛哭几行。收白水入桶内色如面酱，暗放在盆缸内锁入柜箱。州府县出告示严禁贴榜，……”。这歌充分反应了大烟的毒害，应及早戒除，并配有戒烟药等，以期拯救沉沦在大烟毒海中的烟民。

既然育婴堂在培育婴儿和各种放生活动耗费大量金钱，他

们的经费来源除自耕土地外，在堂内设有碾磨房加工粮食回钱。此外还有地方士绅和“乐善好施”的人物也来堂内上“布施”。布施分“育婴”和“放生”两种，这是由上布施人所决定，堂内不做规定。堂内收到布施都要进行登记，按数使用。

他们居住在这个幽静的角落，来往的人也很少，所以“善人堂”又成为一个真正的修真养性的场所。在过去萨拉齐城内，每到春季泥井不淤，堂内还出动多人修路，为群众做些公益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发展，忠信育婴堂在一九六〇年初已停止了一切业务。道徒遣散，其一切财产自有一番处理，也毋庸细述，现已为萨拉齐历史陈迹，谨志之。

萨县万国道德会开办的放饭场

杜 金

万国道德会，在旧社会是一个宣扬儒家道德伦理的文化团体。它的宗旨：概括的说是改建社会，缔造大同，促世界进化，谋人群幸福，实行利民生、启民智、敦民德，使社会上的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总会设在北京。一九三八年间，在杜立堂、杜良臣等人的发起下，萨拉齐县成立万国道德分会。开始会址设于大南街魏家巷理门公所院内，不久迁到杜良臣的一所大院子里（现在的解放街第三小学院内）。接着创办了

私立启智女子小学，广收蒙汉各族女孩子来校求学（启智女子小学的发展情况，另外撰稿叙述）。在当时，萨县人民同全国一样，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后强行杀光、抢光、烧光“三光”政策，在大青山脚下，民生渠两岸惨无人道地杀害无辜、放火烧房强制并村，使农村田地荒芜、城镇百业萧条，许许多多劳动人民无衣无食，拖儿带女背井离乡，讨吃要饭者比比皆是，到处是一片凄惨景象。

万国道德会萨县分会杜良臣理事长，看到劳动人民吞糠咽菜，无法糊口度日的悲惨情景，激发了自己一向乐善好施的思想，决心为无法生活的贫苦人民开场放饭。于是他主动和本分会名誉会长田端符、源善育婴堂负责人孙世廉老先生等人共同商量，决定开粥场放饭，为极贫苦人民解决燃眉之急。

一九四一年春粥场开始放饭，共放了三年。规定每年在青黄不接或寒冬季节为开场放饭时间。凡是生活极贫、又自愿来吃饭者，不分民族、不分男女老少均可享受。来食者，由粥场发给一个木制领饭证，自己保管，作为领饭的凭据。粮食实行定量下锅，每日每人一市斤（七两小米或糜米，三两去皮高粮米），熬成稠粥，供给上午一顿。自备饭俱，领上饭在粥场院内吃，不准带回去，以防糟塌。

放饭决定后，粮食的来源与加工，以及炊事人员的安排，都做过充分准备。为解决粮食问题，杜良臣老先生，首先献出小米十石、糜子十石、高粮十石，孙世廉代表源善堂献出糜米十石、还有谷子（数字记不清了）。当时还有忠信育婴堂者以及赵斌、董怀仁等都捐献了很多粮食，具体数量回忆不起来了。

厨房是占用道德会外院杜良臣本人的一间东房，买了两口

大锅和用俱等，筑了炉子。做饭人开始是由山东省来道德会住的一位崔主任，负责义务劳动。打饭人都是会内人来义务帮助劳动。每早九点先将熬好的稠粥装入三个木桶，抬到粥房门口的大长木凳上，然后按量打给每个人。

在加工粮食方面，杜良臣老人与西院榨油碾米商店的经理全长胜、相生玉商定，由该店全部负责加工。

放饭开始后不久，家喻户晓，传遍城郊附近各村，每日从四面八方来吃饭的人络绎不绝，足有150—200人之多。由于轰动全城，也影响激发了一些心地善良的巨商户的个别士绅，也踊跃地拿出粮食和现金支援粥场。这就使放饭的经济来源尚未中断。在放饭开始不久，我不知道在放饭前万国道德会是否呈报日伪政府，但有两次我亲眼看到身穿绿色协和服，挎着发光的东洋刀，脚登高腰黑牛皮靴，带着眼镜的伪官员来到粥场，鬼头贼眼四下张望一番，进粥房观察后扬长而去。我当时不晓这些人是出于好奇，还是观察什么动态。

在放饭整个过程中，我亲眼看到有年逾古稀、手拄拐杖的老人，也有年过花甲白发苍苍，弯着腰的小脚老妇，还有携儿带女、披头散发，衣服褴褛的妇人。他们都是面黄肌瘦，精神萎靡不振，满脸愁容。触景生情，借人之心人皆有之，我也每早不由自主的来给他们打饭。我在同情心的支配下，有几次到吃饭人的身边问他们吃饱吃不饱，他们都异口同声的回答说：吃饱啦。有一位住在小厂陶窑村的老人说：唉，活下这光景不米吃不行，走也走不动了。还有一个河槽街居住姓毕的老太太和霞家园子一个姓赵的老人说：道德会的放饭真是救人啦，不放饭今春家中一点粮都没有了，怎活呀！

放饭期间，经常听到从美岱召和东老藏营来的农民暗暗地

说大青山上的八路军游击队，夜晚经常下山伏击日伪哨所、摧毁伪基层组织和火车站。这些振奋人心的消息时有所闻，也是给日寇敲起了末日的丧钟。古语云：“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日伪的残暴压的人民喘不过气来，如同黑暗的乌云即将消逝。人民日日夜夜盼望着胜利，如同东方黎明曙光很快来临。随着形势的发展，粥场一九四四年也停止了。岁月过去四十多年了，回忆起万国道德会和地方上热心慈善事业的老前辈们，他们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值得我们缅怀的。最后希望各界老前辈们，看了此稿如有差错之处，请予纠正。

昔日萨县匪患撮要

王永光

萨县匪患猖獗，盖自清末民国初为最。当时，由于封建统治王朝，内政不修，外侮频临，歹徒恶棍，乘机勃起，所到之处，奸淫掳掠，焚杀宰割，无所不用极，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兹撮其要以纪其事，叙述于后。

清宣统年间有响马之害，当时著名之匪，绥东则有赵有禄、大双喜、二麻烦、小状元等，邀路劫夺；绥西则有高二、黑棒子、王明罗等，入宅明火。然多昼伏夜出，枪械多为铜帽火枪，高二匪伙有径口马枪一支，号为五爪龙。匪伙们行劫萨属高泉营村刘银红高太恒家，抢去元宝四十余枚。另有三四

井子弟兄，由绥东窜扰萨、托、和各县境，绥民自此被匪扰害甚矣。

民国三年春，匪首三井子、四井子扰害萨、托一带，抄掠民警枪枝，捆绑富户勒索。秋，准格尔旗蒙民围匪股于萨属之九峰山，悉歼灭之，无逸者。

民国四年，巨匪芦占魁大扰绥境，归、萨、托、武各县，蹂躏殆遍。芦为丰镇隆盛庄人。十一月下旬，芦匪攻包头不克，掠其南境，抢人畜财货，纵焚村落，复东攻萨拉齐。十一月二十六日，遂陷萨。次午，达赖公入（外蒙参谋），翌日下午芦占魁乘黄骠入。砸监狱，开放拘留所，抢耶稣堂，夺城中警署枪枝，各乡民警枪械亦尽失。枪杀清丈地亩分局职员五人，塞北分关一人，盐稽核所一人，县署一人。分关主任宫树索，骂贼不绝口，支解之口。钱行二十家，城内外当行十家，银物如洗。城内土匪大起，各行同时受害。此次匪灾调查，各商号损失财产数目伤亡人数：计各商号共亡五人，伤二人，至所损失黄金、白银、现洋、钞票、货物、衣物、器具马匹等项，计共大洋三十二万八千九百零五元。公署局所住户共亡十四人，乡民损失不计其数。

是年十二月二十日芦匪分两股，一攻归绥属察素齐镇，一攻萨拉齐县城，凡经过村落，奸淫抢掠，杀人放火，惨不甚言。芦匪陷萨县城后，殷实商号被掠一空。威胁教员祝佩文书印信篆文，其文曰“塞北都督招讨使飞虎上将军芦”占据五日之久。官兵克复后，兵士借名搜查，全城数千户横被罗掠，无一幸免者。繁荣城市，顿成墟墟，前人有“匪如梳兵如篦”之语，洵不诬也。

民国五年芦匪受逐后，尚有百十成群者多股，流散于归、

托、萨、武各县境，往复抢劫为害，人民不堪其苦。

民国七年春，武川第一路警备队**譁**变，南窜萨、和各县境，煽变区团。时山前有吃痞志七，匪股约二百人与溃变团队勾结为害，出没归、萨、和、托一带，为害非浅。

民国八年秋，匪刘玉山、张太、周鸿宾各股分扰萨、托一带，先后为官军剿捕消灭。次年都统署通令各县，集资购枪，以备自卫。

民国十年春，旧历三月二十六日夜，驻防萨县城内傅营**譁**变，枪杀大东生店铺伙计二人，毡行一人，枪声达旦，居民损失约五六千元。明日，兵士差操如故，扬言昨夜有匪也。越日，师长沈广聚遣员道歉，驻军调去。未几，驻归属毕克齐镇骑兵亦**譁**变，市政大受骚动。是时哥老会首领杨万祯，绰号小五杨，在绥西招集党徒甚众，势倾一时。萨、包、五原一带，乡民多被胁入会者日多，各县警团多受煽惑，**譁**变为害，远至东胜，匪徒千余人，往返骚扰，殆无虚日。

民国十年夏，有陕西人杨万祯，秘密在包头设立马码，杨为龙头。会规一人犯法，大众营救，一人有钱，大众使用，有触犯会规者，众起除灭之。分为清混水两派，混水派会内称杆子上，即匪棍之类。清水派会内称秋子行，即劣绅赃官之类。考哥老会用意，似有类于南省之青红帮，不过愈趋愈下，原义尽失，及其末流，目的不外抢掠人财，渠魁坐地分赃而已。杨万祯密设码头于包头，土匪无赖争先进会，势力久而坐大，包头、萨县、五原、东胜各县，党徒甚多。又遣派多人，四出传播，传会者星罗棋布，绥西各县，蔓延几遍。乡人稍加非议，立遭横祸，久而虽以善良守法之人民，以不堪其压迫，亦皆迫而入会，以求旦夕之安，惟一经入会，所有财产，即与众

共之，任何耗費，不能顧惜。再如碼頭款（會名門份子）龍頭命令一下，數目任何重大，惟有竭力求交，否則立有性命之憂。故在會中遇有急要之事，籌集巨萬之款，往往咄嗟立辦，輕而易舉，其用途一為運動費，一為購槍彈費。小五楊既擁巨資，交游更廣，勢傾綏西，一時稱雄杰焉。都統警以綏西入會者眾，極難分斷涇渭，籌辦稍一操切，勢必株連無辜。不得已決定辦法，凡軍隊所至，以會內不少被勢之良民，故只問匪不匪，不問會不會之語，足見小五楊之流毒綏區，其罪惡亦不在芦匪之下也。

民國十一年春，旧历三月廿八日，萨县城内保卫总团譁变。入夜，枪声四起，掠商户骡马千余及库存，各村自卫枪三百枝，保卫总团枪四百余支，当行三家，搜索一空，破狱放出哥老会龙头张洪及狱囚百数十人，胁县长范增绪出走，旋释之，乃迫胁团总侯斌成，呼啸而去。

是年各区保卫团，闻哥志会发动得手消息，亦多譁变响应。一时重要会员如史五、崔老大、张彦标、乔功臣、于会、万海、丁成、要奎一等，均聚集城内，迫令侯斌成为首领。后都署以招抚为名，诱斌成入城正法。自萨县保卫团譁变后，继萨县而起者，有杨守成，有芦匪旧部苏雨生，马大牛两大股五六百余人，有段德胜，金双喜、任三亥一大股三百余人，大小匪股数达二千人。是年冬至黄河冻结，苏雨生匪窜入萨托各乡村，绑票抢掠，奸淫放火。时值隆冬严寒人民冒死逃避，或席号于僻野，或潜伏于深山，其苦何可胜言。同时萨属二区有高罗股匪四五十人，五区有李招兵股匪二十余人，为害不浅。

民国十二年春，綏西哥老会仍扩张势力，随处密布机关，

耳目遍地，侦伺官军动静，朝有警报，夕达匪中，以是剿匪至为困难。匪伙最大者为苏雨生股，流窜河西一带，萨、托包各县人民受害尤酷。男女被掳，变易田产凑资往赎者，不绝于途。先入会后为匪，新匪曾有府谷刘、郭得胜、陈得胜、张耀、郭长胜、金鹞子、小金子等，先后窜入萨县境内抢掠。二月初旬，郭得胜、金双喜二股约百余人，冲入萨属之美岱召，大肆搜掠，杀死村民张姓夫妇二人，绑去富户孟姓十余人，匪濒行告其家人，非有十元钞票五十斤，无望抽赎也。夏，苏雨生股匪扰萨托各村。十一月间扰害县属四五区者，为首陈得胜、张耀一股百余人。十一月二十日，窜入大岱村，死村民刘李姓者三人，马匹财物被掠净尽，掳去男女二十余人，后又勾结王元挠，王虎威集众三百余人。十二月十二日晨，包围距大岱村二里许之于家庄子，宅周柴草同时起火，光炎弥天，枪弹四射，于姓全家，被枪击死者十人，妇孺藏暗处为烧毙者三人，掠去骡马二十余匹，房屋粮草，悉为灰烬，损失约在四五万元。半日之间，家破人亡，惨哉远闻者，莫不痛惜。

民国十三年春，绥远省都统马福祥以土匪连年祸绥，非从根本清除，不足以弭盗源，于是实行清乡。令旅长郑金声为绥东清乡司令，驻扎萨县，旅长马鸿逵为绥西清乡司令，驻扎包头，又提升刘会文为三路警备队分司令，驻扎托县。刘会文首先捕获著名哥老会友池喜全及其党羽数人，一并就地正法。此次清乡，萨县杀匪一百余人……一时人心快慰，会匪人皆胆落，纷纷逃避，地方渐见安宁，难民多返故里，从事播种，此因实行清乡之功效也。夏，金匪（小金子）一股又渐出没于沿黄河一带，受害最重者即萨属黑沙兔李姓，新营村高姓，迭次抢劫损失在四五万元，直至家破人亡而后已。各县类此情者甚

多也。十二月间，都统李鸣钟到任前，对于土匪哥老会痛下剿除决心，令孙良诚驻萨县，石友三驻包头，万敬亭驻归化，田全凯团驻察镇。军队分驻后，执哥老会龙头小五杨，于绥垣，明正典刑，以绝后患。石友三复捕获匪首张洪弟兄在包头正法。哥老会经此镇压，始不敢公然在绥西为患矣。

民国十四年春，苏雨生、赵有禄各匪，于元旦日譁变，与刘喇嘛股匪合伙共二千余人，不数日流窜于萨、托、归、和各县境，奸淫抢掠，为状至惨，人民扶老携幼，逃往察、毕两镇者，途为之塞。

民国十五年三月间，有苗连长匪众（原充小金子书记）与藉毛杨猴小，刘营长诸匪合伙约一百余人，常往来于九峰山一带。四月间刘营长，苗连长等匪首被李根车捕获后，用铡刀斩首，火焚其尸。是年夏，萨属古雁村附近山内，窝聚冯六奎、尚得胜一股二十余人，后收抚。不久，土默特煤厘局矿巡队譁变，与哈素村村中奸人陆念攻入村内，死居民十一人，火焚四五户，掠去马匹钱财无数。六月间，天久未雨，各县大旱，民心惶惶，各处无赖辈，三五成群，持棍行劫，名曰“不浪队”。冯六奎，尚得胜等亦譁变，与苏八音，鄔大个儿，麻住儿等合伙成一大股约二百余人，围攻萨属之朝号村，共死男女五十七人，有二十余户房舍，悉成灰烬，尸体狼籍，光炎弥天。全村马匹财物，尽被掳掠以去，所余粮食等物，复为“不浪队”搜索净尽。八月，绥远都统商震到任后，对溃兵土匪，一时无法清除。在萨县附近，有冯六奎、尚得胜、杨二憨、李老么、辛留柱、王有元、徐文标、戴海源、小金子、张耀等数股。萨包间，群盗加毛，俨成土匪割据之绥区矣，人民痛苦，不胜言哉。八月下旬，营梓一股匪，盘据萨属淖上村，分司令

刘会文派兵围剿。十月间匪首金宝山截夺官军枪械甚多，声势特大。十一月下旬，奉军入绥，骑兵旅长马占山，与一路警备队司令刘会文配合剿匪。此后归、萨、托一带，匪渐敛迹，地方始告平静。

民国十六年二月间，有甘肃阎西军匪股八九十人，原名占海，时在萨县各乡掠财擄人，惨用非刑，因勒索毙命者极多，后经陈得胜招致，嗾使其伙内金牙王暗杀占海，余众逃甘肃。七月有袁占标匪股六七十人，在萨县四区擄掠，缸房营天主教堂樊王二神甫，率民团二十余人追击，被匪包围，二神父遭害，并死民团兵十人。

民国十七年春，三十一军由山西边境退却来绥，收编不少匪军，所到之处，民苦不堪，动以无餉为词，勒派巨款，或先携掠钱财，继而搜刮粮食。郭秃子搜大岱村民粮七八百石，余如徐文标在萨县，皆肆意蹂躏，全境几无一处干净土，以致商停于市，农辍于野，妇女稍具姿色者，亦难幸免。计三十一军蹂躏达五月之久，地方民穷财尽，十室九空，入秋以后，又逢旱灾，则卖妻卖子，饿殍遍地。本年六月奉军东退，晋军来绥接防，收编之匪首，如赵半吊子、郭秃子、戴海源、徐文标等，又蠢蠢欲动，未几小股之匪，百十为群，接踵而起，各率匪伙在萨、归和各县境抢掠。十一月初，黄河冰结，赵半吊匪伙一千五六百人，由五原聚集，兼程东窜，晋军骑兵师长郭凤山跟踪追剿，匪徒沿途杀人放火，奸淫抢掠，惨不可言。当时萨县民生渠开工，千百难民，方在土合气地方集合作工，匪之前股窜至，擄去组长三人，枪毙王善人一人，食米尽被夺去，全工停顿。大股匪继与小股匪合伙，约在二千余人，有枪械者居十之九焉。赵匪声言攻打托县，窜至萨属大岱村，即据为大本

营，附近居民，俱逃善岱镇避之。旋匪至镇围攻，被击毙八九人，迁怒于善岱镇人民，击死十一人，纵火焚二十余户，居民家破人亡之惨象笔难罄述。而妇女被祸尤酷。盘据三昼夜，黑马队团长苏占元援至，匪始退走，窜扰归、和一带，全绥骚然。山西省长阎锡山委赵承绶为绥远剿匪司令，拨给冲锋枪及汽车四辆。匪大肆遭扰归、和境内，所至掳掠人民，备极惨毒，用烧红铁通条，贯入人耳，名曰：“打电话”。又用铁镢烧红，令人裸体坐之，名曰：“坐火车”，众匪围睹。辄令妇女裸体仰卧，以为宝毡，赌之胜者，妇即归其奸宿，或有贞烈抗拒者，即以沸油灌入各窍立毙，诸如此类，不可胜计焉。匪旋由归、和窜扰萨、托仍以大岱村为根据地，匪首戴海源则出入伙内，接济子弹，通告消息。盘据十余日，师长郭凤山率骑兵数团，乘夜围攻，匪早侦悉，比官军到达，匪众已远扬无踪。此次仅大岱一村死于匪者三十二人，伤者八九十人，惊吓痴呆疯者，皆成残废。

民国十八年七月间，有周昌旺匪伙三十余人，在萨境内扰害，同时由山后窜来杨老九、翟黑青一股四五十人，在归、萨境内滋扰。后翟黑青为村民所杀，杨老九逃后劫路时为行人击毙。

民国十九年二月，萨县东南乡伏有大小匪伙六七股，约三百人。把头有高不浪、松圪截、高有光、鄂四儿、李大脚板、杨三秃、周昌旺等。旋窜至北西河堰村，村内驻有第五区保卫团一棚，匪以垂涎枪械，合力围攻。什长李治安，伍长张大德督率团丁，竭力抵抗。相持达四时之久，团丁力尽，匪复四面举火，延烧渐近，团丁六人阵亡，什长、伍长知不能敌，遂各行枪自戕，尸体皆成灰烬，居民伤亡八九人，全村残破。是月

下旬，萨、托、归、和各地竟成土匪骚乱区域，人民纷逃城镇，各村牲畜粮草，匪劫如洗。后汤猴小匪伙一千余人由陶林县窜来，经过萨、归、包、武直窜五原。未几，攻破萨属朝号村，抢掠区团枪械，损失财物无数，居民负伤者五十余人。胡双双匪伙又攻破哈紫村，区团枪械，亦均被掠去，并包围全村居民欲逃不得，挨户奸淫抢掠，盘据三昼夜，居民五百户无幸免者。匪始舍而西去，行至萨属东大社二里半村，民团抗拒，因无援应，卒为匪人所败，死什长一人，团丁二人，居民死者二十一人，全村墟墟，尸体狼籍，妇女多被轮奸致死，或奸后辄以一弹了其生命，惨至极矣。

民国廿年春，萨属之任三窑村，天主教堂在焉。筑有围堡，防御甚固，历年以来，未遭匪祸。教民遂满仓，萨之巨富，为匪人久所垂涎，满仓有侄毛圪染，无赖子也，与匪首毛岱王勾通内应。匪众三四十人于一月八日夜遂引入宅内，抢掠财物、马匹、枪械约值三万余元，并死其媳一人，满仓亦身受重伤，旋死于医院。毛圪染见巨祸酿成，随众出走为匪，遗其妻及幼子二人于家，满仓痛愤之余，竟喉令家人用草刀断其首，以泄恨妇孺无辜，遭此惨祸，是亦不人道极矣。一月下旬，驻萨陆军第十四旅，在民生渠南购有地亩，连长率兵赴地所丈量，适匪首高有光、邬四儿、死气王等三四十人，在陈家葫芦头村潜伏，匪乘官军不备，猛冲而至，连长杜避入支渠内，开枪毙匪三人，欲再射击，而兵匪交混，抵御不及，仓卒被害，并死士兵三人，掠夺枪械子弹甚多。二月，匪首马垮子一股二百余人，枪马齐全，由五原窜来，初二日，攻破萨属高金窑村，抢民团枪六支及马匹财物，掳去男二十余人，以逼索赎款，惨用非刑，被掳男女多成残废，并沿村送信，索款多者

万元，少者五六百元，信内皆书有如不早送，杀人放火，鸡犬不留等字样。大岱村索要烟土一千斤，因数巨难集，枪毙居民李姓二人，其余村庄，因送款稍迟，横遭杀害者甚多。

民国廿一年，四月，萨县政府，捕获包庇窝藏土匪惯犯史祺，（史祺萨县人），讯明正法。习与地痞土棍勾结，后遂阴通亡命匪徒、藉图自利，与巨匪李大脚板为联盟弟兄。李匪与周昌旺骚扰绥西时，凡掳劫勒索，多由祺谋划，事后居间关说，放赉男女，亦多窝藏其家，赎票议价，率经祺手，通匪之名全县皆知。其他如赵半吊子，陈得胜、贾三元、刘米换，烂头王、石榴柱、倪根双等，皆常与史祺往来。是年春，村民任德庆控祺，李大脚板之妻李杜氏，且向县府控祺与夫朋比为匪，接济子弹，擄人分贖。今其夫已死，祺尽背盟弃约，率众乡民劫财霸占房物，逼使改嫁。县府迭经查访罪证确凿，密令总团董某将祺逮捕，供证不讳，于四月一日验明正身执行枪决。

数十年内萨县之匪患无日不有匪，无匪不骚扰，故民生凋敝，人心惶惶，鸡犬不宁，匪之为害甚矣。

（本文节选自王永光同志撰写《土右旗灾异志》部分资料文字有改动，题目由编者所加）

萨县匪情点滴

葛子英

自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芦占魁匪徒洗劫萨拉齐后，继之而来的是军阀混战，尤其是“国民军”的失败，给一些不法分子造下可乘之机，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军队枪枝。因此地方土匪愈演愈多，积聚成林，致使农村破产，民不聊生。

此时冯玉祥将军已率军西去；“奉军”也回东北；阎锡山的晋军又卷土重来，绥远省仍为阎锡山所属。为了肃清绥远匪患，阎锡山特派得力将领赵承绶任命为绥远省剿匪总司令，并建立了两支骑兵部队。一为黄马队，一为黑马队，这是按马的毛色而定名。这两支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力量，以剿抚并用的方针，分头截击堵剿，小股土匪逐渐瓦解，对大股土匪进行招降，地方人称“收服”。如徐文彪，苏雨生、王圆挠等。王曾率众流窜陕北神木一带地区，并抢得一名叫胡玉卿的美女为妻。徐文彪部暂住萨拉齐；苏雨生部驻丰镇县城，在该部所在地，抢却案件时有发生。经查均系苏部所为，同时为防范苏雨生转变。以被汰旧部为名，指令被裁人员各归原籍，安心生产。所乘之车均系铁门车，按地域分坐。在萨拉齐车站停车后，把车内所坐五十多名左右士兵，按名册逐个点名，点一名

由驻萨陆军捆绑一名，随即押赴车站东南进行逐个枪决。最后将尸体一起掩埋。王圆挠曾在包头驻扎，也自封为旅长，之后因仍旧为非作歹，不久部队遣散，王亦被捕处决。

徐文彪自“收服”后，即驻萨拉齐县城内和附近的大村庄。他们本来是匪性未改，白天穿上军装堂而皇之，似乎是个军人，夜间暗中仍做抢劫勾当。他们更别出心裁处理一切民间纠纷，所谓判处也无非是以“礼”而定，谁输谁赢的问题，这就是看谁的财物、烟土多寡而论。也就是“礼重”的有“理”。旅长自命不凡他是“青天大老爷”，老百姓说他是贼性未改的“徐阴天”。

徐文彪的马弁刘二挠，系徐文彪的亲外甥，他依仗其舅之淫威，骗取一门亲事，竟和一个十四岁的少女强行订亲。在举行婚礼时，备用的五乘花轿，鼓乐喧天；全副武装的对子马双双在前，并有若干面大旗在前领路。为了求得徐旅长的欢心，得到旅长大人的“荫庇”城内各商号，地方大户，以及各机关团体，都前往孝敬贺仪，送礼的络绎不绝，收礼的帐房先生应接不暇。参加喜宴的一般人都不敢赴宴，只是徐文彪部下的一伙而已。

徐文彪的马弁刘二挠，身扎武装带，背挎匣子枪，骑着红马。他为炫耀自己，经常跨马在大街“亮马”驰骋。街上的行人不是被碰倒而受伤，就是被马踩死。死者只能自认为“倒霉”，不敢申诉，又有谁来和他较量高底。同时在夜晚勾结同伙继续抢劫良民，他们的好景是不会常的，徐文彪所部也同样是裁汰对象，不久冰消瓦解。刘二挠因恶贯满盈，就地伏法。当在绑赴刑场时，刘二挠还哭喊着“舅舅我怎呀！……”的哀嚎。这也是为虎作伥，作恶多端者的下场。

成股土匪中有杨猴小、赵半吊等，在晋军进剿中，仍到处流窜抢劫。赵半吊在围剿中被俘，当场斩首，以示顽匪。当年正月十五在东大社（今旗总工会门前）唱戏时悬首示众。杨猴小也被击毙，铲除了地方的一颗祸苗，到一九二九年社会稍有平静，人们始能安心生产，生活比较稳定，多年匪患初告平息。

萨拉齐的传统庙会

李巨才

萨县城是塞外较早的古镇，庙宇较多。旧社会人民迷信思想严重，有庙必须演戏敬神，形成了传统的庙会。演戏名为酬神，实际起到世人消遣娱乐的作用。

萨拉齐庙多，因此平均每月都有戏唱。这些不同日期的庙会，由各社负责筹办，承担一切花费。社是以行业和外省（市）来萨拉齐临时居住而有职业的人分别组成，各社有会首，会首多数是由商号轮流担任。这种庙会，始于清朝，延至一九三七年（民国二十六年）日伪侵占后停止活动。在日伪投降后，又恢复了四月十八日的奶奶庙会和六月廿四日沟门的庙会，其它社戏均未恢复。

兹将庙会的日期（均指农历）、社名、地址、属哪行业主办，叙述如下：

正月初二的灯油社。在关帝庙举办（俗称老爷庙，在现在的医药公司院内），戏台在大路南边，戏场宽大，可容六、七千人。轮流当会首。会的规模不大，因为时间正是走亲串友拜年之际，所以观者也不多。

正月十五日东西两大社同时举办庙会，形成唱对台戏的局面。东、西两社是以城中心十字大街南北为界。路东为东大社，路西为西大社，两社各在自己地段唱戏红活。赶会人越界东观西看，两会又自然连在一起。东大社在木质三官庙前（现在的工会大楼前）搭临时台演戏。西大社在西门里财神庙赶会，台上唱戏。两社都想落个好名，办会过程相互竞争，不惜出钱争写好戏。戏好受人欢迎，季节亦宜适（正是农商均闲时候），又有正月十五观灯的习惯，所以镇内、镇郊赶会的人整天川流不息，热闹至极。庙会的经费均由东西两社各负其责。

二月十九恒山社。地址在观音庙，清真寺前北侧，属软山货行主办。软山货就是现在经营副食品及糖业烟酒类等。这个庙会规模算平常。

四月初一明德马王社。在关帝庙演戏，主办者是粮店、面铺，即称粮面行，这次庙会也属一般。

四月十八的圣母社。俗称奶奶庙，原庙址在现水泵厂西院。这个庙会迷信色彩相当严重。迷信传说奶奶是给人民送儿女和保护儿童的神。到会者多数都端一碗麻油，给奶奶点灯用，一束黄香，几张黄表，到神前磕头敬神，还要给些钱作为布施，主持和尚给一束五色线，接收入再给和尚一些钱，拿上和尚给的一束五色线回去给孩子带上，说是可以消灾免难。这样做的人多数是以妇女为主，男人也有之。每年庙会送的麻油就有两

大瓮、钱几百元。因为节令气候宜人，不仅镇内居民，城郊的农民也进城赶会，是庙会中最红活的一次会。

五月初五忻定社（属忻州定襄人），是轮流担任会首，不是忻定帮子的商号不当。这次庙会规模最大，开支最多。社戏亦在关帝庙演出五天，记布施的金额由大会之首根据大会支出多少研究决定柜上（商号）、经理、财东（不是忻定财主不负担）、顶生意的、挣工资的各负担多少。此款，通知所属商号，自行写成花名列在大红纸上，张贴庙院内，最后合计，连同现款在大会的头一天必须送到。布施情况举一九三一年为例：柜上三元、财东二元、经理一元、顶生意的三角、挣工资的一角（都交的是银元）。萨县商号中忻州定襄人居绝大多数，商号约有一百多家，所收布施的数额可想而知。庙会开支会首不摊赔头。节余金额不分掉，吃喝花尽才结束庙会。从庙会前几天会首们及住庙的和尚们和跑庙的共几十人，早上四和圆吃稍美，中午中义元下馆子，晚上自备喝酒。每年都是如此，所以说忻定社最肥。每年给和尚的钱，这钱，那钱就有几十元，因为出布施的人众。所以也没有人提过改进。

每年六月二十四日，沟门庙湾村赶一次传统庙会，是萨拉齐七圣社主办的。沟门村早在附近城乡享有瓜果园地、山水风景优美的盛名。萨拉齐商号来这里举办庙会，无疑是活跃城乡、增加人民快乐的理想地方。城乡人民对这次庙会很器重。就近农民放下农活，市民不去劳动，商人放假，轮流都要去赶会。凡驻萨拉齐的外地客人大部分要前去一游。呼、包部分客人也专程来观赏。庙会整天人山人海川流不息。有的看戏，有的游山玩水和观赏风景。城里的大字号还得去庙内用炖羊肉火锅子招待客人，为数很多，较为排场。庙会经费，除从会场摆

摊商贩收取一部分布施外，不足部分由会首均摊，会首是城里商号轮流担任。

欢乐的庙会也给沟门人民带来些麻烦，如亲戚吃住、游人践踏农田、攀折果木树，但是从未听说过有反对庙会的意见。解放后还举行过几次，以交流会为宗旨举办，凡参加过的人，都有一定体会吧。

七月初一文殊社。地址在关帝庙。因为文殊菩萨神像在朝阳洞，会前从洞中请回城内，会后再送回洞中，赶会群众对演戏兴趣不大，主要看请神。请神将所有空驾摆齐，每人举一件，排例成行，相当于帝后出宫威风，通街绕行，鼓乐喧天，较为奇观。

七月十八官坝社。地址在铁路北边，有一个龙王庙，每年搭台演戏，这时正是瓜果成熟季节，会上摆的瓜果种类及数量均多，随意选购品尝，故称“瓜皮会”。此时正好又是农闲空隙，赶会者较多。主办庙会亦是商号轮当会首，同沟门庙会一样，也能向摊贩收一部分布施，不足者由会首分摊赔头，这次庙会也较红活。

八月十五中秋社。地址在玉皇街（现农机厂），由商号轮担会首，有时不唱戏，只作摆供祭祀。会期正在农忙时，庙会不红活。

九月初九牛棚社。地址在牛棚庙（现监狱东边），属农民主办，演戏三天，无特殊招人的节目，庙会平常。

十月初一城隍社。地址在现地毯厂院内，虽有时也演戏，但气候进入寒冷季节，而且庙内塑像及廊房内壁上画的阴司公案，看了使人害怕，胆小者不敢进去看，所以庙会也平常。

还有几个社在民国三十年代就不举办了，如祁太社、翠金

社等，因钱、当两行全数倒塌，祁县太谷人离开萨地。所以社戏亦就无形中就停止了。为什么萨拉齐庙会如此之多，又相传多年呢？因为那时既无剧场更无影院，群众无娱乐场所，所以借庙会娱乐消遣一番，也是一个主要原因，同时各行各业借举办庙会期间多做些买卖也是一个原因。笔者早从民国三十一年来萨的，其中情况大部是以三十一年前后情况为题材的。

美岱召村名更改始末

张静安

土默特右旗美岱召乡和美岱召村的称谓永远与塞外名刹“美岱召”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即村以“召”名之。这座召和村的称谓直到1954年10月16日之前，一直叫作“麦达召”，根本没有“麦达力召”和所谓俗称“美岱召”之说，而“美岱召”的正式命名和运用，是1954年10月12~16日在萨拉齐镇召开的萨拉齐县首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根据蒙汉族县人民代表的强烈要求，根据中央人民政府1951年5月发布的“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精神。大会正式通过决议，将带有侮辱少数民族的“麦达召”改名为“美岱召”的，从此，该召和该村才正式使用现名“美岱召”的，绝不是一些撰写有关美岱召的作者或学者任意推断来的“俗称美岱召的”。

作为地名称“麦达召”的有以下三例可证：

1、有民国二年（1913年）麦达召水碑碑文：

信 訃

察北执法营务处执法官呼延

会审委员

土默特护司佐领 纳

萨拉齐县知事 王

发给印谕以资遵守事，本委员会同本知事奉委员会审波罗营李延潘等买麦达召白露后五天水份，因开渠涉讼一案……特谕

县行 苏波罗盖

右谕给 麦达召村

准此

东老藏营

中华民国二年五月捌日

（摘自《土默特右旗资料》第四辑167~168页、作者金申）。

2、民国十二年（1923年）通车的京包铁路麦达召站的站名，在该站票房顶上凸字楷书“麦达召站”，直至解放后扩修该站票房时才去掉。亦改为“美岱召站”。上年纪者和该乡人都可证明。

3、《萨拉齐县志》所列乡村名称即为麦达召。

塞外名刹“美岱召”始建于明万历年间，至今已达四百多年，是一座气势宏伟，颇具特色的城堡式古建筑，特因其既是一座召庙，又是蒙古族首领阿拉坦汗和三娘子曾经居住的宅邸，所以其建筑风格异于其它召庙，更以其背靠大青山，召内青松翠柏的映衬，使其更展雄姿，引人入胜。确为包头地区一

大旅游胜地。因而从她对外开放以来，每年有大批中外游人拥来，尤其春夏秋三季每日游人不绝，也因此而名扬中外，并引起不少中外专家学者的重视和研究兴趣。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前书记周惠，现任书记张曙光，自治区主席布赫，自治区副主席、中共包头市委书记张灿公、市长乌杰和其他党政领导及旗的党政领导都曾前往参观，出席纪念斯诺诞辰八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的国际友人斯诺夫人、路易·艾黎、魏璐诗、韩丁等一行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三S”（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研究会会长黄华和《经济日报》、《内蒙古日报》等报刊的总编和记者等；数度来萨拉齐的日本朋友；全国政协的领导和部分工作人员及随时前来的外国人都参观过此召。

这座古建筑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未幸免。大雄宝殿和其它建筑都被“造反派”造了反，许多宝贵的佛像、经典、佛物等文物荡然无存。部分殿宇和角楼均遭不同程度的破坏，特别是太后殿曾掘地数尺，把深埋的檀雕骨灰塔起出扔掉，幸存者有数络长发和数把锈蚀的宝剑，现存于该召文物陈列室，使观瞻者有幸得见实物，不虚之行，被造反后的美岱召，辟为国家战备粮库，召院内广植果杏等树，成为美岱召大队的一座果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党的各项政策的落实，国家粮库和大队果园先后迁出，美岱召作为历史文物古迹，由包头市文管所接管，并由内蒙和包头市拨出专款进行维修，经过几年的艰苦施工，现已修葺一新，基本上恢复了原貌，大雄宝殿内虽未再塑佛像和其它佛物陈设，但全幅壁画有幸保存下来。从这些可贵的原始壁画中展示出阿拉坦汗和三娘子及其家

属的活动史实，以及美岱召的部分由来和释迦牟尼的佛事故事等，这对中外学者研究阿拉坦汗、三娘子等和美岱召的历史探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986年，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美岱召为自治区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为了更进一步说明“美岱召”不是“麦达召”的俗称，现抄录几位撰写美岱召历史的文章以资对照。

一、《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志·包头分册》文物古迹部分“美岱召”条是这样写的：“关于（美岱召）它的名称，据方孔昭《全边记略》载，万历三年（1575年）明廷赐俺答城曰“福化”、“福化城”可能是它的初名（另说建成于万历八年），从城寺遗存的唯一文字实物——城门上镶嵌的石匾记载中得知，它的原名叫“灵觉寺”，清代更名为“寿灵寺”，而美岱召得名则因麦达力活佛在此坐床的缘故，人们便俗称灵觉寺为麦达力召、美岱召。

二、1986年《包头年鉴》第368页载：“美岱召”原名灵觉寺，清代更名寿灵寺，由于西藏迈达里·胡图克图喇嘛来寺坐床掌教，故俗称麦达召或美岱召，沿习至今。

三、《土默特右旗史料》第五辑第123页载包头市文管所金申同志写的“美岱召”一文的一大段话是这样写的：“美岱召”的得名，实因麦达力活佛在此坐床的缘故。他接着写道：万历十一年（1583年）三世达赖锁南坚错（阿拉坦汗在恰卜齐勒赠给锁南坚错“达赖”称号，锁南坚错自称三世，而将前二世活佛追认为一世和二世达赖）到达蒙古时，阿拉坦汗已逝去三年，不久，锁南坚错亦逝于蒙古。为了使黄教在蒙古地区得以更加广泛的传播，西藏僧界便将阿拉坦汗的孙子苏木尔台

吉之子云丹嘉木错认为三世达赖的转生，为达赖四世，他是历代达赖喇嘛中唯一的一位蒙古人。万历三十年（1602年）十四岁的达赖喇嘛应西藏僧界之请，回西藏哲蚌寺坐床，这样蒙古地区便缺少了宗教领袖。为此，西藏僧界特派麦达力活佛来蒙古掌教，因麦达力活佛在灵觉寺坐床，并为弥勒佛像主持开光仪式，人们便俗称灵觉寺为麦达力召、美岱召。

从以上三篇文章看，对西藏来僧，二称活佛，一称喇嘛，对召寺二称麦达力，一称迈 达里·胡图 克图。据《辞海》对“喇嘛”和“活佛”两条解释两种称谓是不同的。究竟哪种称谓对，请有关学者们研究，笔者因没有手头资料不敢妄说。至于召名、地名后用俗称“美岱召”之说，笔者之认为这都是作者的自我推论而已，根本不知道“美岱召”地名、村名、召名的更名之史实。

作为地名，只能根据历史和现实的法定名称来称谓，绝不能由哪几位学者或作者任意推论或解释的。推论是错误的，是违背国务院1986年元月发布的《地名管理条例》和包头市人民政府1984年12月21日“关于公布包头市标准化地名的通知”精神的。诚望有关同志在今后研究和撰写有关美岱召的文章时，应该正确地运用和解释它的过去称谓和现在称谓，切勿再以推论方式运用和解释它了，以免贻误后世，成为历史的笑柄。

不妥之处，请不吝指正。

萨县的梨园谱

宫步生

晋剧是当地民间最喜爱的主要剧种之一，它有着悠久的历史。为便于广大群众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将我所知原萨县晋剧班社发展情况和本地出生的部分演员作一简介，供读者参阅。

萨县晋剧班社发展情况

1. 丰州班：贾灿班主，于大清咸道年间成立，至光绪廿六年在萨拉齐散班。

2. 马如福娃娃班：清末成立，民国十二年散班，先后收过两届徒弟。

3. 侯潘龙娃娃班：清末成立，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和萨、托二县一带演出，民国六年散班于商都县境，著名打锣师傅寇班定随着也死在商都。

4. 明锁子娃娃班：民国十六年成立，经过四年也散班了。

5. 梁山戏班：日伪时期成立，时间不长，因班主体弱多病坚持不了，于当年十月吃了一顿散班饭也就结束了。

6. 大众剧社：在解放初期成立，演出了几年，在“文革”十年动乱时停止，演员及其他人员分别安排了工作。

著名演员

二德子：艺名北来官，是原萨县二区小鄂尔格沁村（现属包头市郊区）人。出生于清道光年间。是早期出名的演员之一。他是个“下海”演员（即票友，后来成了专业戏曲工作者），曾在萨县贾灿的德盛班演出。由于他谦恭好学、刻苦钻研表演艺术高超，所扮演的不同角色，都能个个逼真传神。加之他唱腔高亢有力，因而曾被观众誉称为气死南来官。如：扮演《坐曹营》中的徐庶，其风格深沉，含蓄细腻，感情动人。

王月霞祖籍山西，定居于萨拉齐。她自幼在大同学艺，艺名筱月仙。专工青衣，也擅长花旦、生角，戏的路子很宽，成为当时坤角名流。她在艺术上勇于探索，表演深沉、真挚、追求含蓄，讲究节制，善于表现古代女性贤淑、温柔、多情而良善的性格，而且嗓音宽厚、宏亮激越、吐字清晰，运腔刚健，功力宽裕。如扮秦香莲、王宝钏、白蛇、沈后等角色，演技刚柔并济，富有艺术感染力。所以，在山西雁北，河北张家口和内蒙的锡盟、巴盟、呼包二市等地区的人民中享和盛誉。可惜她年高体弱，已退休欢度晚年。

二后生，萨县人，自幼在北只图村明锁子娃娃班学艺、专工二花脸，后因倒仓、嗓音变哑，改工武花脸，武功坚硬，做戏好，他的《斩彥良》、《访白袍》两出戏最拿手。后来去了固阳晋剧团、伊盟达旗晋剧团，现已年近七十岁了，退休欢度晚年。

二娃生。生于民国初年，萨拉齐人，在明锁子娃娃班领教、兼演员。解放后在萨县大众剧社工作。唱生起家，是五月

仙过门弟子，曾在张家口一带演出。经常请教于张玉玺老板。四功（唱、念、做、打）样样过硬，他演的《卖水》、《打黄盖》、《黄鹤楼》等生角戏，别致优越。他在艺史上跻身强林之中，但是，不幸因病在伊盟去世。

狮子黑，本名叫张玉玺，乳名拴拴。从小在马如福娃娃班学戏，是萨县北只图村人。生于光绪年间，年轻时代一直在山西雁北，忻州地区和张家口一带演戏。四功结实，五法醇厚，别具一格，进京演出后享有“花脸大王”、“活祖师爷”之称。晋剧传统剧目中的花脸戏他都会，人称：比祖师多三出。《抱烙柱》、《罢州》、《取洛阳》、《鸡架山》、《八义图》《泰山图》等都是他的拿手戏。表演出色，嗓音宏亮、圆润、清脆、高亢（声如狮吼特色故艺名称狮子黑）。文武兼备、朴实自然，在晋剧花脸中独创一家。凡家乡萨县请他回来演戏，无论远近，他必设法如期带剧班归来献演，以报家乡对他的养育培植之恩，报酬不计薄厚。并且也到包头，他的表演艺术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过门于旗杆黑门下，结义弟子高旺黑、小狮子黑（张庆云）公玉昌三名高徒。专长出众。强立于艺林之中，张玉玺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毒打迫害，于1942年病死在张家口。

公玉昌，生于民国初年，萨拉齐人，后在张家口堡子里定居。他先在候潘龙末班学徒，后投奔于张玉玺门下，专工二花脸角色，酷爱武术，一手好梅花枪，为他唱武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的启蒙戏《看兵书》就是张老板亲授。又经马武黑过门，《斩单通》中的单通演的出色动人，显露了表演艺术才华。1954年曾到了固阳县晋剧团任艺术指导，他演的《李闯王》给广大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特点是：表现自然，

善于钻研思考，总结经验，修正创新。

铜匠黑，出生于宣统年间，萨拉齐“下海”演员，是保文黑的过门徒弟，眼神最好，也是艺术上的灵魂。通晓了几十个传统剧目。舞台艺术形象较为真实，受到群众好评。他主演《明公断》、《捉放曹》、《忠保国》等，在萨包一带很有名气。

生铁旦，萨县人，生于清末年间，青年时爱好文艺，弃祖传的铁业，从事晋剧专业，正工青衣，唱腔婉转，声情并茂，激发了女主人内外心绪，具有艺术魅力。他演出的《秦香莲》、《走雪山》、《粉河湾》、《打高门》等戏，颇受群众欢迎。在民国二十一年，死于鼠疫病。

玉马儿，萨拉齐人，出生于清宣统元年，票友出身，专工老旦。他演的余太君，《火焰驹》的老旦。《捡柴》中的乳娘，稳重大方，台词精练，唱词无误，尺寸整齐，富有老年女性风度，后来她到了包头的西北剧社，给名演员王玉山（水上飘）搭戏。

徐文科，萨拉齐人，自幼爱好晋剧，中年时期从业戏曲，专工丑角，他的潇洒自如表演，曾评为半路出家的好演员。他的特点：戏路子宽，红黑生旦的戏都有。后来他到了固阳晋剧团一边演出，一边教戏，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颇有表演才能。

张富裕，艺名叫二体儿，出生于民国十一年，萨拉齐人，从小酷爱文艺，也是萨县少数民族演员（回民）。专工花脸，嗓音宏亮。满口小狮子黑的乱弹。模仿性强，戏路也很宽，能演大、能演小，严肃认真，感情饱满，并拜八百黑（张树亭）为师，他演出的《劈殿》、《访白袍》很有特色。一九五六年

在集宁市晋剧团任花脸演员。1986年病逝。

苗全全，晋剧音乐演奏家，出生于光绪十八年。从小专工司鼓，拜五圪旦为师，曾在京包线上许多班社中司鼓。对晋剧音乐规律掌握纯熟，司鼓技艺精湛，指挥若定，操作自如，功夫过硬，记忆好。精熟于所有的传统剧目。眼力好，无论生旦净末丑那家表演，一看就中；耳音好，凡是演员哼一声，他即听的清悦。那手弦不应，都能分辨清楚。六十岁开门收徒（他的门徒富步生继承了他的司鼓事业，成名晋剧界。现是中国戏剧家协会内蒙分会会员）。人称全老板。一九五五年苗全全同志因病逝世在固阳县晋剧团，全团六十四人为他带孝送葬。

其次，还有张润，顾秀成、马威、梁天义、许林宽、沈义、周老旦等三十四名从小爱好晋剧。也是登台表演的业余演员。

阎锁，出生于清末宣统年间，萨拉齐人，从小爱好戏剧场面，后来专工晋剧司鼓，也是下海票友，五一年参加萨拉齐大众剧社，曾给小全全（苗全全）打过下手，司鼓能力也不错，五七年内蒙戏曲会演《出沁阳》这出会演剧目，就是他的司鼓，受到同行们的好评。

以上名流们，虽然是亲闻、亲见。但由于水平有限，错误难免，望读者校正。

李海龙传

史银堂

(一)

李海龙，1888年生，原籍陕西省府谷县鸡家畔村。清末，其父难以忍受顶差监禁之苦，在一个春节除夕夜，携妻带子逃来塞外，先在土默川的八分子村落脚，后到大青山二架子的耳沁窑定居。

李海龙少年时读过私塾，能看懂历史演义和武侠小说，性格凶顽好斗，笃信封建迷信，喜欢接近算卦、相面、观星宿、看风水之类人物。一个走江湖的术士了解到李海龙这一怪癖后，为了骗取李海龙的钱财，就执意对李海龙说：巴总窑子附近的红石峡风水很好，如果把祖宗的坟墓迁到那里，定能出真龙天子！并说李海龙的相貌、八字和浑身骨节都高贵非凡，正应了“十八子，主神器”的谶语。李海龙听后信以为真，果然把祖坟迁到红石峡下，将李海龙的“龙”字改写成“麟”字，开始做起皇帝梦来。

李海龙的青年时期，正值军阀混战，土匪蜂起。大青山的二架子一带，山高林密，地形险恶，是土匪经常出没和隐蔽的地方。李海龙十八岁那年，一伙土匪深更半夜闯入他家，抢走东西不说，还用棍棒打伤了他母亲的脚。从此李海龙下定决心，组织武装，保卫家园。不久，有个叫白白的土匪头子被萨县保安团打伤后到三分乡养伤。李海龙得到这个消息就去厂沁

村找火枪队的苏三，一本正经地说：“白白说是你引上萨县保安团打伤他的，他扬言养好伤后首先要干掉你！俗话说‘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你与其坐在家等死，何不趁他养伤之际灭掉这个祸根呢？”苏三信以为真，立即集合火枪队连夜包围了三分乡。他们采取引蛇出洞的计策把白白引入伏击圈，一个火枪队员正点火射击时被白白发现，白白端起快枪照着火光“砰”的一声，打在划火队员的手上。白白接着喊：“弟兄们让一条路；不然以后定叫你们鸡犬不留！”火枪队员们看见人家拿的快枪，害怕再吃亏，就自动解散了。白白趁机向西山逃遁。

李海龙怕打蛇不死反为仇，又连夜去厂沁村找到苏三，说明这次失败的前因后果与利害关系。苏三被说服了，又连夜集合火枪队去追击白白，追到绍卜亥村，打听到白白正在一个放羊人家里睡觉。李海龙身先士卒，带着火枪队迅速闯进去将白白活捉，并剥净衣服，大卸八块，结果了白白的性命。

当地一位说大事了小事的老者——刘才，知道了李海龙他们打死土匪得到一枝快枪的事，就和李海龙相跟上去五原，见了董大人李海龙禀报说：“大人，我们是后山二架子的居民，为保人民安宁，打死了土匪，得到一支快枪，特给大人送来！”

董大人听后有些不解地问：“你们黎民百姓，是怎么打死土匪的？”

老刘才听了不禁一怔，心里有些畏惧，嘴里答不上话来。这时李海龙却从容镇定地叙述了消灭土匪的经过。董大人听后脸上露出了笑容，高兴地问李海龙：“你今年多大年纪？”

“一十八岁”李海龙脱口而出。

“是你打死土匪的吗？”

“是。”

“好样的！你把那枝枪拿回去吧！”

老刘才害怕因此土匪联合起来闹事，用手揪了揪李海龙的衣角，示意不要拿。李海龙却喜不自禁地抢前恳切地提出：“要让我们拿，就请大人再多给些！”

“好，再给你们四枝快枪！”董大人痛快地答应了。

“谢大人！”李海龙乐滋滋地拿上枪枝弹药迅速赶回耳沁窑。

不久，绥远都统马福祥派一个姓马的营长，率领二百多骑兵到后山剿匪。马营长听说李海龙打土匪勇敢就让他给带路。队伍走到固阳卜塔亥村附近与土匪遭遇。李海龙发现一个土匪正要瞄准马营长开枪，就奋不顾身地猛扑过去将这个土匪拦腰抱住，救了马营长。马营长对此感恩不尽，临走又给李海龙留下五、六枝步枪。

国民党地方政府知道李海龙有了枪枝，就责成李海龙组织成立了三帮团（系萨县、包头、五原三县边区的自卫武装组织），李海龙为团长，李海龙的哥哥李海云为副团长，李海龙的本家亲戚分别担任连排长。给士兵规定的纪律是：一、服从命令不怕死；二、戒酒除花（指不准调戏和奸淫妇女）；三、不准聚赌、刁人；四、不准欺压良民百姓；五、不准吸食大烟；六、不准随意占用百姓的土地。违者处以坐禁闭、打军棍、直至开除。三帮团每吸收一名新兵或提拔一名军官，均由李海龙一家研究决定。所有士兵战时打仗，闲时无代价地给李海龙家劳动，而部队的一切费用均向地方百姓摊派。此外，李海龙还雇了十几个长工专门给他种地做营生。藉此，李海龙很快便发展成为耳沁窑一带发号施令、为所欲为、称霸一方的

“坐山虎”

(二)

三帮团成立不久，包头广恒西的大财主马卜子被土匪请了“财神”，马的家属上门请求李海龙设法营救，李海龙答应后带领二百多人装扮成土匪模样火速赶到土匪驻地，把十多名土匪的枪全部下了，用棉花塞住嘴，锁在家里，救出了马卜子。

马卜子被救出后，对李海龙千恩万谢，感激不尽，要送很多银钱，李海龙谢绝说：“我救你不是为了你的银钱；如果你过意不去就给我传传名好了。”马卜子会意后，改变了送银钱的做法，给李海龙的每个士兵赠送了景泰兰马鞭子一个，灰绒马靴、毡袜各一双；给李海龙赠送了万民伞（仿皇帝的用伞而特制的）一把，然后又在萨拉齐城内摆银供、请乐队，举行了非常隆重的庆贺仪式，一时轰动全城，传遍了四乡。

当时驻守萨拉齐的绥远骑兵三团团团长侯斌成对此异常嫉妒和恼火，扬言：“三帮团才建立几天，李海龙就有了这么大的威风，比我这个团长的威望还高，这还了得！”他想寻找机会进行打击报复。

这一年，大青山一带广种大烟，李海龙也种了不少，在大烟将要成熟的时候，侯斌成就以禁烟为名，带领人马到李海龙的大烟地里用棍棒乱打，将大烟苗全部毁掉。但李海龙在暗处还有几十亩大烟未被发现，收割完后，保管员李二红偷偷地把新割下的大烟全部背到侯斌成那里，并告李海龙有私立三帮团，日放青苗、夜请财神等罪行。

侯斌成抓住这点，就派兵去攻打李海龙。李海龙得到消息后毫不介意，满不在乎地对人们说：“我李海龙归的是五原，

你姓侯的管的是萨县，我李海龙扣下一只鞋，你姓侯的也不敢翻！”果然，第二天中午，固阳、包头、萨县的好几个区兵队将李海龙三帮团驻地团团围困。一个区兵队队长进入李海龙家里。李海龙正在下象棋，冷理凉情不好好招待。区兵队长非常恼火，立即下令将李海龙捆起来。李海龙问：“你们为什么捆我？”

“上级有令，把你带回萨拉齐再说！”区兵队长回答的口气很硬。就在这时，突然从窗子上伸进一枝步枪，“啪啪啪……”连打四五枪，李海龙未被命中，却把一个叫花牛子的区兵当场击毙了。临走时，将李海云也捆了起来，和李海龙一起用牛车拉上往萨拉齐送。李海龙不服，一路上用最难听的言词辱骂区兵队官兵。区兵队长让区兵先在地上钉了四根火柱，把李海龙的四肢拴住，然后搬起石磨扇砸断了李海龙的右腿。李海龙当场昏了过去，醒来后骂得更凶，想用激将法让区兵们给个快刑！区兵队长说：“那样，太便宜你了！”说完让四个区兵抬着李海龙向水涧沟门走去。李海龙的四弟李海德看到这种惨象，连夜去包头找人营救，他走到萨拉齐城西正巧遇上马营长部下的周连长。周连长问明情况后迅速带领全连人马赶去营救，在老窝铺村南将区兵们打散，将李海龙救出，送到包头医院治疗。一年多后，李海龙下地一走，发现这条腿成了箩圈形，而且脚也歪了。他想：腿脚成了这个样子，今后还怎么带兵打仗呢？他向医生再三请求给他把腿接好。医生说：“接是能接好的，但得有新茬子才行。”李海龙听罢，咬紧牙关，把腿伸进门框底下，“叭”的一声，自己又把腿折断了。经医生精心治疗，他的腿重新被接好了，但腿上的一块块红肿还久久不愈，他又咬紧牙关，自己用锋利的刀子将坏肉全部剔除掉，

很快又长起了好肉。

李海龙康复后，就请白灵（现呼和浩特）去告侯斌成，一连告了四年也没有告成。原因是侯斌成用贿赂买通了都统手下的人，李海龙的呈子一递上去就被这些人扣压了。后来他打听到公主府的萨其是一个专门替人写呈子打官司的先生，就亲自登门向萨其说明前情，苦苦哀求萨其帮他写告状呈子。萨其是个爱抱打不平的人，不仅为李海龙写了告状呈子，而且还教给李海龙一个亲见都统的办法。第二天，本来平时不喝酒的李海龙为了壮胆也饮了数杯，然后戴上礼帽，穿上大褂，带上银子，挂上文明棍，打扮成一个公职人员的模样，又花钱雇了一顶颇为讲究的轿子，顺利地闯进了都统府，猛击大堂鼓。都统马福祥听见大堂鼓敲响，连轿子也没顾上就急忙跑出来升堂。李海龙进了大堂一边往前爬，一边喊“冤枉”！到了都统面前将呈子递上，马都统接过呈子仔细审阅后说：“你已经告状四年之久，可你的呈子我怎么连一次也没有看到啊？”

李海龙恳切地答道：“禀告大人，我写过很多呈子，一直不见回文批示，最后迫不得已才击了大人的堂鼓，冒犯了大人的尊严，望大人宽恕。”

马都统听后点点头说：“按照本堂规矩，随便击堂鼓应重打四十大板！但念你呈子上所述之事确实冤枉，故免打你吧！你先回去听候批示吧！”随之宣布退堂。

李海龙击堂鼓告状的消息不胫而走。侯斌成听到后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宁，他不敢继续呆在萨拉齐县城，连夜把人马带上在萨托二县之间徘徊。不久，马都统以开会为名将侯斌成叫去，关押不几天就处决了。

(三)

1929年，耳沁窑一带划成固阳县六区，由李海龙招收当地农民、猎手组建了区自卫队，负责维护地方治安。

1937年“七·七”事变后，有一段时间李海龙带领的区兵队曾被编为张国林组织的“民众抗日自卫军骑兵游击师”的33团，李海龙任团长。这年十月，日寇占领了萨县，派李守信的伪蒙古军第八、九师开往固阳一带。张国林要把人马带到后套，让李海龙的人马留在大青山相机行事。一天，李海龙得知日伪军要打耳沁窑子，便带领人马连夜出发，到固阳下湿壕的东牛沟、石报兔一带隐蔽。他让士兵化妆成便衣，把长枪藏在山沟，把手枪带在身上分散活动。几天后怕发生意外，就又把长枪取上，白天在山上转，黑夜下山回家。坚持了几个月后，萨县伪县长丁绍先接二连三地给李海龙写信，敦促其归降日寇，保证其生命安全和财产不受损失。李海龙考虑再三，给丁绍先复信中提出了如下条件：一、属管不属调；二、不离开大青山；三、不能委派外人来领导。丁绍先看信后表示同意，就把李海龙的队伍编为日伪包头伊盟公署直辖第三警察大队，任命李海龙为队长。

1938年，随着武装的逐步扩大，李海龙先后在耳沁窑附近的山顶上和住院大门口构筑了七个碉堡；并在碉堡与碉堡之间构筑了暗道；还从屋里及院里的花池下构筑了通向山顶碉堡的暗道；还构筑了从屋里的暗道通向屋后大山里的暗室一个。竣工后，为防止消息外露，把几个石匠师傅活埋在里边。外面的人不摸底细，谣传李海龙把附近的山头全挖空了，进去就别想再出来。因此，土匪不敢轻易进山骚扰，特务汉奸也不敢在老

虎头上捉燕子。所以耳沁窑一带在八年抗战中还算风平浪静，居民们在深山中比较安定地进行生产，广种大烟，除向李海龙进贡外，不少人将茅屋、土窑翻盖成土木或砖木结构的房院，穿上了青羊皮大鞋，戴上了狐皮帽子。

(四)

1943年，后山的土匪活动猖獗。一天夜里，李海龙辖区的芦丑挠、董兰生被请了“财神”，这两家花费了许多大烟等财物也赎不出人来，他们的家属一再要求李海龙设法营救。这一年的农历正月十一，李海龙带领骑兵到后山剿匪。他们走到固阳县大庙的掌不浪沟与鄂友三部下的周贵堂连相遇，没打几枪就把周贵堂及其部下八十多人全部活捉。功夫不大，鄂友三派去援兵，双方打响后，情况万分危急，李海龙命令士兵将这些俘虏全部击毙，然后刮马一鞭，带领部下返回耳沁窑。

同年6月，鄂友三的一个旅长吕恒元，带领十几个人驻在耳沁窑附近的葫芦什太村向老百姓要大烟，老百姓交不起就吊起烤打。李海龙得知后，立即带领人马将他们包围、缴械，把吕恒元押到永合太村山口子枪决，其余官兵在返回的路上也逐个处决。从此，鄂友三与李海龙结下了深仇大恨。

一次，鄂友三亲自带领重兵包围了耳沁窑，开始采用猛打猛冲的战术进行强攻，但李海龙凭借有利地形和坚固的工事进行自卫，鄂友三始终攻不进去。鄂友三看着强攻不行，就拉长战线进行长时间的围困。围困了一段时间后又派手下与李海龙关系较好的团长魏吉可去劝说李海龙投降。

李海龙见了魏吉可便直截了当地说：“公事是公事，交情是交情。我们现在两家正在交战，你是来者不善，善者不

来！”说着把脸一沉，招呼道：“来人，给我把他捆起来！”这时几个护兵一拥而上，将魏吉可捆了个结结实实。李海龙、严肃地命令魏吉可：“魏团长，你现在就立即给鄂友三写信，让他赶快撤兵！不然我就将你枪毙！”

魏吉可深知李海龙一向心狠手辣，能说得出就能做得出来！为了活命，他就急忙给鄂友三写了信，哀求鄂友三保全他的性命，赶快撤兵。

与此同时，李海龙派儿子李秀元深夜从鄂友三防备不严的地段溜出去，到包头搬救兵。过了两天，搬来了一个营的援军，在厂汗大坝与鄂友三的部队打了一天。鄂友三弄不清当时来了多少援军，再加看了魏吉可的信，只好下令撤兵。

（五）

1945年9月，日寇投降后，国民党把李海龙的部队改编为绥远省大青山地区抗敌第二团。这时鄂友三得到了美式装备，势力强大，伺机要把李海龙吞掉。李海龙深感小天下难以自保。这年冬天，贺龙司令员带领八路军攻打包头。云昌秀到耳沁窑子看见李海龙愁眉不展，问清了他的处境，就向李海龙介绍了国民党队伍在包头搞得乌烟瘴气的情况和八路军在萨拉齐深得民心的表现，劝李海龙归顺八路军。李海龙经过深思熟虑，认为这是一条光明大道。当天晚上人定以后，李海龙把其大哥李海云和儿子李秀元叫到后洞暗室里密议，他说：“现在八路军正在攻打包头，过去我们没有和八路军结下什么冤仇，如果他们这次打开包头，我们就出兵剿灭国民党的残兵败将，向八路军表一份诚心；如果八路军打不下包头，撤走了，我们就先取得联系，暗地归顺，然后相机而行。”议定后，就派云昌秀

奔赴萨拉齐城内与八路军取得联系。云昌秀向绥西专员李维中谈了李海龙的意图，李维中当即表示欢迎。事情办妥后，云昌秀回耳沁密向李海龙复命。为了防止意外，李海龙让云昌秀再到萨拉齐找李维中写个证明。李维中向贺龙司令员请示，贺龙司令员及时批准了李海龙的请求。

过了几天，云昌秀就给李海龙带去了贺龙司令员的任命状和李维中专员写的证明、信件，还有几张八路军奉劝国民党官兵放下武器、不要打内战的布告。

贺龙司令员的任命状是：

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司令部任命状第九〇五号

兹任命李海龙为我大青山地区招讨司令，特颁此状。

司令员：贺龙

副司令员：张宗逊

政治委员：李井泉

副政治委员：武新宇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九日

李维中专员的证明是：

兹证明李海龙部已与我军接洽编为绥远省招讨师。

特此证明

绥西专员：李维中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九日

李维中给李海龙写信的大意是：对他悔过自新表示欢迎，策励他为解放全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奋斗；并表示同意李海龙提出的方案，让他以后经常与八路军绥蒙军区保持联系。

李海龙看了任命状、证明和信件后，眉开眼笑地说：“想不到我李海龙还能当上八路军队伍中的一个司令啊！”

时隔不久，我军回师晋西北。由于种种原因，李海龙当时的起义计划没有实现。

（六）

1946年大烟开刀的时候，李海龙的一个小队长井德水请假回公山湾割大烟。一开始李海龙同意人回去不能带武器，但井德水坚持要带，李海龙考虑到井德水往日作战勇敢，立过不少战功，又居小队长的要位，也不好意思驳了他的面子，就答应了让井德水带上武器回公山湾割大烟去了。可井德水回到公山湾便投靠了鄂友三。鄂友三介绍井德水到萨县警察队当了队长。李海龙得知这一消息，十分气愤，着手查找井德水叛变的原因。找来找去，找到副团长高德亮身上。他想到高德亮与井德水平时关系密切，而且高德亮曾在一次酒席宴会上，趁酒醉当着日本军官的面挖苦过他，于是在这年的阴历腊月三十晚上，将高德亮枪杀了。

同年固阳县的芦县长在一次会上命令耳沁窑三天之内交三千斤公粮，参加会的李商村回来告诉了李海龙，李海龙没好气地说：“让我给他们交三千斤粮食？连三颗也不交！”这话传到高德亮的长子高长胜的耳朵里，高长胜为替父报仇，拿了许多钱送给鄂友三，并在鄂友三面前告了李海龙的状。

1947年元月，国民党绥远省主席董其武命令李海龙带全部人马到察素齐听候改编。李海龙知道这是一条调虎离山计，忙请来云昌秀商议对策。李海龙的态度是：死也不能离开老窝。他尽量在原地应付，让云昌秀火速到绥东解放区向李维中请示机宜。云昌秀走后不久，绥远省保安司令部保安处处长张国林派一姓段的前来催促。李海龙送了姓段的一百两大烟，请他回去多说

些好话：因为士兵都是本地人，需要做一些安顿，容他晚些时候动身。隔了两天，保安处又派人前来催促。李海龙父子商议，看来不去不行，决定由李秀元带一百二十人去察素齐接受改编，其余人转入地下，待机行动。李秀元带队到察素齐后，被编为国民党骑四师暂编一团三连。当时国民党正忙于内战，李秀元的士兵相继开小差回家，李秀元也借故抓逃兵，溜回耳沁窑子。不久骑四师东进，李秀元借机脱离了这支队伍。

云昌秀几经曲折到了解放区，先后见到了绥西专员李维中，绥蒙军区司令员姚喆，晋绥野战军副司令员张宗逊、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绥蒙政府主席乌兰夫。姚司令员让云昌秀告诉李海龙：要尽量坚持不下大青山，能拖多久就拖多久。实在不行了可带上人马从大青山中间的小路快速行军，奔驰绥东解放区，行动之前要先取得联系，届时绥蒙军区派骑兵到拐角铺一带迎接；如果能在大青山坚持六个月，形势肯定有变化；那时行动就顺利了。云昌秀回到耳沁窑向李海龙做了汇报，李海龙心里踏实些了。

同年6月，李海龙又扩充了四十多人，经多次与乌拉特东公旗保安队队长赵福海协商，将其人马编入东公旗保安第二大中队六中队，仍驻守耳沁窑一带。

1948年初，绥远省政府，在一次县长行政会议上，鄂友三及固阳县、萨拉齐县县长向董其武告李海龙抗交公粮、包庇壮丁、私通解放军等情况。董其武当即命令固阳、武川、萨拉齐三县的警察、自卫团出兵攻打李海龙。李海龙得知这一消息，于2月15日派人到东公旗要求赵福海派兵支援。赵当即表示到时可派一百骑兵支援；并送给来人“七九”、“六五”子弹各一箱子带回。

2月21日，大雪纷飞，寒风刺骨。井德水带领萨县警察队由南向北出击；固阳警察队由高长胜带路由北向南出击，此外固阳的自卫团和武川的警察队也配合行动。于午夜十二点双方接火打了起来。李海龙沉着镇定，指挥人马凭险拒敌，顽强战斗。对方凭着人多势众，猛打猛冲。双方不分胜负，一直打到第二天中午，东公旗的骑兵赶到，各县警察队见势不妙，后撤了三十里。李海龙乘机把人马撤到东公旗保安队的驻地绍卜亥，又由绍卜亥向绥东挺进，路经红崖渠、老毛坝、孤山等地，走到岔沁村时，碰到了国民党王有功部下的团长刘龙正。刘龙正对李海龙父子说：“董其武主席有命令，叫我把你们接回去。无论如何不能叫你们再往东走了！”说完他拿出王有功的亲笔信交给李海龙。信的大意是：让李海龙率部回去，由王有功负责调停，解除误会，担保没有任何问题。李海龙怕他们别有用心，对刘龙正说：“刘团长，既然国民党要收复我，我要亲自去见董其武主席。”刘龙正当即派部下向王有功报告；王有功又向董其武报告。董其武立即写来信保证李海龙的人身安全。次日，李海龙把全部人马带到察素齐，送了王有功大烟三百两，银元若干，让其从中周旋。

经王有功的周旋，董其武来电要见李海龙父子。李海龙怕国民党斩草除根，商议父子俩只去一个。李海龙临行时叮嘱李秀元，要好好打听消息，知道了回信，就立即爬大青山，去找解放军，千万不能作国民党军队的俘虏。

李海龙脱去军装，换上便衣，由王有功陪同，在归绥见到了董其武，以巧言否定了以前县长会议上给他定的“三条罪状”，得到董其武的信任，把他的队伍编成王有功的一个突击队，李海龙任大队长，驻扎麻花板进行整训。在李海龙回到归

绥的第二天，《绥远日报》上刊登了“李海龙深明大义，悔过自新”的报道。

(七)

1948年冬天，杨成武、姚喆率部打响了第二次绥包战役，连续解放了集宁、卓资山、凉城、萨拉齐、包头等地。在解放军围攻归绥前夕，董其武对王有功说：“李海龙对于修筑工事很有研究，你让他多想点儿办法，出点主意。”王有功把李海龙叫去帮他修工事。李海龙就仿照原来在耳沁窑修工事的经验提出了不少切合实际的建议。工事竣工后董其武视察时说：

“这工事筑得基本可以，重火力抵抗不了，一般轻火力完全可以抵抗。”此后董其武对李海龙更加信任。但李海龙看到共产党、解放军深得民心，所向披靡；国民党节节败退，败成定局，就在归绥私下查访与解放军有联系的人。他查访到杨植霖的哥哥后就去向其表述心迹，杨见他心诚意切，就给驻扎在旗下营的解放军首长写了信。解放军首长回信指示李海龙“坚持下去就是胜利”，并派来了一名指导员帮助李海龙改造部队。

李海龙随即请假回到耳沁窑，从住家的栈房里取出1945年贺龙司令员给他的任命状，返回归绥，又派刘海峰去旗下营和绥蒙军区联系，指出要把队伍很快带到解放区。李维中指示：

“现在你们要保存实力，等待时机成熟再行起义。”并要李海龙尽快把归绥国民党精锐部队的驻地、军事设施绘成图送来。

李海龙很快把图绘成派人送了去。

1949年2月，鄂友三派人把李海龙诓骗到他的司令部软禁了起来。李秀元等得知后，先后托王有功、董其武、刘万春、高理亭等军政要员的门子说合周旋，答应了鄂友三提出的条

件（一月之内买檀木棺材八十具；给被李海龙打死的官兵家属每户发大洋一百元；发孝布三丈、纸火若干），李海龙才被释放出来。

李海龙获释，鄂友三来了个他请客，由李海龙花钱，在归绥“麦香村”、“风林阁”宴请归绥的国民党将级军官，光支付吃饭钱李海龙卖了一头大骡子还不够，又向外借了现大洋一百多元。

接着李海龙一面派李秀元回耳沁窑给鄂友三筹措财物，一面寻思脱离险境的办法。一天，他把排级以上军官召集起来开会研究对策。他说：“我们长期在此住下去，鄂友三决不会就此罢休。今天把你们召集起来，请你们各抒己见，找出对付鄂友三的好办法来。”但直到会议结束，谁也没有想出一个万全的良策。接着李海龙又把一部分亲信留下，直截了当地说：

“现在我想到绥东投靠解放军，你们看这个办法怎么样？”排长冠俊卿说：“这办法我同意，但李秀元还没有回来，咱们现在要是走了，他回来一定会被抓起来。”最后议定等几天再说。李秀元归队后，李海龙立即派人去解放区与解放军首长联系，说明鄂友三对他的威胁以及他决定迅速起义的打算。双方约定了起义的时间，李海龙部向解放区进发的路线，以及至时解放军前来接应等措施。一切定妥，李海龙便派李前付回耳沁窑把家眷辗转护送到陕西的榆林。

（八）

1949年6月割大烟的时候，王有功派他的嫡系部队下去捞油水，李海龙也趁机向王有功给部下请假回家割大烟。王有功怕李海龙的部队跑散，不仅未准假，而且派了一个甘肃人到李

海龙部进行监督。李海龙的起义准备工作在秘密地进行着。一天深夜，李海龙下令把那个甘肃人捆起锁在屋子里，他带领一百五十多人、一百二十多枝枪，向解放区进发了。

那时国民党的军队每天早晨上操，升旗。第二天早晨部队集合时，团副邢培先发现李海龙部未到，就派人到营房去找，结果连李海龙部的一个人影也没找到，便急速向董其武做了报告，并附带说明李海龙在此前曾为部下请假回家割大烟一事，董其武因此推断李海龙部是向西回耳沁窑了，于是便命令部队向西追赶，结果弄了个相背而行，越追相距越远。

李海龙率部进入解放区后，受到了解放区军民的热烈欢迎。姚喆司令员专门设宴请李海龙会餐，把这支起义部队编入包头军分区保安大队。“九·一九”绥远和平起义后，这支部队又改编为包头军分区警卫连，1950年开赴包头驻防，李海龙按营级对待，李秀元按连级对待。过了一段时间，李海龙调到河北集训，由于种种原因，中途他自动脱离部队回到萨拉齐，在水卜洞街院内相继开过碾磨房，拴过骆驼，养过毛驴小车。1968年迁回耳沁窑，有一段时间，每天背着干粮一个人修筑山路。1973年患半身不遂。1974年农历正月病故。

（综合李前付、李秀元、李秀良、云昌秀、

刘映元、李维中等人回忆及文章写成。）

著名兽医李贵

姜治友 陈治国

李贵，乳名李五牛（1900、7~1977、10），原籍萨拉齐镇。1959年被内蒙古农牧学院聘请为兽医院主任，并晋升为副教授，是闻名遐迩的中兽医。

李家为世传中兽医，其先祖约在1800年前后开始行医，至李贵已是六代兽医世家。

李贵20岁时，开始独立行医。除1930年在巴盟工作一段时间外，直至1959年被聘于内蒙古农牧学院之前均服务于萨县。

李贵先生在萨县行医期间，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大约在1938~1940年期间，萨县南复隆地、缸房营子一带爆发马鼻疽，李先生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是这种病，但当时他认为是一种传症，无法治疗，并提出将病马隔离捕杀，且用石灰水洗槽，从而制止了这种病的蔓延。1946年油房营子、新村、石老藏营子等地流行脑黄（类似乙脑）。李贵先生提出了用川黄连、天麻、鸡蛋清等药物进行治疗，使之基本上得到控制，深得群众信任。李贵先生除以医兽为主外还兼医人病，尤擅长儿科、骨科。医人病时，他对家境贫寒的儿童，对买不起药者，不但乐意诊治，开方而且自己付给药费，为此，每年用去银币数十元之多。

李贵先生品行端正，医德出众，深得萨县群众尊敬与爱戴。他行医数十年来，诊治医药费用价格低廉，从不因自己医术高明而昂医贵药，不少贫困农户，常常除药欠帐，甚至免收。解放后，有些农民亲自给李贵家中送钱。问起原因，方知在解放前曾欠医药费，当时付不起。后来翻身富裕了，便自动把药钱送上门来。

李贵先生，中兽医经验丰富，诊断细心，辨证准确，方药应症，治疗效果甚佳。有一畜主，其骡患病，曾去数处诊所就诊，因诊不应病，谢绝治疗，最后牵至李贵处求诊。经其察色按脉，细心诊察，确诊为尿血，畜主顿时竖起拇指赞曰：“我走过数处诊所，均未察出此病，唯有你李兽医应诊对症、吾服矣，就此治疗。”遂三剂药而痊愈。萨县城北某村一户姓张人家的一匹马患起卧症牵来就诊，李先生见其起卧打滚非同一般，视其口色鲜红，脉洪数，则令畜主将病畜拴在桩上。仔细观察其精神状况，举止动态，经半时许，则见病畜口咬前肢。乃告畜主：“此马患得‘心黄，无方治疗，牵回家去，隔离饲养，严防咬伤人畜’。畜主半信半疑，回家第二天，该马神狂咬物，自啃其身，两三日即死。人们赞其料病如神。

李贵先生，除悉心继承祖辈传下来的诊疗经验外，对古典中兽医著作，特别是对《元亨疗马集》更为刻苦钻研，应用得心应手。有一年，有一匹骡患“咳嗽”，经数处兽医诊治不愈。李先生详细察色按脉，观其外形，发现该骡咳时，悬其后蹄便马上忆出《元亨疗马集》上说的：“咳而悬后脚者，肾咳也”。于是遵着《元亨疗马集》所示，一付“螺青散”而愈。诸如此等事甚多，这里不一一列举。

解放以后，李贵先生思想进步，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于

1953年在萨拉齐县主动组织起兽医诊所，李兼任所长，至1956年，每年都被萨县选为劳动模范。1955年，内蒙骑五师军马发病，请李贵先生会诊。当时贾清汉教授发现他中兽医医术高超，并有独到见地。便于1956年由北京军区军马研究所聘请为中兽医科主任（大尉军衔）。李贵先生在军马所工作期间，诊治细心，辩证准确，经验丰富医疗效果十分显著。所内有一头公驴，患睾丸肿胀，经多方治疗不见好转，便请李贵先生会诊，李云：“这是一种传槽鼻子病（鼻疽）”，当时的主治兽医说马来时点眼是阴性。鉴于此。贾清汉教授当即做补体结合反应，结果是阳性，证明了李先生诊断准确。于是贾教授赞赏李贵先生：“你凭眼睛观察，超过化验”。此外，他对马流感，霉玉米中毒和特殊跛行的诊治，都有特殊才能，但由于生活环境不适宜，在军马所工作三个月后，又返回萨县。

返回萨县后，他工作更加积极努力，1957年内蒙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模范兽医”称号。1959年被内蒙古农牧学院聘为兽医院院长，1962年晋升为副教授。

李贵先生在农牧学院任职期间，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表现出了优良的医德和丰富的中兽医经验。

其中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开展了应用中兽医药治疗门诊病畜的工作，使得中兽医的诊疗技术，在高等学校占有一席之地。他在治疗过程中，常常用中西兽医结合会诊，对一些疑难病症，应用中兽医理法方药进行治疗，取得良好效果，使中兽医这门宝贵遗产，更加深入人心。此外，他还大力开展了治疗骨折的工作，并取得了满意效果，推动了中西兽医结合工作的进展。因此，1960年他被中国农科院中兽医研究所聘为特邀研究员。

李贵先生在农牧学院期间，工作一丝不苟，一贯认真负责，诊治病畜特别仔细，获得兽医系师生高度好评。就是重病在身时，他还经常命其子李春元，用自行车带上到兽医院帮助会诊，解决疑难病症。他在培养中兽医人材方面指导细心，循循善诱，毫不保守，为继承和发扬祖国中兽医遗产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当他因病卧床难起的时候，还把多年来的临床经验口述于人，整理成《中兽医治疗经验第二集》经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

从李贵先生的遗著中可以看出，他的学术特点是：第一、以活血化瘀见长，全书约90多个验方，其中有70多个处方不同程度地使用了活血化瘀药，追其根源，李先生对王清任的《医林改错》一书颇有研究，深受其学术影响；第二、对应用《元亨疗马集》中的当归散治疗“劳伤”颇有新的见解。其子李春元，其婿申镇元，都在有关杂志上发表文章进行了详尽的阐述；第三、萨县面北为山，沟涧有流水，山区牲畜稍有不慎，就坠入涧水中呛肺，对这种病，李贵先生称之为“水射肺经”，对其治疗有独特之处，服药即安。此外，他对“脑籁”病的治疗，鼻疽病的诊断都有独到之处。

1977年10月19日，李贵先生与世长辞，遵照他的遗嘱，将其遗体葬于萨县。

晋剧名演员王月霞

葛子英 宫步生

王月霞是山西浑源县毕村人。1921年出生在一家富裕的农民家庭。她的父亲姓马，人称少三，是一个身染嗜好的大烟鬼（吸食鸦片），又好赌博，输耍不成器，把一份家产弄尽卖光，最后无法生活，先将亲生的女儿月霞（时年四岁）卖给“花界”（一），后将老婆（妻）卖给王兆祥做妻，形成了三不相见。幸蒙月霞的外祖父筹划赎回月霞交付王抚养，使母女重逢团圆。从此，月霞便姓王了。

王兆祥择居离乡，由浑源迁往大同市落户。月霞依赖继父培育到九岁时，是年大同荒灾，全家三口人又逃荒到“归绥”下户。不久，她的继父聘请晋剧演员老十三旦来家教月霞学戏，学了二年后因无力支付学费停辍。月霞十一岁时，继父将月霞送交晋剧演员辛梨红门下学徒，为期五年。双方立契规定：学习期间谢绝家属探望，限制徒弟回家。期满出徒还谢师1—2年（二）。王月霞一进入戏班就苦练功夫，即开始练腰躬身、揉搓四肢；早晨起床到结冰地方锻炼嗓工是“卧冰求音”，即匍匐冰滩发声拔音，（吸取冰凌之腾气而求其清脆之音）；学唱词，因不识字她是死背硬记；做动作，举臂抬手必有一定分寸。如哪一项记不住做不对就挨打、挨骂，吃饭不得饱，睡觉

铺麦草。处在饥寒交迫苦境中的少女王月霞她吃苦耐劳，钻研学习，终于学到晋剧较好的小旦技艺。

王月霞学习期满，开始在大同市登台演出，第一场就得到观众表扬：“开门红”。她的艺名叫筱月霞，在大同连演二年（其中谢师一年）完成了学戏任务。由第七年别师到归绥参加了“老财迷剧团”演唱会戏（三），身子自由，经济独立，抚养母亲了。在一九四〇年日伪时期和她的过门师父正旦演员“万人迷”一同来萨拉齐楼子店院“俱乐部”（四），在“四寡妇戏班”演出近一年后，复返归绥演出。以后就游走山西、宁夏、浑源、大同、张家口、丰镇、集宁、包头、河套等地流动演出。于一九五二年到萨拉齐演出，不再流动，以后与田二厚（农民）结婚。

职业正常、生活正常，享受一切福利待遇。曾任萨县晋剧团团长、县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在文化大革命时停止演出。

观众对王月霞的演技评价

一、技术特点

王月霞是晋剧正旦演员，自幼在山西大同学小旦。学成后，因她唱腔柔嫩，嗓功刚硬，字句分明，纯洁有力，调有奇特，韵有风味、板眼准确，丝竹协调，拍节均匀，扮演角色惟妙惟肖，改工青衣后，条件与实践融洽十分。

二、王月霞的拿手戏

《断桥》、《三上轿》、《鞭打芦花》、《三娘教子》、《算粮登殿》、《明公断》等剧目是她的拿手戏。又属于单本

子青衣角色主演戏剧，俗称“卖嗓噪戏”。如果没有基本嗓工的普通演员，演唱时观众会感到淡而无味，这些剧目实质上是骨头戏。而王月霞演唱这些单本子戏时，则表现非凡，受到各地观众“行文”、“片友”（五）的赞成。

《断桥》是《白蛇传》中的一段，王月霞扮演白蛇，从后台一句介板唱：“遇天兵杀得我急忙逃走……”前爬后蹲地上场。这时白蛇已换了装束，不象水漫金山的打扮了。穿着褶子腰包，两手把腰包翻起，先跑一个园场，走到舞台中间，露出疲劳不堪的样子，向前一扑，表示她失足跌在地，臂儿出场将她扶住，经过淡白到大段的唱腔，叙述新清，表情动作非常逼真，生动感人，台下的掌声不断。笔者给她司鼓，配合她的喜怒哀乐，力度相应，她下场后说：“官师付，咱们唱打到一块了。”

前辈名流也曾结论：从来舞台上演员的命运，都是由观众决定的，艺术成名，一半靠观众批评和鼓励，一半靠自己专心研究，才能成为一个好角。这是不能侥幸取巧的。全凭刻苦学练，循序渐进。王月霞在张家口市上堡剧场演出《算粮登殿》时，她不但表演自如镇定，而且感情奔放，以声传情，以情传神，大卖力气，博得四次喝彩。当时在家传戏曲学校任校长的名演员筱桂桃（即杨丹青）带领学生观完她的演出后，伸出大拇指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演员，我也应该向她学习……”。到大同口泉四老沟矿务局礼堂演出她的最拿手好戏《三上轿》代打洞房。上轿时唱着人们都泪如雨下，泣声阵阵。到了打洞房，用剪子扎了张秉仁这个强霸良女的凶神，观众曾替她上台打恶霸，可见她唱得身临其境，多么逼真呵！官步生说：我虽然给卅多个旦角司过鼓，但是第一个遇到她这样的绝妙演技，至

今还刻印在脑海中。

晋剧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是有其美学基础的。忽略了这一点，就会失去艺术上的光彩。不论剧中人是谁，在舞台上的动作，都要顾及到姿态上的美，王月霞在演出《白玉楼挂画》这出戏中，她扮演嫦娥，“她”由于害人至顶，落到打砖乞讨之中（这是编者为了给正义伸张而至）。但她无论在打砖唱段，还是在诉说苦衷时，都表现出了哭而好看，哀而姿美的演技，博得观众热烈的掌声，演《双蝴蝶》扮演祝英台更是活灵活现，形象逼真，表情突出，观众为之掌声不息。

萨拉齐镇的老年人素喜晋剧，有些由外地来的名坤演员，演唱水平不高的根本不能落脚，像驸马传书只留一个趾爪痕迹而去。而人们一提起王月霞来就赞声不绝，可惜在文革中遭到冷遇。打倒“四人帮”后，才重新安置了她，使她能欢度晚年，同行们才松了一口气。

三、给予王月霞优秀演员称号

王月霞也是外地来的，为什么能久占萨拉齐的晋剧舞台呢？因她好动脑筋，颇能研究，扮演古代、近代、现代剧角色都能演出一定水平。如《争儿记》是现代剧，她扮演“老太婆”真像一个老婆的情貌动作，具有喜怒哀乐之表情，因而占据了萨拉齐的晋剧舞台，她的演技优美，不但得到群众对她的喝彩，而且得到象老贾二（六）这样戏迷的羡慕，称赞她是“著名优秀演员”。

注 释

注（一）花界：旧社会的妓女院。

注（二）期满出徒谢师：指徒弟把赚得一年的工资全部交给师傅。

注（三）演唱会戏：在旧时人们崇拜神庙，凡过庙会就要演戏。

注（四）俱乐部：是日伪时期的赌博场所，为了聚赌招人附有剧场，演戏不售票。

注（五）行文：内行懂戏剧文艺的人。片友：会唱坐腔的人。

注（六）老贾二：是萨镇住的年逾七旬（戏迷）老看，他懂得古剧甚多，爱好看戏，甚至每日购票看戏，如果演员演唱稍有出入，他立即毫不留情地提出意见。

花 脸 名 流 狮 子 黑

官 步 生

启 蒙 学 戏

狮子黑的真名叫张玉玺，乳名叫拴拴。是土右旗北只图人，生于清光绪十九年四月廿八日。十三岁入马如福娃娃班学戏，专工净角（花脸），由于其天赋的宏亮嗓音，结实身材，面部圆润，髀高过人。具备了塑造各种不同性格净角的先决条件，加之勤奋好学和以戏为业的雄心，终于学好了过硬的四功

（唱、念、做、打）、五法（手、眼、身、法、步）。四年后，在演唱的技艺上有了较深的造诣。他在肩蒙戏《忠保国》中扮演的程咬金，其唱腔音色圆美，字正腔圆，明亮奔放，自然流畅，身段稳健大方，悠然自如，脸谱干净整洁，气势磅礴，造成非凡的意境，深受群众欢迎。第二、三、四出戏接连演出了《新单通》、《黑州》、《取洛阳》，每演一出总是饱满浑厚，盛名萨包一带。青年时代的张玉玺，他就是一位积极进取，具有与众不同的独特风格的净角演员。他起早贪黑刻苦练功，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坚持走袍代与架子花脸兼优并举的表演途径，突出了文武结合，创出一条架子表演袍代唱的道路。

张玉玺出徒后，改搭候潘龙的“双龙班”。活动境界扩大武归绥（现在呼和浩特市）托县、清水河等地。凡他表演过的地方，至今还流传着“活马武”、“活单通”的佳话。民国元年，当晋军阎锡山部镇守萨包一带时，他曾得到军内戏剧爱好者王力强指点：到山西、张家口创立大业，定能成功。他知道了人经三师出高艺的道理，廿三岁离开了萨拉齐。

闯荡江湖

他随身带着一个靴包和一头纲子，南渡黄河，千里跋涉，到了山西的忻口镇，结识了云遮月（即刘宝山之父），就地搭班演出。由于他的精湛表演，崭露头角，名噪一时，晋北一带称他为三绝演员（即嗓音绝、脸谱绝、表演绝），接着他到太原又结交了潞南黑、乔国瑞。吸收了各家之精华。并融汇于一身如虎添翼。廿六岁时，他随同李子健（著名的刀马演员）李

翠芬、张霖一同赴张家口。那时京包铁路还未修通，张家口不仅是个商业城镇，还由于它离京不远，文化亦很发达。头一天亮戏演《墨州》哇呀一声，震撼了整个大剧院，全场喝采，观众赐于他“狮子黑”的美名。

张家口不仅是战略要地，也是戏剧界的关口。是好样的演员，都得一一到口上毕业。因为观众看戏，要求高，一点也不马虎。这里的戏剧社班底雄厚，人员齐整，文武齐快。每年四月，凡是山西梆子（特别是北路梆子）、河北梆子的好演员，都要到蔚县会集，他们切磋技艺，互相促进。为的是兴旺戏业，同行都知道“河南红（山西晋北著名演员）下蔚州，窝心到家”的话嘛！蔚县的戏路子特宽，没剩下的演员，不用说唱戏，有的剧目，如：《大正宫》、《泰山图》、《教习借衣》等，看也没看过。

张玉玺到了蔚县后，拜在了翎子黑门下，学到了章法多变，雅俗共赏的表现法则，脸谱又深入一步，墨笔洗练，不落窠臼。别具特殊风味，他的记忆力特强，不到半年工夫，学下四十多个戏，重新返回了张家口。

这时他的艺术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境地，时值益壮之时，以封朝戏为主，如《抱塔柱》、《五岳图》等。民国十六年赴京在平介会馆演出，当时京著名花脸演员金少山看了《抱塔柱》后，盛赞张老板为“晋剧花脸祖师爷”！轰动京城。《北报》文艺编辑部郭绍虞先生撰写评论文章，大致内容是：“花脸大王张玉玺的精彩表演……”。

民国廿五年春，他怀念家乡，领班回到萨包一带演出，演员阵容好，服装新鲜，场面齐美，有十二红（刘宝山）、五月鲜（刘明山）、李子健（艺名叫满清）、李翠芬、露水珠（张

霖)……文武代打,每到一处,十分卖力,群众欢迎。

当年七月初二,鄂尔格逊河神庙会演戏四天,就是请他们来演的。邻村上下,看戏的人流滚滚,车马如龙,是历史上罕见的万人逛会局面。张玉玺先生,不仅演技高超,而且具有高尚的戏德情操。初三白天,他演出《抱烙柱》时,突然阴云密布,天降急风暴雨,看戏的人快要跑光了,但他仍一句一板地按步就班往下演。散戏后,会首们说:张老板,天气不好,少唱几句就行啦!他笑着回答说:我回到咱们家乡,一个人看我,我也照例卖劲!刘宝山先生也是同样,他演的《献地图》,给人们留下极好的印象,至今流传着民谣:老汉看了十二红,头白返黑要年轻……还有“李子健站一站,叫俺姐姐看一看……”、“看了露水珠的《乾坤带》,卖肉的刮了指甲盖……等,至今还在老年人中流传。

尾声沉痛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后,沦陷区内布满了血雨腥风,他痛恨至极。不顾日伪多方引诱威逼,他罢戏歇舞,蓄须明志,卖衣典当,过着清贫的生活,开门教徒。继大徒弟高旺出师走后,又收了张庆云(小狮子黑),公玉昌(萨拉齐人)。有一次日本宪兵司令部为接什么司令,让他演出比较喜悦的戏,他说:我从不会演喜剧,就善于演悲剧!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拒绝演出。

整整坐了二年后,在同行们的劝说下,为了糊口,他随班到多伦县,六月廿四庙会演出四天。返张时,路过万全坝的狼窝沟,被日本人无故盘查,遭受毒打,1942年含恨去世,年仅

五十一岁。

张玉玺同志的一生，是艰苦创业的一生，是梨园子弟的好榜样。我写此文，一面怀念张玉玺先生，一方面启迪后代，希望千万个狮子黑成长起来，被人民喜闻乐见。

蒙古族拳师云连升轶事

李维章 整理

笔者的话：云连升是土默特右旗在清朝末年——民国前期享有盛名的一位蒙古族拳术大师。我早想将有关他的史实整理成文，但一直苦无资料。近几年征得有关云连升的拳艺材料片断，并亲自走访了其女儿云宝麟，通过她的忆述和核实史实，写成这篇文章，但觉得有挂一漏万之虞。敬希读者和知情人士，来信补充或指正，我将十分欢迎。

云连升，字中海，是土默特右旗蒙古族人，于一八六二年农历正月初二日出生于萨拉齐镇东北四公里的北只图村一个贫苦农民家中。一九二八年——一九三七年，曾任归绥中学武术教员，绥远省国术馆教练，为人小心谨慎，寡言少语，是一位在中国近代武术史上很有成就的人物。关于他的传闻轶事很多，仅就所知，陈述于后。

自古以来，武术是我中华民族的国粹，世界各国无不佩服。清朝末年，萨拉齐附近数百里境内武术顶出名的有三个

人，三人中首推水洞沟门的尤四喇嘛，他曾教过云连升武术，是云的师傅；第二便是云连升，据内行人传说，他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第三是吴桐（吴桐就是民国十七年公元一九二八年）在南京打插用名为吴家八挂掌法，实为吴式太极拳的“尚通行”击中对方心脏部位，从而击败山东省号称拳王的“兰大师”。由此，吴桐便扬名全国。吴历任绥远省国术馆副馆长（每作又兼馆长）。解放后，任内蒙体委副主任兼教练。

云连升幼时家境贫寒，父亲给人当雇工赶车，母亲多病，兄弟四人，他是老二，乳名“二圪旦”，其兄卜雅尔，三弟毛其其，四弟马什，经常和村中富家子弟打架。云连升生得骨瘦如柴，但谁都打不过他，因此结他。一次，十来个孩子群起围攻云连升，他被打得爬不起来，过了几天，他瞒着家人，毫无目的地向东南走去，家里人找了好几天，找不着，以后也就不找了。

云连升到托县后，听说吴家是一个世代武术强手之家，教的徒弟不少。云连升那时才十二、三岁，听到吴家的名望后，几次跑到吴家要求做短工，放羊打伴子，并且自我介绍是蒙古人，就会放羊。武学精深的吴英老先生（吴桐的父亲）便收留了他。经过一段时间，见他老实肯干，又能吃苦，所以对他特别好。在年终结帐时，拿出十块银洋给他做工钱，云连升一口拒绝说：“我不要钱！”吴老先生觉得奇怪便问他：“你不要钱想要什么？”云连升双膝跪倒在地说：“我要向您学点武艺！”吴老当时本不愿收他为徒，顺手把他拉起来，但一伸手觉得这孩子骨骼硬朗，筋腱发达，再加上聪明伶俐，矢志学艺是块好料，就答应收他为徒，并开始教他一些拳脚。

云连升从此更加勤劳了，每天起早贪黑，担水扫院，把羊

放得膘满肉肥。吴老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就给了他一个仅能容下身子的小竹筐，让他每天回来睡在里面，不准把手脚伸出筐外，吴老先生每晚都亲自检查，如若发现他的手脚伸出筐外，就用竹板打他。苦心教了五年，云连升的武功基础扎实了。不幸吴老先生因病去世，云连升把吴老安葬后痛悼一番，才辞工回到离别多年的家乡。

他的父母只以为他早死他乡了，突然归来，家人村邻问他这五年怎么过的。他只说给人做短工，没有提到在托县学武一字，但始终不忘吴老先生的教导，不分冬夏，勤学苦练，每天仍就睡在吴老给他的小竹筐里。（据说这是一种练武的基本功夫法。吴桐在南京打擂时，就是用这种吴家八卦掌法把山东拳王打败的。）

云连升回家后，谁也不知道他学过拳术，有功夫。一次，他父亲给地主赶车生了病，叫他替父亲赶车。那时京包铁路还没有修通，由包头往归绥拉皮毛都用骡马车，他们的车由包头往归绥（今呼和浩特市）途中遇到由归绥往包头运货物的二十多辆马车，横挡道路，正在埋锅造饭。恰好，这段路正是下坡路。萨县的车只是十来辆正好上坡，这些归绥车滑子，蛮不讲理，依仗他们人多，欺负萨县的人少，除不给让道外，还说什么你们没看见我们正在埋锅造饭吗？要着急就绕着走吧，要不就等我们吃完饭再给你们腾路，或者把车昇到辙外也行。”初时云连升半点不露声色，听如此说他真气愤到了极点，走到车前说：“把车昇开好吗？我来试试。”说完便双手握住马车的后辕条，丹田运气，把满载货物约有千斤的货车，借马背之力，一下昇起放到辙外。归绥的车信见此情景无不胆颤心惊，赶紧把他们占道挡路的车赶到车辙外，并赔了不是，说从今以

后我们归绥市的车若与萨县的车相遇，不论空车重载，一定给你们萨县车让路。自此便成了车行的惯例：萨县的车从不给归绥的车让路。

经过这次较量，村里的人把云连升吹捧得神乎其神，然而云连升听了后更加勤奋刻苦，一心钻研武术，于是拜赵玉河（通呼赵三先生）为师兼学医术多年，后又拜在水涧沟门尤四喇嘛门下为徒，学到了不少武艺，又与程全忠（水涧沟门人）要好，经常切磋武术，邻近的亲友们见他如此，都想推荐他，当时准格尔旗王爷福晋的四太太是土默特旗人，听说云连升的威名，很想接近他。一次在归绥见面问起他的家乡住处时，方知是亲戚。于是便带他到北京拜了通和尚为师，学习清平太极剑和四门八卦拳，还给米道人过过门，武术大进，名望日高，但他更不敢稍事疏忽，每日五更时便到野外勤苦演练不息。

隆冬腊月一日，云连升在野外演练后回家，路经一个破庙时，见一老人身穿一件破棉袍，睡在冷地上，觉得既奇怪，又可怜，便把老人唤醒，请到他家，给吃了一顿好饭，并问这老人的家乡、姓名，这老人说他姓牛，无儿无女，孤身一人在外流浪多年，无家可归，没有藏身之所，只好到处为家。

云连升见这位老人说得可怜，又觉得奇怪，便热情地挽留他住在家里供给吃住，而且十分尊敬。谁料这一老人竟是山东1861年参加白莲教起义，领导黑旗军的首领宋景诗，化名赵老桐，阴把枪的传人，武功之高，无人比拟。

宋景诗为什么会到他家，据说也是慕名而来的，最后把他毕生武艺全教给了云连升，并老死在云连升家中。

云连升经拜师赵玉河（三先生）、尤四喇嘛、了通和尚，给米道人过门，又学得宋景诗的真传，在江湖上远近闻名，那

些走江湖卖艺的武林人士多次和他比试武功，都不是他的对手，当时名震塞北山东、河北、山西、河南等省，那些来绥远境内走江湖卖艺人，原先都到托县吴家拜访后，才敢摆摊卖艺，后来不到托县吴家了，都来萨拉齐北只图云连升家拜访。那时吴桐年已二十多岁，心中不服，认为我家祖辈武学精深，自己又得其祖父及父亲真传，云连升给自己家放过羊，学了一些拳脚也不过皮毛而已，又因自吴老先生死后，云连升再未到他家问候过，于是，心中对云连升产生不满。

一日，吴桐只身一人来到云连升家中寻衅，指责云连升离师叛道，违背了武林规矩，定要云连升叩头认罪，否则就要比武竞技。自视武功在云连升之上，说什么如若云连升不胜，就要把云连升逐离姓地，否则就要残废其终身。假若自己败阵，情愿叩头认云连升为师。云连升再三谢罪求告，都被吴桐一口拒绝。在比赛中吴桐尽出杀手，大有不杀云连升誓不罢休之势，云连升见此情况，甘愿认输，然而吴桐却不许，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杀手连出，愈来愈狠，云连升被逼得万般无奈，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说：“好！看枪”话音刚落，只听“嘶啦”一声，吴桐的裤子从左到右开了一条很长的口子，吴桐当时跪地求饶，叩头拜云连升为师，并得到云连升的很多教益，故有民国十七年在南京打擂一拳成名的成就。

据知情人说，五十年前，萨拉齐县曾有一位叫殷银山的，说他小时候参加过义和团，亲眼见过云连升在打二十四顷地天主教堂时，由平地跳到钟楼上，一手提着一个洋人，一手提着一个华人教徒，跳了下来。

一次云连升到归绥永胜斋买鞋，说怕鞋底开线，伙计与之争执说：要是鞋开了线，换新的，要是鞋子穿破开了线，让买

主砸烂他们的金字牌匾。云连升穿上鞋走了几步，一看鞋的底与帮子分了家，掌柜子听说买主就是萨县的云连升后，便把原来的“永胜斋”改为“永升斋”。

云连升晚年多从事医术给人看病，不要分文报酬，医术很高，有时见人观色就知你有何病症。

一次，有个穷人请他看病，他只看了一下脸色，就说：

“你这病好治，回去弄一把韭菜捣烂连渣一齐喝了，连喝三次就好了”并说：“你是劳动后肚里饥饿，急速吃了几口滚烫的饭后，觉得肚里烧痛，从那便得此病？”这人一想是这么回事。便回家喝了三次韭菜汁，果然病除，据说很多疑难病症，一经他手，无不手到病除。

云连升的徒弟很多，孙继先、董寿、陈佩、刘恩绶、董吉昌、杨植霖、吴之仪、吴桐、麻雄以及山西的田玉、北京报社的文陶、还有给白海峰当过保镖的刘汉兴等人，都拜他做过师傅。现在萨拉齐东门大街住着的年已八十四岁的胡文广，就是云连升生前的一个徒弟，现在身体还很健壮。

云连升收徒弟的要求是武术只可作为健身强体之用，决不允许用来打人，有一次，他年仅十三岁的侄儿云二后生，在井坡上打水，和人打架，打伤了对方，从那以后，云连升便再不给二后生教拳了。

据云连升的女儿云宝麟（小名改花）说：“阴把枪法，是我国历代名将真传下来的，据知是从宋朝‘岳家军，岳飞、岳云之母传到清朝宋景诗的，又传到我父亲云连升。”《阴把枪十八诀》的抄录，云连升让徒弟董吉昌保存，听说他家人当破废纸给卖掉了。呼市牛桥街陈佩（已去世）会使这种枪法。云连升生前使用过的一些器械，留于呼市麻雄的儿子麻建平家中，

（麻建平现为呼市玉泉区医院大夫）。

日寇侵占归绥后，绥远国术馆解散，云连升返回萨县家乡不久，患痢疾病逝。

（云宝麟口述，并综合黄维新提供资料整理）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土默特右旗文史资料第一、二辑

作者 =

页数 = 1 7 5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目录
正文